

四手联弹

<http://iask.sina.com.cn/u/1644200877> 此处有大量书籍免费下载！
仅供个人阅读研究所用，不得用于商业或其他非法目的。切勿在他处转发！

水隐醉月

章诒和

贺卫方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四手联弹

章诒和
贺卫方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手联弹 / 章诒和, 贺卫方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7—5633—9697—9

I. 四… II. ①章… ②贺…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5217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www.bbtpres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 276017)

开本: 690mm×930mm 1/16

印张: 18 字数: 90 千字 图片: 80 幅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539) 2925659

目 录

自序壹 [章诒和] 002

自序贰 [贺卫方] 006

甲 辑

壹 也苍郁，也清冽 014

贰 我是天空的一片云 018

叁 黑夹白 022

肆 我要孝顺羊了 030

伍 沙 032

陆 竭盘陀 042

柒 为你疯狂 048

捌 告别喀什 056

玖 仰望慕士塔格峰 070

乙 辑

- 壹 拾 纳沙泰尔 078
- 附 录 让胡适校长的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在北京大学法学院2008届毕业典礼上
作为教师代表的致辞 [贺卫方]
- 壹拾壹 别人都朽了，他不朽 094
- 壹拾贰 没有塑像的底座 098
- 壹拾叁 关雪“梅兰芳” 104
- 壹拾肆 我看到了洪堡大学 112
- 壹拾伍 建筑的政治学 118
- 壹拾陆 姬路城 122
- 壹拾柒 吴哥的绝世微笑 130
- 壹拾捌 经过“柏林爱乐” 136
- 壹拾玖 坂东玉三郎 140
- 貳 拾 黑船上的汉学家 148

丙 辑

- 貳拾壹 若生在明清，就只嫁张岱 158
- 貳拾貳 胡颂平的日记 166
- 貳拾叁 他们像传说一样过去了 172
- 貳拾肆 《格列佛游记》里的党争 178
- 貳拾伍 学《论语》，说孔子 184
- 貳拾陆 非常独立，非常沉默 192
- 貳拾柒 很后悔，没为他写一个字 196
- 貳拾捌 像冬天飘摇的芦苇 202
- 貳拾玖 他那支笔是怎么练的 208
- 叁拾 说知名品牌 216
- 叁拾壹 一生负气成今日 四海无人对夕阳 224
- 叁拾貳 陈姑娘，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 228
- 叁拾叁 端木露西：蔚蓝中的一点暗淡 238
- 叁拾肆 汉语拼音与威式注音 244
- 叁拾伍 好吃勤做 250
- 叁拾陆 只养仙人掌 254
- 叁拾柒 乡事偶拾 258
- 叁拾捌 他们更耐人寻味 264

自序壹

章诒和

2009年春，小贺被北大校方派到新疆石河子大学支教去了。如鹤一般，向西飞去。

很快适应了环境，不久，就看到他拍摄的许多照片。我不会摄影，也不留照片，但喜欢欣赏——那大漠残阳里的景致，那天山脚下的风物，无娇艳，无香浓，消散了红尘，却比很多胜地名园可靠实在，也更耐看。是啊，现在不实在、不可靠东西太多了。世界变得很可怜，人也跟着可怜。

我两年间[2008—2009]，三次赴疆。去新疆，就是回归自然；同时也让

蒙尘的心灵，获得修复，以还原人心固有的温软和澄澈。无论是一棵树，还是一群羊，都能使你久久伫立。大自然是那么地朴素，但世间恐怕再也没有比朴素的大自然更深奥，也更能激动你、感动你的了。于是忽发奇想，对小贺说：“怎么样，拿出你的图片，我们合作一把，尝试着写出一本有图有文、图文搭配的小书来。写新疆，写花草，写阅读，写风习，愿意试试吗？”小贺为人随和，一口应承下来——那天是2009年7月1日。

合作开始了！世俗，趣味，随意，是我们的宗旨。无政治，无思想，无锋芒，是图册的特色。他在新疆，我在北京，各写各的。他的题目，我

不涉及；我的题目，他不过问。遇到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合写一篇。写完交换一看，彼此大笑。说是合写，结果还是你向东来我向西，文风差异也不小。我的专业是戏剧，他从事法学。故我又对他说：“尝试一下，把我的戏剧和你的法学放到一个锅里去煮，看看煮出来的是什么？”

小贺正色道：“煮出来的，便是‘戏法’了。”

问及书名，人家教授说：“叫《四手联弹》，如何？”活像他是个搞艺术的。

人的一生，童年有游戏，中年有经历，晚年有回忆。其间自有许多变化，但人对自己的理解没有改变，对生活的基本态度和情感倾向没有改变。这是什么？这就是文化。它也正是我们写作的惟一缘由。

2010年2月5日
于北京守愚斋

自序贰

贺卫方

当愚姐最初提议写这样一本小书的时候，我的反应并不像她在序言里说得那么从容淡定；自己内心里，反而很有些惶恐。愚姐是戏曲文学方面的专家，本身即为作家，并以多部作品在汉语世界里树立了一种独特的文学风格，拥有大量痴迷的读者。我也是这读者群里的一员。现在读者居然登堂入室，跟她“四手联弹”，这是不是有些不知天高地厚？

“戏法”二字很轻松地说了出来，可是心中很清楚，二者的差距确实有点大。法律的训练总是趋向于理性严谨，例如不倡导用文学最习用的比喻说事，任何比喻都是以另外的事物来揭示眼前的道理，但那毕竟不是你要描述对象的本身。虽然不少文学家是学法律出身，甚至有人说一些伟大

的诗人是法学专业的叛逃者，但实则爱好者多，成功者少；谁知道从多少叛逃者中，才能打拼出凤毛麟角的几个伟大的文学家。之所以敢应承下来，跟此书缘起于我的一些照片有关。愚姐说她很喜欢我拍的寂寞雪山和热闹花草，开始时我觉得这本书或以我的图画“跑龙套”，文字由她来“唱大轴”。不承想，我试着写出的一两篇得到愚姐的热情鼓励，仿佛张良当年得到“孺子可教”的夸奖，就有了再写一篇的冲动。现在，图也好文也好，是两手硬还是两手软，都只待读者评说了。

说到图片，真要感谢这样一个数码相机的时代。体积小巧，像素千万；雁过留声，人过留影，这数码相机给我们的记忆带来了多大的便

利！自知摄影方面很不专业，相机也只是那种便携式的“板儿机”，独特的地方是内容本身以及取景的角度。这些照片能够引发愚姐的思绪和想像，还写出或快乐或伤感或发思古之幽情的文章，这是最初照相时所没有想到的意外收获。当然，读者或许会记起普鲁斯特的话：照相机不是现实的忠实记录，照相分解了现实，使之成为可以操控的、暧昧不清的所在。而通过批评家，这些原本互不相干、独立存在的影像碎片又得到了进一步阐释，共同联结成人类都市历史的另一种解读与还原。所以，照片显示的，也许更多地是摄影者的主观偏好；依据照片所写的文章，就更是一种难以预期的解释了。

在读者，这些文章和图片又能够激发怎样的二度创作？这更令我浮想联翩。好在书里留下了足够的空白。

2010年2月8日
于北京蓝旗营

四手聯彈



甲辑

壹	也苍郁，也清冽
貳	我是天空的一片云
叁	黑夹白
肆	我要孝顺羊了
伍	沙
陆	蝼盘陀
柒	为你疯狂
捌	告别喀什
玖	仰望慕士塔格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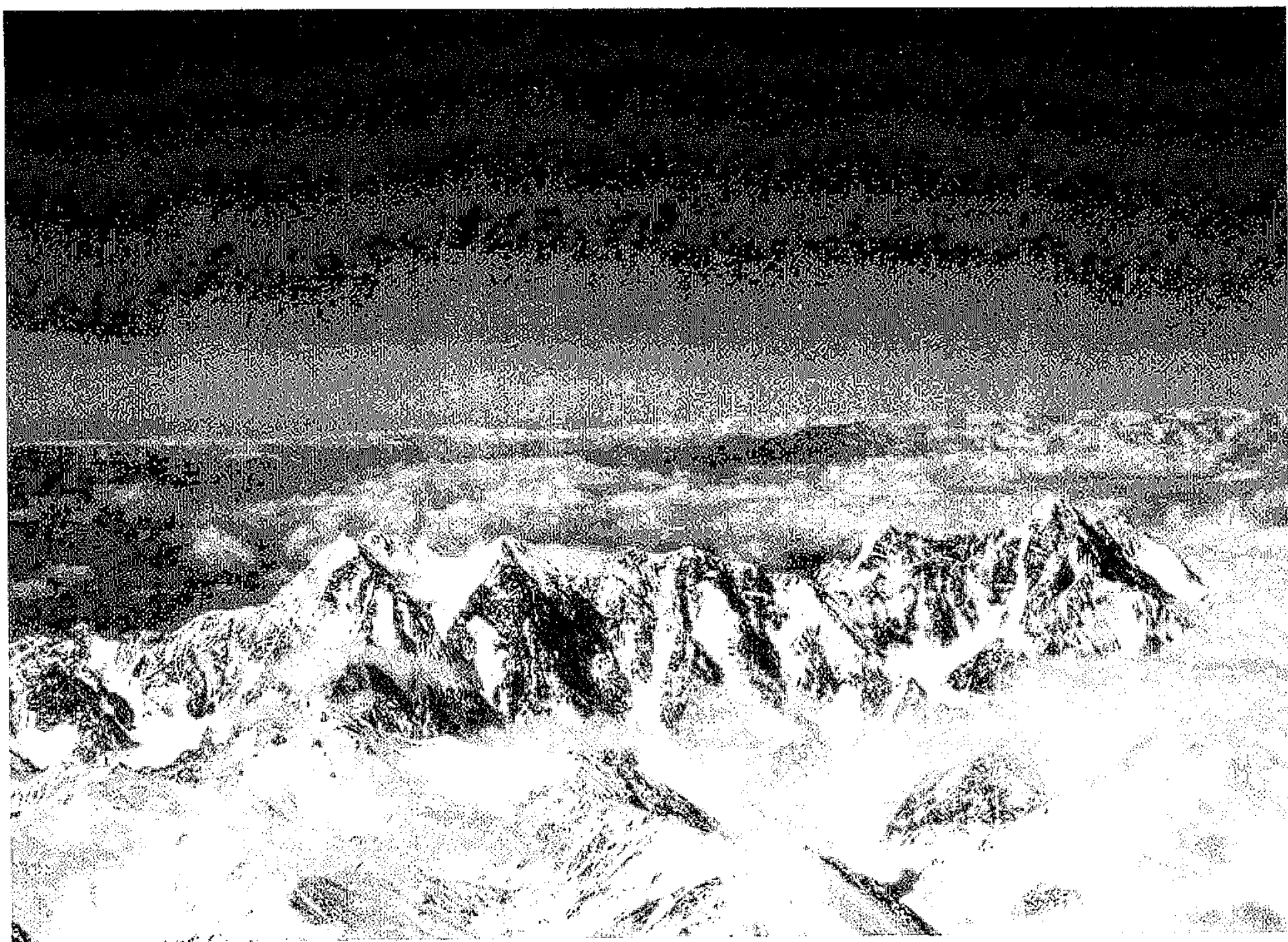
壹

也苍郁，也清冽

章诒和

2009年的贺卫方，像一只仙鹤向西飞去。在飞机上拍下这张照片，不是摄影家的他自称为“航拍”。照片发送给我，笑过后细看，蛮不错呢！说他是业余摄影家，足够的。极其凑巧的是拍摄时辰。

他去石河子大学支教，我便称石河子为诗鹤子。别人为之惋惜，我偏偏替他高兴——一个思想观念颇新、中国文人气质颇浓的学者，终有一个扑向大自然的机会了！我在信中写道：“到生命不可企及的地方去感受生命的渺小和孤绝；在非常陌生的地方找到回归乡土的亲切感觉。”小贺喜欢庄子，可比逍遥游。



茫茫天山雪，壮美复孤绝。

人生是旅程，山川亦流逝。于是，镜头里苍茫的山峦和沉郁的雪色，都带上了强烈情感，搅动着人心。“恢恢，试问青天我是谁？飞飞，上的青霄我让谁？”我很有些激动，说：天山雪景的呈现，有东山魁夷的气息，寂静而伤感。我的下一本书，想用它做个封面。真的，不开玩笑。

他答：那我以后，要用好一点的相机了，拍些够水准的。

我不知道什么叫水准，喜欢就行。

贺
卫
方

其实，愚姐对于我的西行感到高兴我是完全理解的。记得我选择离开北京到杭州时，她也没有像许多朋友那样劝我不要离开北京；也许跟她一辈子经历的风浪太多有关，处变不惊了。但是她却周到地安排送行的宴会，又提前叮嘱说：大家就是吃饭，聊天，就是不谈你离开的事情。当然，事实上每个人的言谈和眼神都让我感受到他们对我的殷殷关切。

后来的进展证明去杭州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我惭愧的是，假

离开换来真惜别；一次不成功的调动，却“赚取”了那么多的饯行宴。友人浦君甚至发短信来：“假称调动，骗吃骗喝。”让我不禁有几分汗颜。年底曾写一打油诗：

黑天望眼觅星星，
白日无光欲点灯。
梦里钱塘波浪涌，
哪知一场乱折腾。

后来的西行是不一样的事情。“到生命不可企及的地方去感受生命的渺小和孤绝”，这样的话令我感动。其实我此前已经多次到新疆，每次最喜欢看的就是快要到达乌鲁木齐机场时天山壮丽的景观。但是，成为石河子的一个居民之后，再看天山，好像有了一种不同的感受。它就在自己的身边，每天早晨拉开窗帘，总是喜欢面对那皑皑极顶凝视半晌。每次在飞机上，更喜欢多拍几张那“生命不可企及的”山顶。

东山魁夷回忆川端康成时，提到过川端对他画作的评论：“有一件事却留在我的心中，没能写到文章里。那就是东山风景画中那种内在的魅力、精神的苦恼、不安的净福和虔敬。在画面上没有表现出来，而是隐藏在深处。”

只有川端有这样的眼光。

我是天空的一片云

章诒和

小贺给这张照片取名为《草原辽阔》，但我以为画面最突出的部分是天空的白云和它投射到草原的阴影。云是飘浮的，影是移动的。影随云而动，云随风而行。云与影，都有诗意，又都无根基。属于一种不安稳、不确定的感觉。

不觉联想起徐志摩的诗句：“我是天空的一片云”。诗句仿佛就是在概括诗人自己：白云貌似自由自在，实则永远随风飘移。徐志摩追随的风就是爱情，与张幼仪、与林徽因、与陆小曼。白云投到大地上的影子，是黑色的；诗人从云间坠落是死亡，也是黑色的。



天光云影，牧草如毡。

闻一多说徐志摩的人生是“无数浪漫的组合”；到了生命的尽头，上帝之手竟把这些组合一一拆解——飞机失事地点没捡到一块整的骨头。

死得惨厉，惨厉使诗人获得空前的庄严。当然，徐志摩不是靠死亡来成就的，他有诗文，有“新月”，还有安放在剑桥校园的汉白玉“志摩石”。

石上刻着：“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贺卫方

草原，阳光，白云，雪山，山腰上浓密的云杉林……这是新疆鹿角湾的美丽风光，在离石河子一百多公里的地方。

当我与石河子大学的同事登上一个叫雷达山庄的时候，蓦然回首，看到的正是这番景致，美得难以置信。朵朵白云游荡于天空，太阳高悬，光照大地。漂浮的白云不时遮蔽阳光，并在草地上制造出一片片不规则的阴影。按照通常的说法，绵延起伏的草原好似一张无边无际的绿

毯在大地尽情铺展。跟内蒙古的草原不一样，这里还有雪山，那白色的山头矗立在绿色的草原之上，凝重、高洁且神秘。一只雄鹰从山上向近处飞过来，展翅翱翔，优雅而富于冲击力。当你真的站在这里，一眼望去，那样的感受真的可以用“震撼”这样的词来形容。

身处此景，不知为何，我的脑海里总会浮现出某些音乐的旋律，尤其是交响乐，因为这分明是太阳、云彩、高山、草原以及牛羊们之间的一种互动和交织。大自然孕育着多么伟大的力量！它使人类不致因单调压抑而枯萎。它使我们的生活寻找到支撑和慰藉。

虽然眼前并没有声响，但我耳畔似乎响起斯美塔那著名的《伏尔塔瓦河》，它的旋律尽显柔情，又富于力量。我又想起晚年的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奏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的情景。那是1988年，离卡拉扬去世只有一年的时光。十多岁的天才苏联钢琴家基辛演奏钢琴，年幼的基辛正像是这破土而出的草儿，嫩绿又肥壮，弹指间显示出不可遏制的生命力。一老一少，演绎着生命与艺术的华彩乐章。垂暮的指挥家看着年轻的钢琴家，眼睛里充溢着慈祥和智慧，与基辛回望卡拉扬时那怯生生的神态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卡拉扬那满头白发，真的会让我想到这天山之巅的皑皑白雪。

天山在老去，绿草却是枯荣交替，生生不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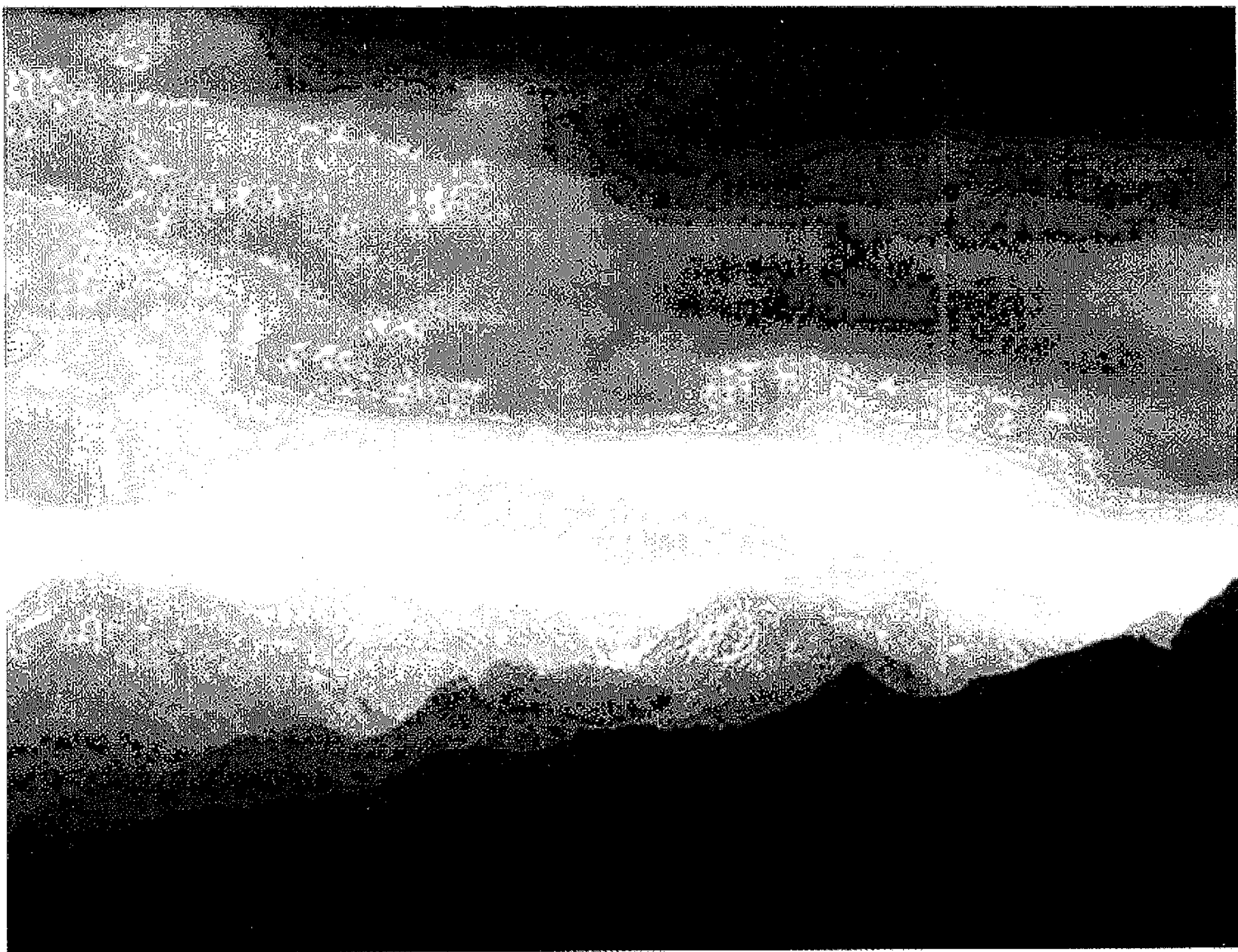
叁

黑夹白

章
诒
和

2009年6月28日，小贺与石河子大学的朋友去了鹿角湾风景区，拍了一组照片贴到了博客。他用短信通知了我，说除了照片，还写了一则童话呢。

我看后，回复：“最喜欢那张‘阴云密布’了。非常震撼！它让我立刻想到刚去世的迈克尔·杰克逊。想到他的黑发白面，黑夹克白手套，黑鞋白袜，以及他有声有色又有瑕有污的人生。所以，我把这照片取名为‘黑夹白’。”



刚才还是亮丽安详的天山，一阵暴风雨，就变成了“黑山共和国”。

短信发出，对方沉默。转而一想，糟了：人家贺教授看到鹿角湾风景，耳边响起的是斯美塔那《伏尔塔瓦河》乐章的优美旋律。我的联想阐释却如此浅俗，套一句外交辞令，当然他要“深感遗憾”了。

记得今年年初，几个朋友一起去苏州。饭后散步，突然，不知从哪家的音响里传来西方流行歌手的嘶哑喊叫。

我问小贺：“这是什么组合乐队？考考你。”

他怔住了，吃惊地望着我。

把答案告诉他，我快意地大笑！又不无得意地说：“我每天晚上都听流行。”小贺几乎难以置信，皱着眉，连连摇头——很失望，是吧？他该失望，这符合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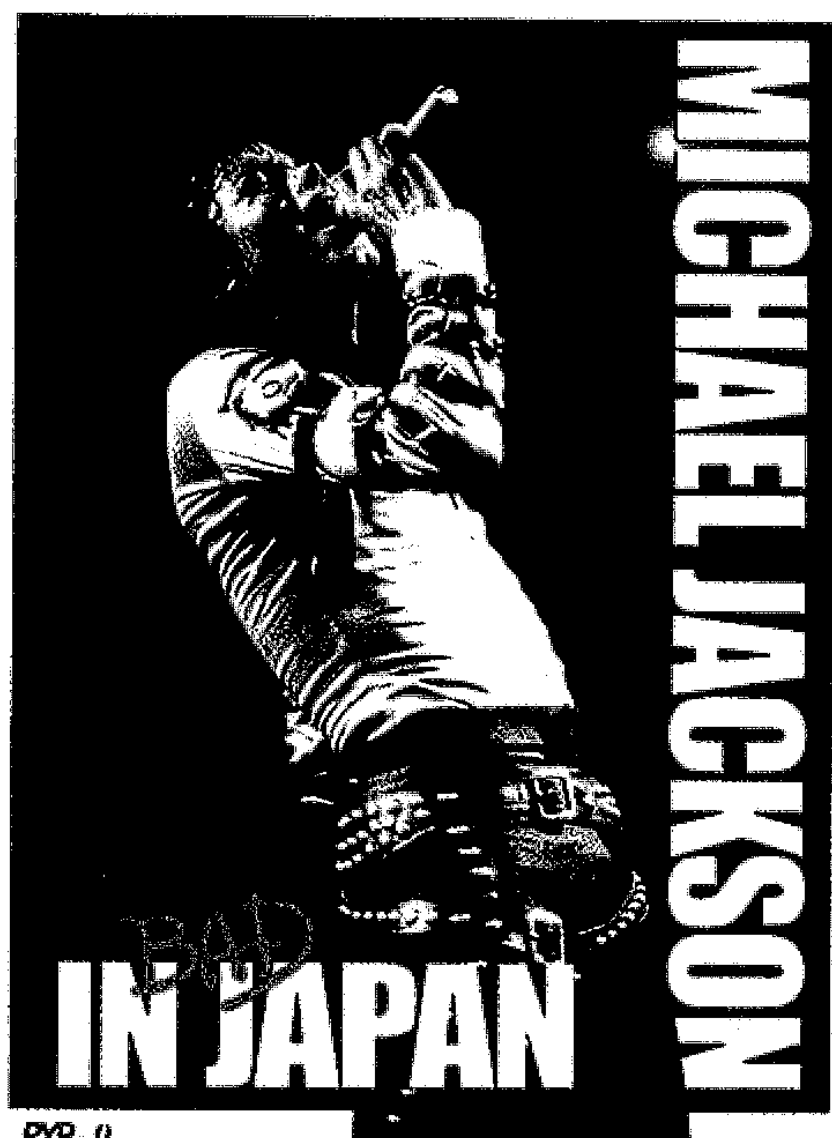
我很想说：不是不爱听西方古典音乐，而是我不能听。更准确地说，是我不敢听，不忍听。因为每晚独坐，外边是黑的，心里也是黑的。所以，我听交响乐，去音乐厅。

我很清楚：在世界音乐史上，再杰出的流行歌手也难与莫扎特、贝多芬相提并论。歌星如流星，难成永恒。但是，我的人生需要它。“敢吃了过头饭，烧了断头香。”经历恁多磨障，我真的要说：欣赏浅俗的艺术，过着浅俗的日子，挺好的。

最初，我对迈克尔·杰克逊是不怎么欣赏的，觉得太怪异，太艳俗，特别是手掌伸向两胯之间的抚摩动作，加之一声尖叫，几乎就是性挑逗。但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凤凰卫视里播放的*Black or White*，我于瞬间被征服。画面是黑白肤色的手紧握在一起，美丽的地球缓缓上升，种族各异的面孔交融相聚——这时迈克尔·杰克逊的歌声，已跨越了音乐的范畴，成为一种敲击心灵的文化力量。这种力量异常强大，强大到能迅速化解政治的、宗教的、军事的、种族的分歧与隔阂，使我们每个人心生柔情。流行音乐常常是甜甜蜜蜜，卿卿我我，但迈克尔·杰克逊的歌唱充满大慈大悲，大仁大爱。所以，他能感动全世界的人。

大陆央视很少播放迈克尔·杰克逊的节目，于是，自己就买光碟来看。我能一连气地看上五、六遍。有一首歌背景是莫斯科，雨水冲刷着街头，低迷又空寂。在这座大都市里，你和谁都没有关系，迈克尔·杰克逊独自走着，唱着，他走向哪里，我不清楚，他唱的是什麼，我也不清楚。他曾说：“舞台就是我的家，在台上怡然自得，走下舞台就很伤感。”人越红，越孤独。而且他的孤独，是属于那种找不到人生归宿的孤独。有些曲目的歌词写得很普通，但是经过迈克尔·杰克逊的演绎和演唱，效果就全然不同了。在他的声音里，包藏着太丰富、太浓烈的情感。尤其是他对人的理解，对人生不幸的同情和抚慰，非常能引起观众的共鸣。

迈克尔·杰克逊活着的时候，备受攻击和挑剔，从变容到变童。2009年6月26日，他突然撒手而去。事情一下子翻了过来。媒体和舆论刚刚



迈克尔·杰克逊。

还在无端伤害，顿时改口对他推崇备至，说他技艺如何高超，讲他如何慷慨行善。死后三天，那变童案的主角也站了出来，承认是他的父亲为了摆脱贫困，逼迫自己撒谎〔注：案件是私了的，男童得到两千三百三十万美元的赔偿金，但迈克尔·杰克逊在协议书里坚决否认自己犯有任何罪行〕。2009年11月17

日，泽西市警方公布：男孩的父亲、即指控杰克逊变童者，在自己的豪华寓所饮弹自尽——这虽然洗刷了迈克尔·杰克逊长期承受的羞耻，但他死了！

这是一个多么残忍的世界，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

什么叫天才？天才就是不正常的人。连这点起码的道理都不懂，还能有天才吗？即使有了，也会把他掐死，闷死，骂死。

贺
卫
方

愚姐说的那幅她特别喜欢的照片，摄于雨中天山。那一天我和石河子大学的同事们在鹿角湾饱览了灿烂阳光下的美景，下午3点，在一家毡房里吃午饭。不一会儿，忽然感到天色暗了下来。赶快来到外面，放眼天山，刚才的那朵朵白云已经连成一片，颜色也骤然变黑，沿着山坡俯冲下来。一时间天色如黛，草原上的那日光云影全然消失。大山深处响起几声惊雷，紧跟着，雨点噼里啪啦地就降了下来。

我兴奋地走进雨中，任凭这天上的甘露把身上浇湿。凝望远山，景

色更神奇。在很远的地方，云层稀薄之处，太阳与白雪映照之下，山腰处的树和草仍然闪着茵茵绿色，近处景致反而在昏暗之中难以辨析。光线的变化让眼前的山岭具有了丰富的层次感。云播雨，山叠嶂，美到极处，心却空旷。什么也不想，用张岱的说法，叫做“耳目不能自主”，只是痴痴地望……

愚姐从这幅照片里解读出黑与白，联想到杰克逊，我迟迟未复是因为我对于那位刚去世的歌手实在是太过陌生，竟不知如何作答。我很少听通俗流行，多半是由于自己对于古典音乐的聆听环境根本不讲求。音乐厅里固然可以，档次不高的音响甚至电脑里也照放不误。或许可以说，我把古典音乐给祛庄严化了。它们不过是自己干活时的背景音乐，听着心情好，就不去认真思考其中的意义。这多少有些不敬神明，不过也可以是一种“美到极处，心却空旷”吧。

在文章的末尾，愚姐谈到媒体对待杰克逊的做法，生前备极造谣诋毁之能事，死后却马上变脸，大唱颂歌，感叹媒体的是非不分甚至黑白颠倒。其实，演艺界甚至其他领域的一些名人得到媒体这样的对待，在如今这个社会里已属家常便饭了。当年，戴安娜也曾遭遇到媒体的疯狂追逐和揭露隐私。在她短暂生命结束前最后一次接受报纸采访时，她抨击那些小报热衷挖掘名人隐私，它们最希望看到的不是名人的成就，而是他们的错误，并且对于错误抓住不放。之后，戴安娜很快就以她令全世界震惊的死证明了小报记者的残酷无情和惟利是图。

杰克逊们的遭遇的确令人同情，不过，从一个法律人的角度看，却也是有几分无奈的事情。虽然媒体热衷挖掘隐私，耸人听闻，但另一方

面，名人之所以成为名人，也离不开这些媒体的传扬歌颂，甚至包装鼓噪。假如没有今天这样的大众传媒，一个艺术家即便是天纵之才，也无法像杰克逊那样声名震五洲，“粉丝”遍天下。无论在世界哪个地方，杰克逊所到之处，都是万人空巷，尖叫入云。他给人们带来了艺术的享受，拥趸们则报之以更高的名声和更丰厚的收入。类似的情况还见诸马拉多纳，他的崇拜者甚至创建了以马拉多纳为主教的“宗教”，直接把这位球星推上了神坛。

但是，名人也是人，他们也有常人的需求和缺陷。不仅如此，诚如愚姐所说，“天才就是不正常的人”，这种“不正常”有时体现为人情世故方面的明显缺陷，还有经年累月在媒体追逐下的心理扭曲——承受着常人难以想像的巨大压力，外表的风光难掩内心的孤独。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媒体经常让他们的隐私甚至丑陋的一面大白于天下，对于那些曾经辉煌乃至神圣的名人来说，这简直是一种黑色的毁灭性的力量。

当然，现实中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媒体对名人只报道光明面，而回避阴暗面。只是这样的要求存在着很大风险，其中最要紧的是言论自由受到损害。历史表明，对言论自由的压制往往始于对那些低级庸俗言论或信息的封杀，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封杀还可以得到一般公正舆论的赞许。但是，低俗言论与信息正是一个健康的言论自由环境的组成部分，如同名人也有未能免俗乃至为主流道德所不容的一面一样。名人无法做到完美无缺，媒体也只能是这种不完美状况的一面镜子。

名人黑中有白，媒体白中夹黑。这不就是我们这个让人爱恨交加的灰色世界的真实写照么？

肆

我要孝顺羊了

章
治
和

2009年7月，从大陆央视“新闻联播”和香港凤凰卫视“时事直通车”里，同时获悉：最近，日本科学家从羊的体内培育出猴的器官。

电视里说：这是一个好消息！它有助于最终解决人类器官移植的难题。这比人体的器官移植要好得多，因为没有排异性。怪了，人和动物关系原来比人与人还要亲呢。想自己的亲身经历，不也是这样么？先生去世，终日守我的是一条老狗，守到气绝而亡。我哭狗的眼泪，一点不比哭人少。

电视里又说：用羊来培植，比以往用猪以及其他种类的动物都好。这不仅是由于羊的性情温顺，更因为它是全世界所有民族、任何宗教都能接受的。

我一直喜欢羊。在我眼里它们比美女还楚楚动人，无论是一只，还



一群羊在“涝坝”边上“饭青草饮水”。2009年5月29日摄于玛纳斯河畔。

是一群。2009年，我在苏格兰看着那些以天地为伴、以日月为邻、白天闲散觅食、夜里相拥而眠的黑头羊们，竟感动得掉泪。回到北京，还老惦记着，活像害了相思病。小贺把他拍摄的“羊群”给我看，又勾起我的相思债。若有来世，我要去做黑头羊。当然要呆在苏格兰，因为那里没有放牧者和牧羊犬。

有这样好的科技消息，今后我要孝顺羊了。若患肝癌，它能救我。比爹妈能干，比子女管用。

伍

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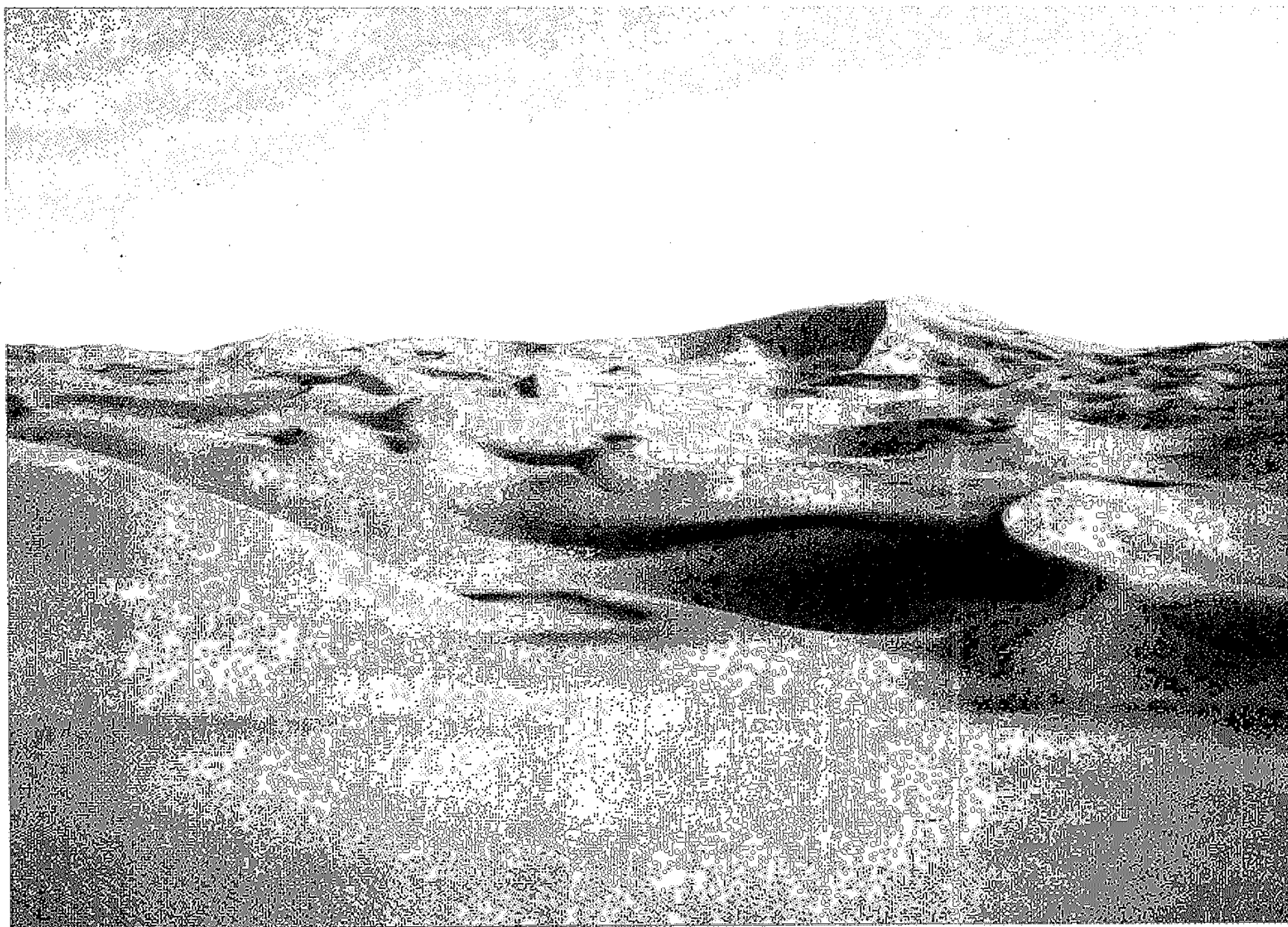
章
诒
和

我喜欢望海，我喜欢看沙。

第一次望海是在1947年的香港；喜欢望海则是在1949年即将离开香港的时候。一天，母亲告诉我，一家人要北上了。

我问：“什么叫北上？”

母亲低声说：“到北平去。”



新疆鄯善的沙漠。

“很远吗？”

“很远。”

我再问：“北平有什么？”

“北平有个毛泽东。”

“毛泽东是什么？”

“一个人的名字。”

.....

离港之前，母亲带着我和姐姐最后一次吃了冰淇淋，最后一次坐渡船。下午，我们从九龙渡到香港；深夜，从香港渡到九龙。望着黑黑的海水，亮亮的灯光，静静的港口。我突然想哭，舍不得这样美丽的海水与夜色，还有好吃又好看的冰淇淋。我什么话也不讲了，靠着船舷死盯着海！我也知道了：北平啥都有，就是没有海。

若问自己，是什么时候喜欢沙的？说起来可笑，是从一个装满沙子的玻璃瓶开始的。上个世纪80年代，国家迎来了“改革开放”，我家迎



沙瓶。

来了隔绝数十年的海外亲朋。母亲从小的同学、后来成为远亲的周女士从巴西飞来。她带来几样礼物。其中一件就是巴西沙瓶——一个小小玻璃瓶，里面装着用彩色细沙制成的一幅图画。我很吃惊：沙子可以成型，沙子可以有色，沙子可以成为画作。我对母亲说：“把这个瓶子给我吧。”

母亲点点头。从这一刻起，我喜欢沙。

我去泰国，从印度洋的沙滩上，装回一小瓶沙。

我去土耳其，从地中海的海滩边，装回一小瓶沙。

我去美国，从大西洋的海边，装回一小瓶沙。它是彩色的，由我亲手制作成型。我把这几个瓶子放置在一起，自我欣赏。

看了沙滩、有了沙瓶，我开始向往沙漠。特别是读了台湾三毛的作品，看沙漠简直成了抑制不住的狂想。我购买的挂历，多为沙漠图景。太奇怪了，很多沙子飞上天空，就成了灾；很多沙子积聚大地，就成为景。

2001年以后，我在多次的聚会中对朋友说：自己绝不贪生，一旦把当道之事做完，就自我了断。了断的方式有二：或向东，淹没于大海；或向西，消失于沙漠。我的一个同事听了如此诗意的死法，当时就表

态，与我同行！人的一辈子都在寻找：从最初的找奶，到最后的找死。村上春树也说了：“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是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所以我深信，死亡是可以选择和设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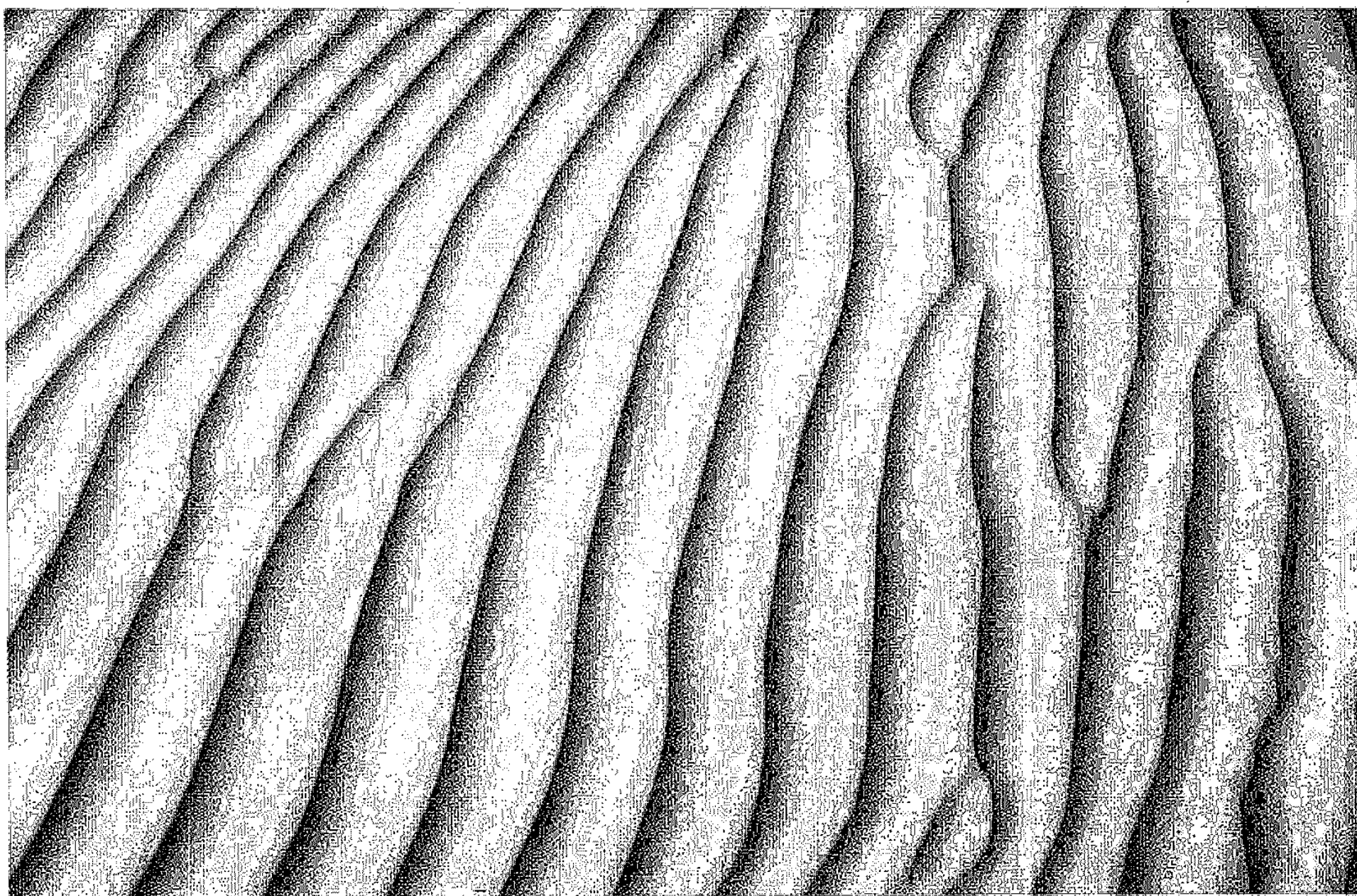
2009年夏我到新疆，终于看到了沙漠，也终于把狂想变成了狂喜。我快步而行，鞋里全是沙。毫不在意，只想一个人独自体味沙漠，体味沙漠之热，想像沙漠之死：大风起兮，黄沙扶摇八万里；我的阴魂即飞舞，也涕泣。看那浩淼的沙与海，人最有身世之感。由此，更理解旅游于我的意义——无非是寻个名义，找个借口，真正需要的是寻找到一块陌生之地。面对陌生，可以暂时忘记现实，仔细回忆从前，尽情想像未来。在一个没有灵魂的时代，它是多么地美好。

算了算：从看沙到看沙漠，我用了六十余年。一辈子啊！

贺卫方

我小的时候，对于沙并不陌生。

塔克拉玛干沙漠上的沙纹。



家乡，离黄海只有四公里。走上两公里，便进入海边的沙滩。那里的海在北边，沙滩就俗称“北沙”了。沙滩上有一公里多宽的密密实实的松林，是为了防风而种植的。过了松林，就看得到蔚蓝色的大海了。夏天到海里游泳，游累了就躺到被太阳晒得暖洋洋的沙子上；或者用沙子把自己覆盖上，好像盖着一床温暖的被子。闭上眼睛，脑子里充满着各种奇奇怪怪的念头。耳畔听得到海浪与松涛交织着天籁一般的声响，睁开眼，起伏的山岚身姿优雅，白云在高高的天上缓慢地飘动……直到今天，这样的场景还会进入我的梦乡。

后来，我也到过不少海滩。北方的青岛、大连、北戴河，南方的厦门、惠州，还有三亚的亚龙湾，台湾的淡水湾，日本的北海道，甚至包括加拿大五大湖的沙滩，无论比沙子的洁白、细腻和清爽，还是论大海、沙滩、松林以及远处的山景之间搭配得那样匀称而亮丽，我不避“谁不说俺家乡好”之嫌，自己总觉得还是牟平到威海之间的那一片海滩是最美的一处。

当我第一次走进新疆的沙漠的时候，却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完全不同的沙：没有了绿色的植物，没有了蓝色的大海。放眼望去，是一片望不到尽头的沙之海！它也有浪，那是风所塑造出来的巨浪般沙丘。沙丘高低起伏，变换多姿。新月形、复合形、金字塔形……巨浪的外表，是细腻可人的波纹，有些还特别规则，仿佛人工雕刻而成。假如是大海，那么高的浪可能就达到海啸级别了。不过，在沙漠的海洋之中，你还是可以不停地跋涉，像是冲浪健儿那样。越过一道沙丘，前面仍然是沙丘；再爬到高处，又是更高的沙丘。无休无止，不知何处是尽头……

刚才提到海啸，其实当沙漠里卷起飓风的时候，那气势也一点也不亚于海啸呢。我们来到沙漠的时候，已是深秋，塔克拉玛干沉寂安详。

我们尚未看到过它的另一面。不少当年的探险家，都曾描述过他们所经历的沙漠飓风：先是在遥远的地平线上腾起一种红黄色的雾气，很快它就向眼前逼近。刹那间，狂风大作，沙尘顺势拔地而起。刚刚还是晴空万里，转瞬已是天昏地暗了。这沙之舞还伴随着雷鸣般的声响，按照日本探险家橘瑞超的描述，即便是当地人，听到这种可怕的声音，也都默不作声，浑身发抖。

沙暴，在当地的语言中被称为“卡拉布朗”，汉语的传神翻译叫做“黑飏”。与其他地方的飓风一样，黑飏也会形成圆柱形的沙之塔，在浩瀚的沙海里向天上升腾。古人诗句里的“大漠孤烟直”和成语里的“聚沙成塔”，在此能够得到“另类”的解读。总之，在大自然面前，人的想像力可以获得最大限度的发挥。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难揣度，沙漠中的旅行者遭遇黑飏时当有怎样的危险。可怕的是迷路！总在一个区域兜圈子，直到绝望而死。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1895年第一次穿越塔克拉玛干时，就遭遇过黑飏，也遭遇到断水。同行者六人，三人永远埋在了茫茫沙漠之中。九死一生的赫定索性给塔克拉玛干取了个别称：“死亡之海”。在维吾尔语里，塔克拉玛干的意思是“有来无回”，据说另外的一个意思是“逝去的家园”。后者，乍听起来很温馨，细想却极其悲辛——但愿生命消失在此的人们，又在某个故园获得再生！

愚姐在沙漠上一路前行，把我们几个都甩得远远的。看到她的这篇文章，我才知道她对于沙漠有那么深的情感。

她说要选择沙漠作为最后的归宿。而此刻的我，还在怀想东海窄窄的海滩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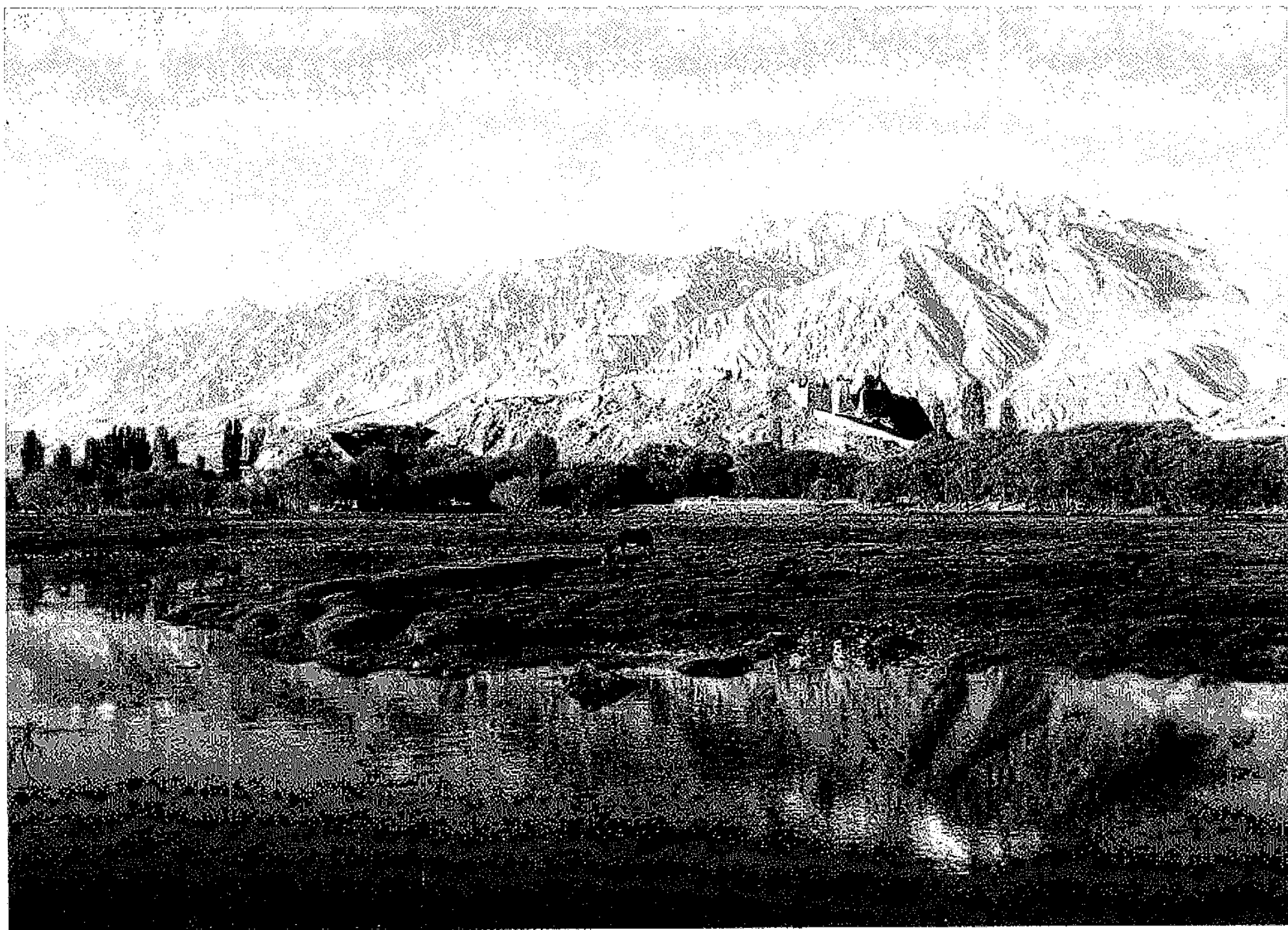
陆

羯盘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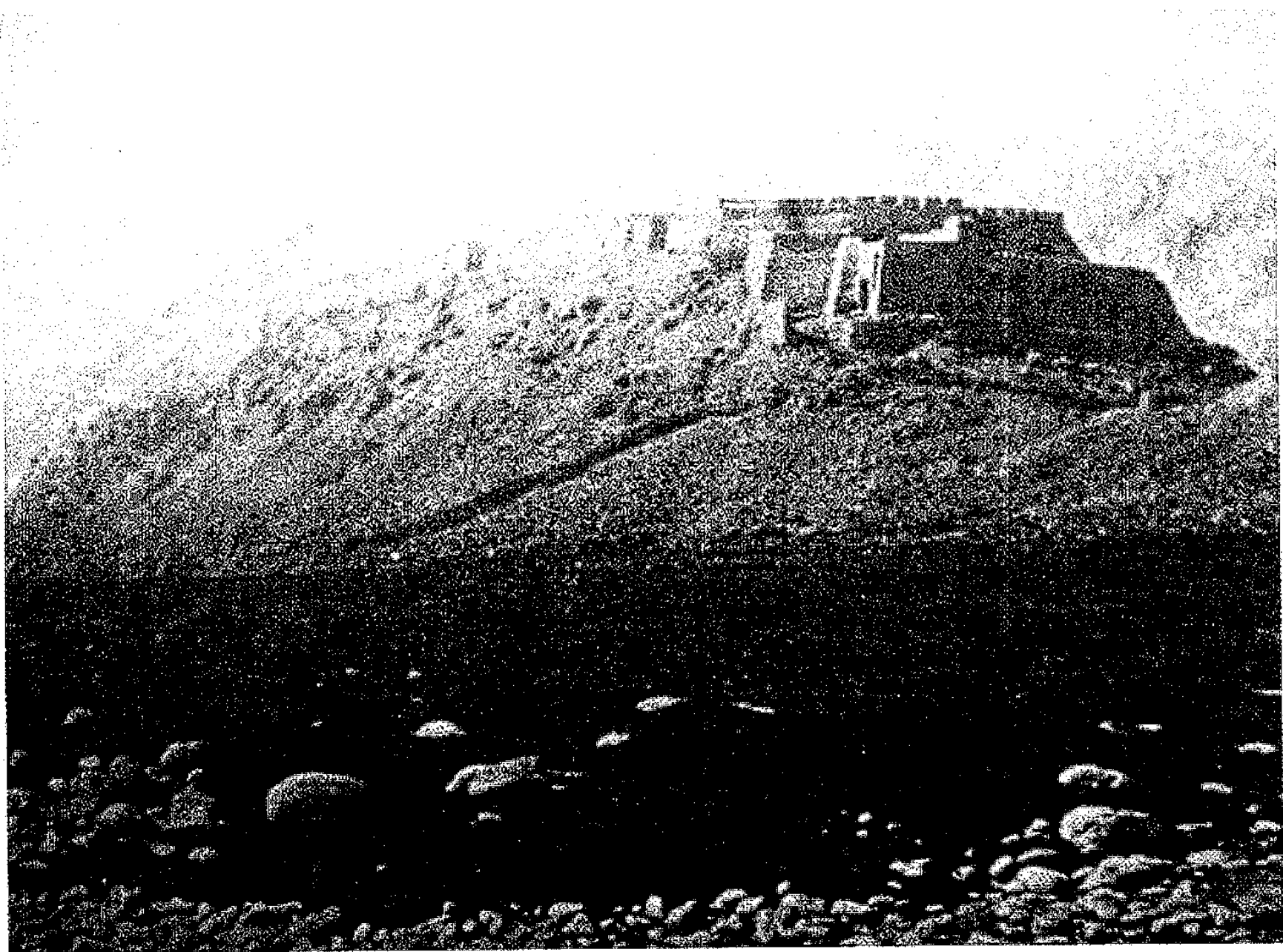
贺卫方

经过十多年在印度的留学与讲学，玄奘决定返回祖国。

回程的路线与来时不同，他选择的是从北印度直接翻越兴都库什雪山，在明铁盖山口进入塔什库尔干，再经丝绸之路南线回长安。与来的路线比较，归程要近得多。不过，翻越帕米尔高原的艰巨是难以想像的。据说，归程的队伍出发时有百多人，翻越大雪山的过程中死的死，散的散，最后只剩下僧人七位，脚夫二十余。进入塔什库尔干境内时，又遭遇劫匪，连驮经的大象都受到惊吓，坠入深谷而死。三藏和尚能够大难不死，也真是靠佛祖保佑了。



在塔什库尔干城外草甸看到的石头城遗址。



当年斯坦因所拍摄的石头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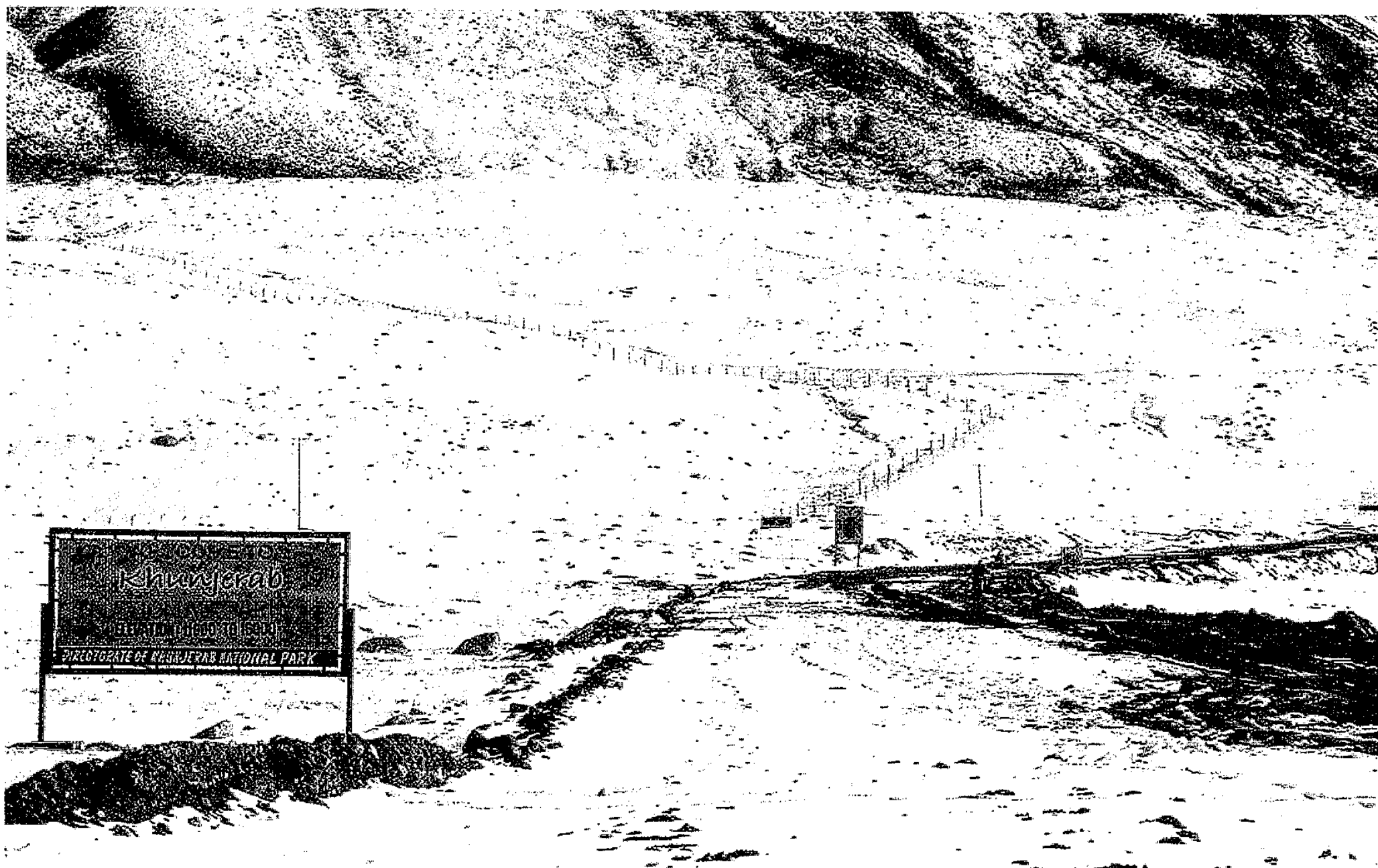
今天看地图，我们会发现，玄奘当年经过的明铁盖达坂正在中国边境著名的红其拉甫口岸的对面。我们有幸在距离唐僧归国一千三百多年后，来到这个地方，体会路途的艰辛。当然，今非昔比，现在的交通已

经便利多了，只是某些困难古今无异，例如高原反应。红其拉甫海拔约五千一百米〔一说四千八百米〕，坐在车中，随着高度的上升，慢慢地就觉得头疼、目眩，此外还有腹胀。难怪这一带的高山被称为“头痛山”。行进至此，我回头看——愚姐的嘴唇已经变成紫色，一路说笑的她已然变得寡言少语。

终于看到了竣工不久的新国门。下得车来，陪同的本地朋友一再叮嘱，千万不能快速走路。于是，大家的动作都有点像是“慢镜头”。承蒙我方哨卡的朋友联系，一位巴基斯坦边防警察在这里等候，他还慷慨地允许我们走出国门，到巴方一侧看看。头疼愈发剧烈了，不敢久留，赶快强颜欢笑地跟那位热情的巴基斯坦警察照了张合影，匆匆上车赶路下山了。

是夜，下榻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石头城宾馆。县城海拔三千一百米〔一说四千八百米〕，虽然还是很高，不过，高原反应已经没有了。塔什库尔干，西文叫做“Tashkurghan”，是突厥语的拉丁化，Tash意为“石头”，kurghan意为“城堡”。该县旧称蒲犁县，1902年设蒲犁分防厅，1913年改厅为县，20世纪50年代初设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在玄奘路过的时候，这里是羯盘陀国，一个信奉佛教的小国。在《大唐西域记》通常要言不烦的行文中，关于羯盘陀国，玄奘却讲了一则不短的故事，基本上可以作为该国的立国简史了。

原来，这里本不过是葱岭即帕米尔高山峻岭中的一片荒川。不知何



红其拉甫口岸巴基斯坦一方的景色。



年，西边有国名唤波利刺斯，也不知是西域君主羡慕汉人貌美，还是汉家朝廷要通过和亲之策强化国际友好，反正那波利刺斯国王要娶一名汉女为后。人选确定，使臣来迎，护送未来的王后一路行走，不巧在此地却遭遇战事，东西路断。为防意外，随行人员将汉女安放在孤峰危崖之上。警卫周密，不敢大意。烽火三月而熄，正欲前行归国，却发现汉女已有孕在身。众人惊恐万分，不知哪个胆大妄为的家伙，居然捷足先君王而登。故要查出元凶，奈何“讯问喧哗，莫究其实”。此时，陪伴侍女却站出来作证，说怀孕的原因是“每日正中，有一丈夫从日轮中乘马会此”。原来属于“神来之笔”呢。但是，这理由恐怕难以跟波利刺斯王说清楚。使臣犹豫再三，索性决定滞留不归，就扎根在此地，筑城为国，立那未婚先孕的汉女为王。那位汉家女子“至期产男，容貌妍丽。母摄政事，子称尊号。飞行虚空，控驭风云。威德遐被，声教远洽。邻域异国，莫不称臣。……以其先祖之世，母则汉土之人，父乃日天之种，故其自称汉日天种。然其王族，貌同中国，首饰方冠，身衣胡服”。

这故事实在是奇妙得很，“飞行虚空，控驭风云”，令人想起小说里陪玄奘西天取经的孙悟空。不过，在玄奘的时代，他看得到这里的人们头戴汉人方冠，听得到口耳相传的故事，或为信史也难说。遗憾的是，世事变迁，羯盘陀国早已灰飞烟灭。今天这里八成以上的居民是塔吉克人，高鼻深目，属于典型的欧罗巴人种。那“汉日天种”的人们早已不知融合于哪个部族之中了，剩一座破败的城堡遗址在县城北侧，孤零零地挺立着。

次日清晨，大家一起来到城堡遗址下的草甸上，朝阳把城堡染上一层诱人的肤色。绿茵茵的草甸上，塔吉克人的驴子在悠悠地行走。遥想千年，这城堡见证过多少兵连祸结，多少人事变迁。面对尘封的遗迹，不免感叹岁月易逝，人生苦短。回首张望，仿佛有着灵魂的石头城却依旧令人流连忘返。

柒

为你疯狂

章诒和

“我要看胡杨，想得我都快疯了！”这是我对小贺反复念叨的一句话。他自然听得懂，意思就是一定要找个机会去看胡杨。所谓的机会，并不在于我们有无闲暇，而是在于胡杨的叶子是否都已金黄。半黄，那是去早了；枯黄，那是看晚了。为此，我买了有关胡杨的图册，又上网查寻关于胡杨的信息，还咨询了乌鲁木齐旅游局副局长。

胡杨，又名胡桐，是一亿三千万年前孑遗的物种，也是沙漠惟一生长的乔木。世界上仅存三大胡杨林，分布于中东沙漠、塔里木河流域以及内蒙额齐纳。现在因航天城坐落在额齐纳旗，央视做过充分报道，那



阳光下的金色胡杨。



美丽依附于严酷，生命再现于死亡。



里的胡杨“火”了。最初，我是准备去额济纳的。后来，我买到一本介绍性的图册〔王金摄影、胡杨撰文，《中国胡杨》〕。作者说，全世界百分之九十的胡杨在中国，中国百分之九十的胡杨在新疆，新疆百分之九十的胡杨在塔里木——我立即决定放弃额济纳，去塔里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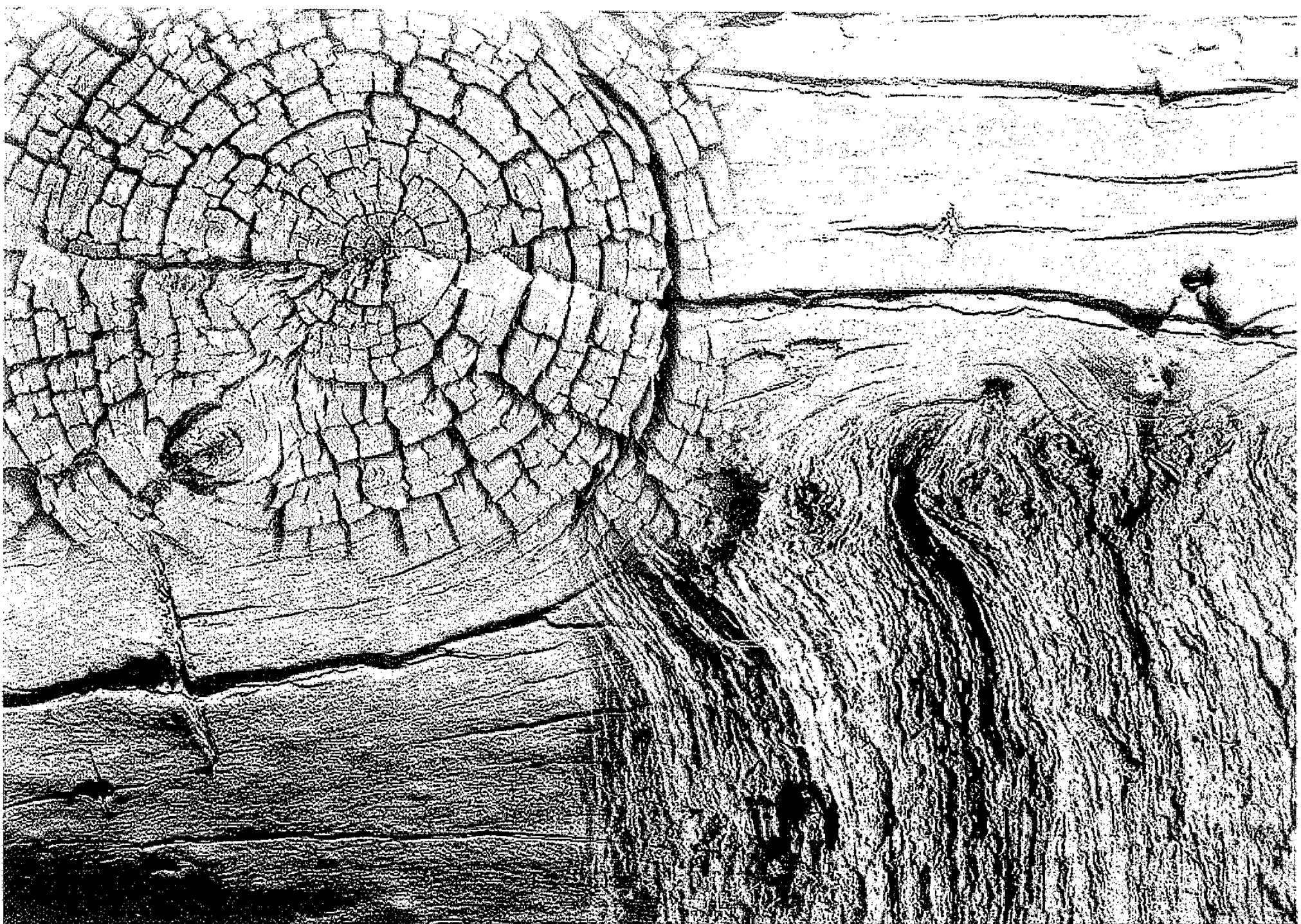
我与小贺以及陆先生等人约定，在乌鲁木齐碰头。2009年10月21日，我第三次来到新疆。我们穿过库尔勒，沿着沙漠公路，走进塔里木胡杨林。路边，在高高低低的沙丘上，耸立着远远近近的胡杨。胡杨用每一片金黄的叶子，展示着人间秋色，守望着大漠黄沙。我们不断地驻足观赏，小贺与陆先生拍下不少照片。据说，沙丘最能体现胡杨的风范，也最能反映胡杨与沙漠的共存关系。维吾尔人给胡杨起了个名字，叫“托克拉克”，意为“最美丽的树”。胡杨的美丽依附于严酷，生命再现于死亡，顽强又悲壮。为了抗干旱，挡风沙，耐盐碱，胡杨的根系超乎想像的发达，可深入地下一二十米，方圆一百米以上。树的内里无年轮，树的外表呈无规则纵裂沟纹，裂痕深如壑，看上一眼，血就热起来。进入树林深处，人便激动得无法控制，心在颤栗：惊骇，苍凉，绝望，恐惧，极具赤裸感的犀利，足以击碎任何一个人的虚伪，乃至自尊。一切都是颠覆性的，太不可思议！

胡杨有着哲学命题般的深刻和丰富，我能看它一生，想它一世。无论是色泽金黄，还是一片干枯，都是绝世高贵的姿态和神情，并蕴涵着悲剧性精神的内涵。这使我不由得联想起中国的赵氏孤儿，西方的俄狄

浦斯王，含冤负屈的孤魂和无数忍辱负重的百姓。中国士大夫对荒芜、凋零、残破与颓废，一向有着高度的审美经验和文学阐释。如，家族的衰败，王朝的坍塌，生命的夭亡，一代文人的命运。而高贵的金色与酷烈的死亡——胡杨两个极端的呈现，为我们打开了辽阔的想像空间。这是一个久违了的想像空间！创伤，死亡，孤绝，宿命，都是永恒的概念，都是历史沉思的形式。它产生的神圣感和精神力量，超过文字。

相关资料告诉我们，胡杨的用途极广，胡杨树叶可以喂养牲畜，堆积在地上的树叶，是很好的肥料。胡杨的树枝，是当地居民做饭的燃料。胡杨树干，是顶级木材。据说，世界上意大利顶级小提琴的琴身就是用它来制成。你若去尉犁县的罗布人村寨，随处还能看到用胡杨木垒建的房舍、羊圈，以及板凳、床、桌、面盆、独轮车、棺木等各种工具和用具。所以那里的人讲，在一片沙漠和持久的干旱中，谁看到了胡杨林，谁就找到了希望。我第一次听说，胡杨还有泪。那泪就是胡杨树上分泌出的一种汁液。“胡杨泪”可以解渴，风干后的“胡杨泪”，就是胡杨碱，牧民用它蒸面食，“熟”羊皮。这里，就更不用说胡杨林对防风防沙、改善生态环境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了。

这诸多用途，是胡杨的突出优点，也是胡杨的极大不幸。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塔里木胡杨从五十二万公顷减少到三十五万公顷，约缩小了三分之一；到了塔里木河下游，则减少了三分之二以上。林木自身的衰退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所致。人



054

性深处有一种野蛮的力量，无比顽强的胡杨在人类无比野蛮的面前，是多么地弱不禁风，不堪一击啊。塔里木河公路其中的一段，叫砖砌路。它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砖砌路。你能想像吗？铺路的几亿块砖全都是由塔里木河周边的胡杨木烧制而成！胡杨“一千年生而不死，一千年死而不倒，一千年倒而不朽”，它为恶劣环境而生，为尊严而存。可惜，它遇到比恶劣环境更恶劣的人类。结果，胡杨败给了人类。它们死了，倒了，朽了，被烧成灰、制成砖，被我们踩在脚下。

回到北京，我照常去附近的日坛公园散步。小路两侧的白果树，也是一片金色。白果树的黄叶也是很美的，但我已无激情。倒是有棵古松在秋阳下，默然站立，树的大半已死，而枯枝丫依旧停留在树上，不肯离去。看着心动，这有些像胡杨。

左图：胡杨无年轮，外表裂痕深如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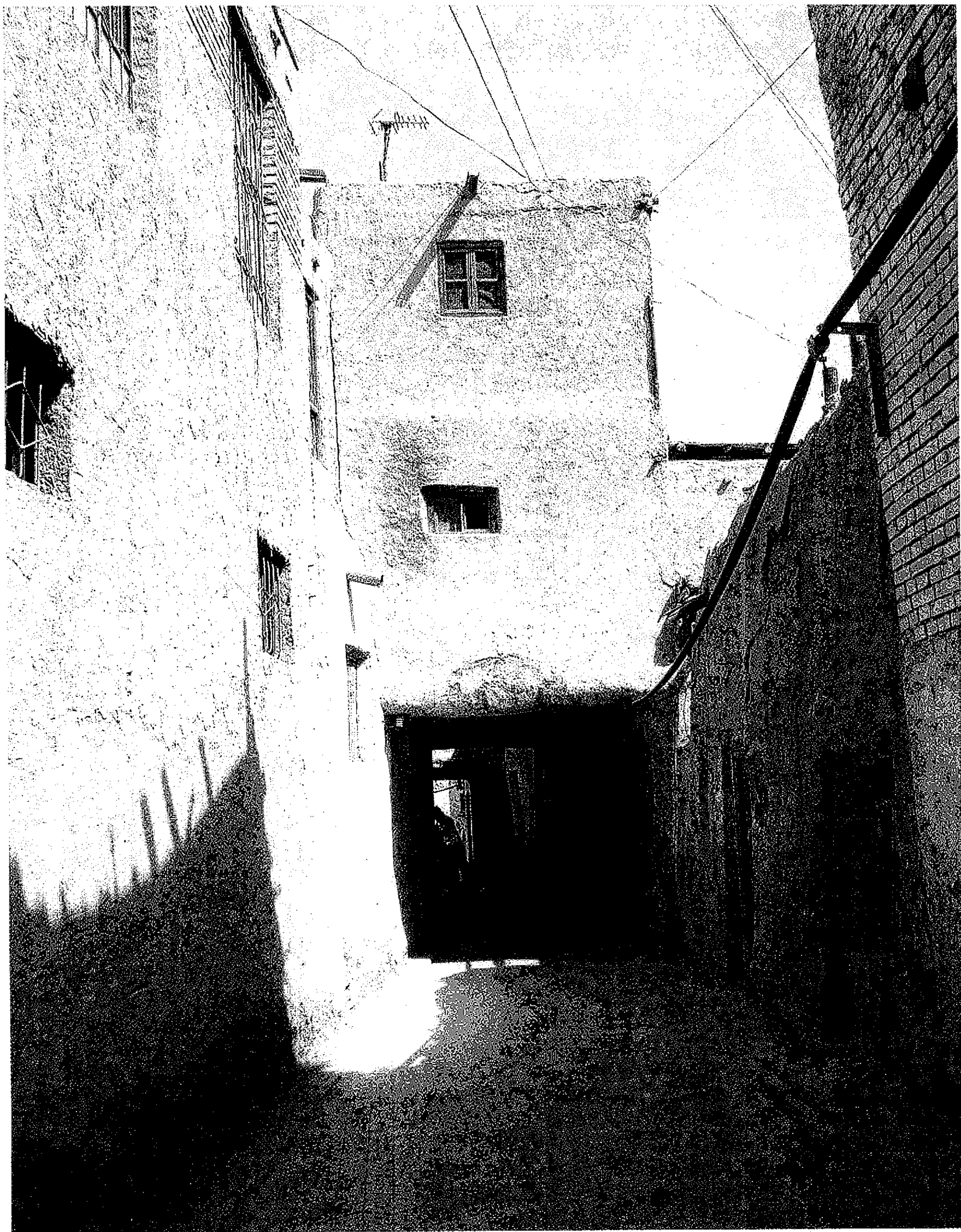
捌

告别喀什

章诒和

2009年春季，在一本国内颇有影响力的杂志的封面上，端端写着“告别喀什”四个大字，字的背后是落日余晖中的喀什古城。我非常吃惊——怎么回事，难道整座城市都要铲平？立即电话联系新疆的朋友。从不同的渠道，传递出相同的信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也为了改善市民居住条件，上面决定彻底改造喀什老城，并斥资数十亿建造新居〔自然是现代化楼房〕。朋友还说：“大姐要来，就赶快啊，拆迁已经开始了。”有了太多的历史经验，深知所谓的“改造”是个什么含义。我们的许多历史遗迹，就是在“改造”中消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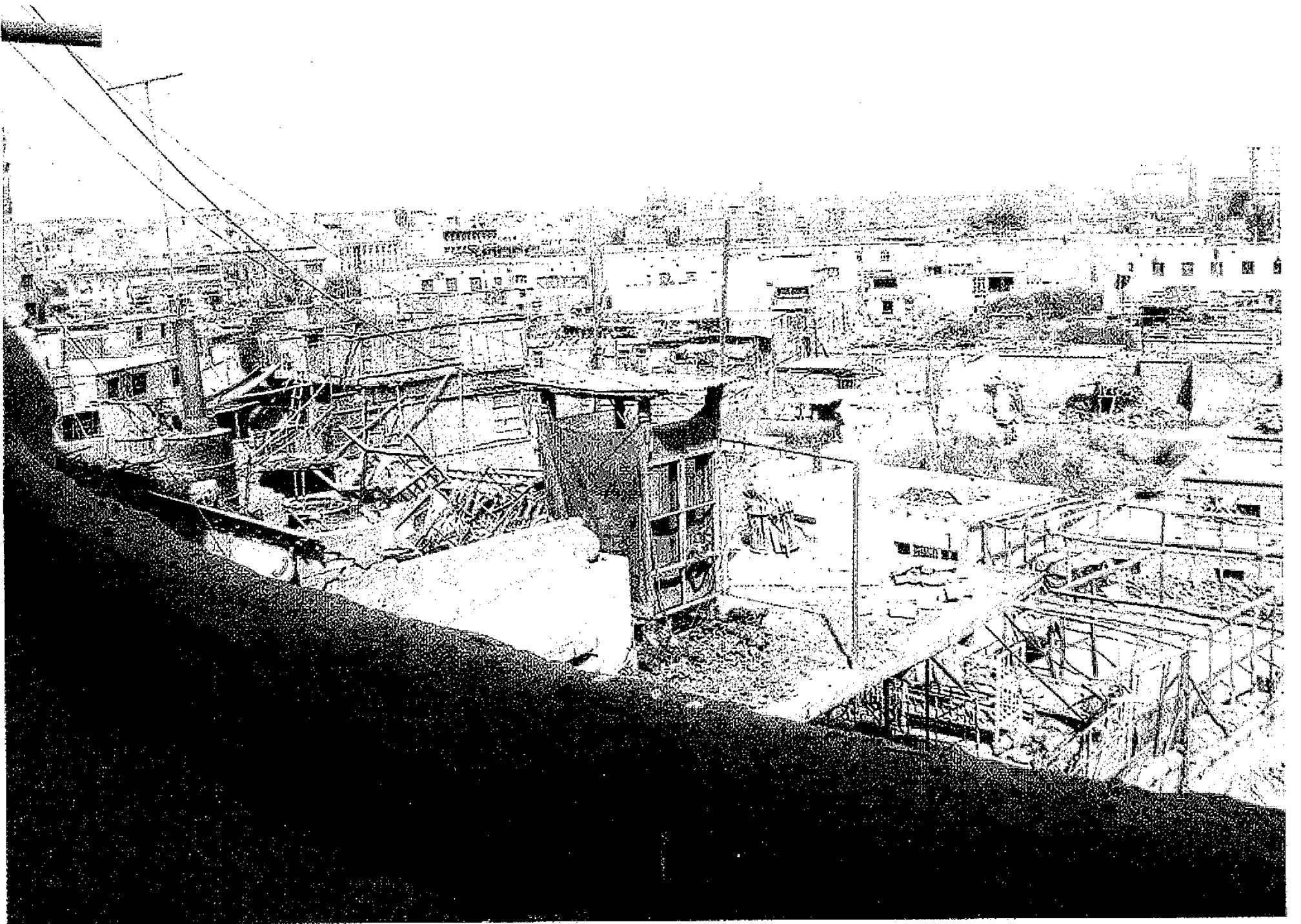
右图：喀什高台民居。



我和小贺去喀什，已是8月下旬。一路行来，彼此的话都不多，抓紧时间看，抓紧时间走。果然，老民居的一角已被拆光，裸露出平整的地面。我久久地望着，心潮难平。

喀什，喀什噶尔是其全称。它曾是公元前2世纪西域古疏勒国的国都，也是公元10至13世纪初，喀喇汗王朝〔亦称伊列克汗朝〕的王宫遗址。经过数百年的历史沧桑和政权更迭，这些纵横的小巷，幽森的老屋，层叠的土楼，依旧完好无损。里面居住的两千多户维吾尔族居民，多为旧日王朝贵族后裔。由于血统高贵，也由于持守传统，这里始终保持本色。每家每户的住房格局大体相同，都是带庭院的小楼，大门为木质，有的漆黑，有的涂红，而原色居多，结实又考究。门楣之处多绘有典型伊斯兰特征的以叶状绘饰衬托的库符[kufic]字体纹样图案。这种长条横饰带状上的书法，具有强烈的视觉效果。哪怕只看上一眼，你就会明白自己来到了穆斯林世界。引导我们的年轻维吾尔族姑娘还说：若大门紧闭，你千万别冒失地敲门，这意味着男主人不在；若一扇开，一扇关，那就是告诉你，只有男主人在家；若两扇都敞开，你则大可以放心进去做客了，夫妻二人都在里面。

维吾尔族姑娘大多很可爱，最动人的部位是一双眼睛，又黑又亮，特别是当她注视你的时候，目光坦率而热烈，并使得整个身体都生动起来。但是，她们居住环境的风格似乎与性格相反，周折弯曲，扑朔迷离。别说一眼看不透，可能永远看不透。外面的人走进老城，横七竖



高台民居正在消失中。

八、纠缠交错的小路，岔路，短路，长路，直路，弯路，顿时叫你晕头转向，甚至转上一天，你都会转不出来。带路的姑娘告诉我们一个走路的经验：即老城的路面，是由两种形状的地砖铺设而成。一为六角形，一为四角形。六角形路为活路〔即走得通的路〕，四角形路为死路。结果，我们走路就变得像猜谜一样，看谁踏上通途，瞧谁闯入死境。

我和小贺等人征得主人的同意，走进一个宅院。正面的大房间是客厅，装饰浓艳，花花绿绿的，有化纤垂帘，有毛织地毯，有丝质靠垫。旁边的起居室较小，但电视、冰箱等电器用品，都很齐全。整座居所结构异常繁复，房中套房，屋上架屋，于是，我们就在迷宫一般的楼房里转悠，转悠至顶层，满以为是到了露天阳台，结果又错了。顶层一小半是露台，另外的一大半，是厕所，是禽畜圈棚，还有一个制作皮货的工作间。我很好奇，为什么要把一些有气味的房间安排在顶层？女主人说，顶层空气流通，气味才好飘散。这家的男主人是位工匠，专做各式羊皮帽子。尽管有满脸的胡须和皱纹，但相貌英俊。尤其是脸的轮廓线条，颇具雕塑感。我情不自禁地抱住他的肩头，请陆先生给我拍个照。

最让我流连忘返的，是一家维吾尔族旧货店〔也有些古董〕。店家说，现在的生意太冷清，自己年龄也大了，想把东西卖光后，就此关张。想到老物件也要和老房子一起消失，害得我看什么，都不舍，也都心疼。大到胡杨木车轮，小到一面袖珍镜子，重到巨型石槽，轻到一张手写古兰经，应有尽有。单是服饰一类，就塞满了几个长柜。有丝质，有麻

质，有棉布的，也有毛织的；既有似花叶图纹的成衣，也有精针细缕的绣作，几乎每件东西都落满灰尘。我也顾不上讲卫生，把它们都抖落开来，细细欣赏——真的，件件都很漂亮。维吾尔族服饰的图案丰富多变，古朴凝练又明快华丽，充满装饰性和跳动感，这很像他们的歌舞。我感到维吾尔族人的生命内容，很大程度上是以美的形式呈现出来的。他们的一生都在“游戏”，是人生的艺术化。为了留个“念想”，我买了一块用于印染的木模，那上面镂刻着一株波转流畅的西番莲花枝。小贺也在东翻西看。突然，我俩不约而同地对一把异型剪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剪刀呈月牙形，锋刃厚重；剪刀柄镶有象牙，牙色泛黄；而整把剪刀，都镌刻着装饰性图案。

我低声问小贺：“这样的剪刀做什么用，你知道吗？”

他摇摇头。

我问售货的年轻姑娘。答：“不是有个刑法嘛，抓住小偷要切去手指。这个剪刀，就是用来切手指头的。”

天哪，原来是刑具！我和小贺惊骇不已，也兴奋不已。

接下来，就是讲价钱了。由于要价太高，我俩一致表示放弃。但回到宾馆，我俩又都同时后悔。返回北京，我立刻给新疆朋友打电话，请

他务必帮忙把那把剪刀买下。朋友满口应承，笑着说：“放心吧！现在的新疆人是不会买的。”我非常喜欢这个旧货店，甚至这样想：谁愿意把这个店盘下来，找个大厅好好陈列起来，再配以说明文字，那就是一座维吾尔族的民俗馆了。原来人获得快乐可以如此简单，不要华服珠宝，不要美味佳肴，更无需奢华排场，只要你怀揣一颗自在的心。

在喀什的日子，没有见到毛驴，没有看到骆驼，到处是汽车和摩托，连老民居狭窄的砖砌小巷里，都会猛然驶出一辆锃亮的摩托车来。不管老民居是否被保留，中世纪社会的风貌和遗存尽管依稀可辨，其实远了，远了。

贺卫方

如问喀什之行，有什么最遗憾的事情？要我说的话，那就是没有细看著名的秦尼巴克花园，即当年英国驻喀什总领事馆。自己一直对于中西文化交流史有着浓厚的兴趣。从北大来到石河子大学支教，在这个当年被称为“西域”的地方，自然对喀什这座演绎了许多中外交往老故事的城市充满了期待和想像，其中具有百年历史的英国领事馆旧址也是不可不看的。



泰尼巴克〔或“中國花園”〕。斯坦因攝于1914年。

8月27日，在游览了高台民居之后，我提议到英国领事馆旧址看一下。当地朋友告知，那里现在是一个名叫“齐尼巴克”的宾馆，参观之余还可以在那里吃晚饭。遂一路奔去〔“秦尼巴克”或“齐尼巴克”都是Tschini-Bagh两个词的音译，“秦尼”是西文“中国的”音译，而“巴克”则是维吾尔语“花园”的音译〕。

一进院子，便觉异常，一辆挖掘机正在院子里轰隆隆地大肆挖掘。宾馆的守卫说，宾馆暂停营业，原有建筑已经拆除，正在原址上新建一座五星级宾馆。一听这话，我的脑袋嗡的一声，不知如何是好。既然已无历史陈迹可寻，只好转到离此不远名为“色满宾馆”的俄国领事馆旧址参观。车上，大家都为这具有历史意义的秦尼巴克被拆毁而频频叹息。

我们都太疏忽，或许那个守卫的话指的是某一栋营业场所已经拆除，是否还有一些老建筑保留下来，以为历史的遗迹和见证？其实，从1954年印巴驻喀什领事馆撤销之后，这个建筑群即收归国有，先后叫对外交际处和齐尼巴克宾馆，不少建筑物陆续被改造甚至拆除。1986年，英国作家霍布科克〔Peter Hopkirk〕在一篇序言里曾描写秦尼巴克，“江河日下，成了供长途汽车司机落脚休息的旅店，长年失修，破败不堪……那座美丽的花园也不见了。曾一度在喀什噶尔辉煌过的英国总领事馆建筑物，现在已经破损衰败，仅仅作为大英帝国过去辉煌岁月留下的一曲令人伤感的回声而存在于那里。”现在，这伤感的回声是否已经曲终人散？

喀什位于丝绸之路南北两线西端交汇点，很早的时候就是一个商业贸易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随着近代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扩张，这里成为俄国与英国两大势力角力〔所谓“大博弈”〕的前沿。与此同时，对

于那些对西域神秘历史满怀热情的考古专家和探险家们而言，这里也是一个最好的驻扎和提供补给以及集散文物的基地。英国最早派到喀什的官员，是弗朗西斯·扬哈斯本 [Francis Younghusband] 和乔治·马噶特尼 [George Macartney]。前者二十六岁，是个军官，中文名字荣赫鹏；后者二十四岁，朝气蓬勃，一个对遥远的东方充满憧憬的年轻人，中文名字马继业。也许他自己都想不到，他与喀什噶尔的缘分居然如此深厚：此后他在这里生活，整整二十八年！

说起这位马继业来，那可是颇有些来历的。了解中西交流史的读者都知道，那位乾隆年间专使出访中国的马戛尔尼伯爵，他的英文名字也是 George Macartney。这位最早跟中国发生关系的马伯爵，与马继业，都是祖籍苏格兰、后移居爱尔兰的。我猜想他们或许属于同一家族。查了不少书，却没有什么线索。直至读到德国考古学家勒柯克的《中国新疆的土地和人民》一书，其中清楚地说马继业出生在马戛尔尼的家族中，这才得到一个证据。另，在英文版的 Wiki 百科上，有“马继业的父亲马格里 [Halliday Macartney] 属于18世纪出使中国的马戛尔尼家族的成员”的说法 [Macartney was half-Chinese – his father, Halliday Macartney, was a member of the same family as George Macartney, the 18th century British ambassador to China]。至于马格里，那也是一个与中国关联密切的人物。他于1858年来华，曾帮助李鸿章镇压太平军，后主办中国第一个兵工厂。在郭嵩焘出使英国时，楚材晋用，担任中国驻英使馆参赞，长达三十年。马格里在华的一大收获是娶了一位中国妻子——一位在太平天国动荡时世落魄的贵族千金。马继业正是这次婚姻的结果。

马继业出生在南京，十岁返回英国接受教育。在种族偏见极深、东西方之间隔阂甚严的时代，混血儿身份自当带来严重的双向歧视。不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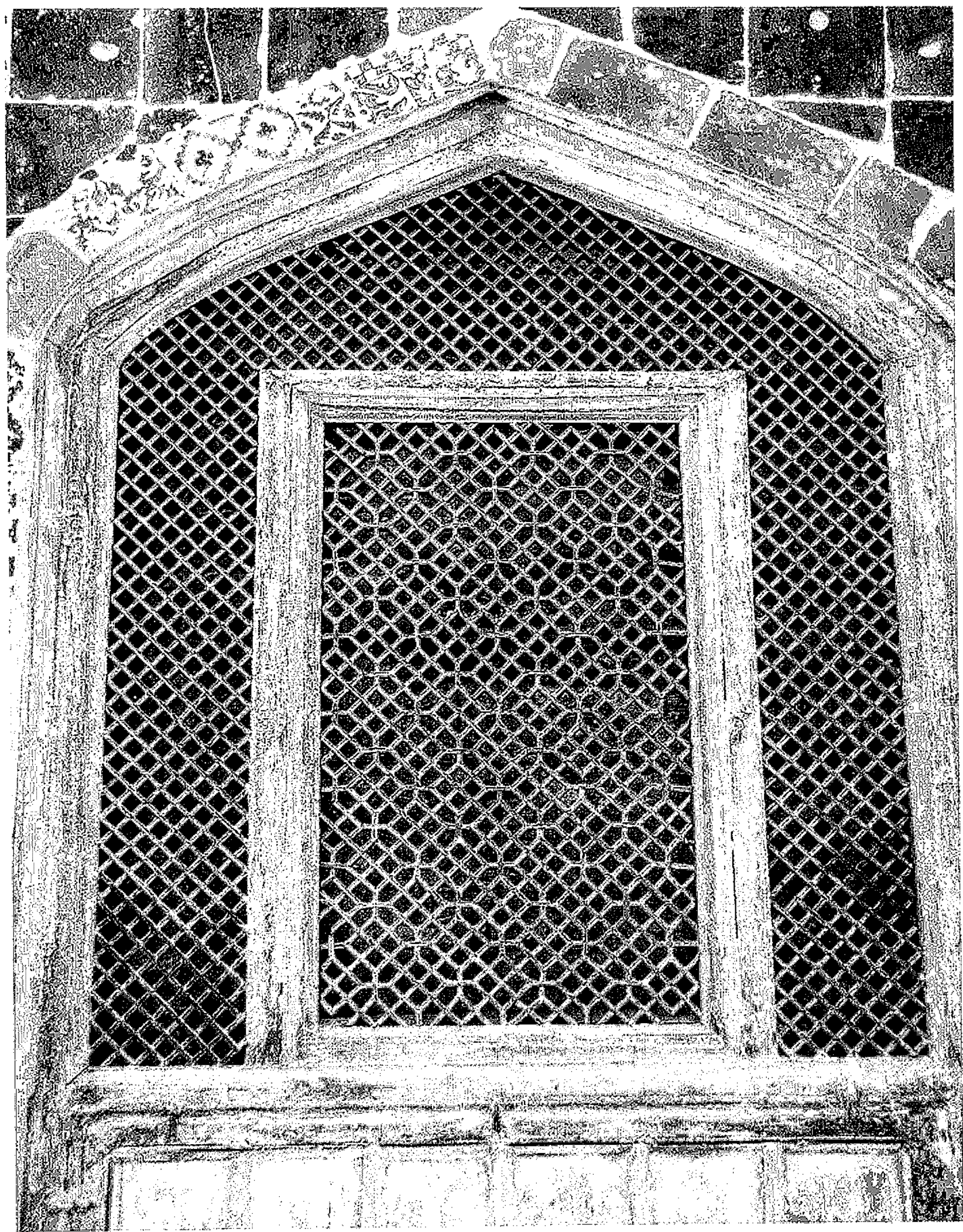
关于马继业的书中，都谈及他对自己的母系渊源是怎样地讳莫如深，又如何坚决反对异族通婚。不过，正是由于他是马格里与其中中国妻子的儿子，马继业在喀什噶尔也获益良多。人们称呼他为“马少爷”，辈分高的人称他“小马先生”，以区别于他的父亲“老马先生”。不独此也，他儿时即学会的娴熟的汉语，尤其是对于中国文化的天然亲和，都给他的外交生涯带来了他人所无法比拟的优势。

初到喀什之时，马继业的头衔是克什米尔驻中国政治代表，实际上是英印政府的一个游历官。直到1912年，他才被任命为英国驻喀什〔当时叫做“疏附”〕总领事。“政治代表处”升格成总领事馆，当然也需要与之般配的馆舍。英国要建新的领事馆，设计师就是当时的主要传教士兼医生的拉尔斯·艾瑞克·豪格伯格〔Lars Erik Högberg〕，瑞典人。他亲手绘制了包括二十二个房间的图纸，并负责整个工程监督，一些高级建筑材料还直接从瑞典采购而来。1913年10月，新馆竣工典礼，马继业对于豪格伯格的卓越工作给予高度赞赏。1929年，曾在喀什居住一年的瑞典人贡纳尔·雅林也说：“毫无疑问，修建这个新领事馆为豪格伯格增添了声誉，也提高了瑞典传教团的声望。”

这座新领事馆，是整个中亚地区的一个独特的存在！建筑上空那面英国国旗，是英属印度与北极之间广袤大地上惟一的一面飘扬着的英国国旗。那些跋涉崇山峻岭、经过九死一生，终于来到喀什噶尔的西方人，秦尼巴克门口长亮着的那盏红灯笼是最温馨的符号。英国的斯坦因、瑞典的斯文·赫定、法国的伯希和、德国的勒柯克、日本的大谷光瑞、《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里逊等，都在他们的探险著作或游记里描写过在秦尼巴克受到的热情款待。这里舒适的享受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典型的英国家庭，完全忘记这是在大漠孤烟、峻岭盖雪的亚洲腹地深



泰尼巴克之内景。



清真寺里的一扇窗。

处。除了一应俱全的现代化室内设施外，宽敞的花园里种满了各种树木花草，柳树、榆树、杨树、核桃树、桑树以及沙枣树，还有从俄国引来的洋槐树，到了春天，冰封的大地开始复苏，那些树木奇迹般地变得枝繁叶茂，亭亭如盖。周围一览无余的是肥沃的条田和园林，透过夏季常见的轻薄尘雾，远处山梁的轮廓成为这座花园迷人的背景。而遇到雨过天晴，南方可以看到慕士塔格峰雄伟的身姿，西北则有天山皑皑白雪覆盖下的顶峰。这里分明就是一处世外桃源。

不过，桃源里的人们不会置身世外。除了外交事务和情报工作外，马继业还运用他与当地官员之间的友好关系，帮助那些来西域的探险家们疏通勾兑。加之，清朝官员压根儿没有文物主权的观念，使得这些西方人挖掘中国古文物的企划得以完成，且难以计数的文物被运往境外，成为大英博物馆、巴黎图书馆、瑞典民族博物馆等收藏机构的珍贵藏品。虽然这些文物在外国得到了非常妥善的保管，也开放给所有研究者利用，不过作为一个中国人，每念及此，还是不免心中隐隐作痛。

无论如何，秦尼巴克总是一段历史的见证。保留下来，让后人能够看到这段故事的一个物质载体；我们都不会忘记从马戛尔尼到马格里，从马格里到马继业，一个家族与中国这长达一百余年的特殊缘分。

秦尼巴克门口的那盏灯笼，永远地熄灭了。时间如飞沙，如流水，它掩埋了多少生命，冲刷掉多少曾经鲜活的历史印痕……

玖

仰望慕士塔格峰

章诒和

提到新疆，自会想到低低的吐鲁番和高高的帕米尔。吐鲁番有葡萄沟、坎儿井；帕米尔有慕士塔格峰。峰高海拔七千五百多米，位于乌恰县和塔什库尔干县交界处。慕士塔格一词，突厥语意为“冰川之父”。它与相距不远的公格尔、公格尔九别三座山峰，构成了帕米尔高原的最高峰地区。冰峰耸立，银嶂连绵，山顶积雪厚达两百多米，你永远无法进入，只能远瞻和仰望。因气候变幻无常，多有云雾雨雪，难得一睹真容。它的神秘使人产生一种不可抑制的冲动，甚至是一种痛苦。我在网上读到一篇旅游日记，作者是个摄影师，年轻的小伙子。他一路挨宰，就是为了看这座雪山。大雾弥漫，整整一个下午，他的视线就没有离开



阳光下的“冰山之父”熠熠生辉。





被遮蔽的慕峰。同行者里很多人都有了下跪的念头……对自然的膜拜，心情有如朝圣。何况在帕米尔，还有着据说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星空，还有一条怪石嶙峋、险要无比的中巴〔巴基斯坦〕公路。

2009年8月26日，我同小贺在新疆友人陆先生等人的陪同下，从喀什出发了！踏上中巴公路，一路走，走到巴基斯坦；一直走，走到国的边界、天的尽头。幸有上苍垂怜，日朗朗，风清清，冰峰尽显尊容，敞开胸怀接纳我们。别提有多么兴奋了：我静静地站着，不眨眼地盯着慕峰之巅；小贺和陆先生则不停地转换角度，用相机拍个不歇——我们就是要把慕士塔格峰记下来，用眼睛，用镜头，用心灵。出生在新疆的陆先生说：自己来过多次，只有这次是看清楚了的。

地势高，气温低，气流极易入侵且凝固为雪与冰。于是，三百六十五个日日夜夜，大气都在为慕士塔格峰提供雪源。日复一日，层层相叠，遂形成了巨大的冰盖，把山峰盖得个严实。有文章说它的外观似富士山，不，它只像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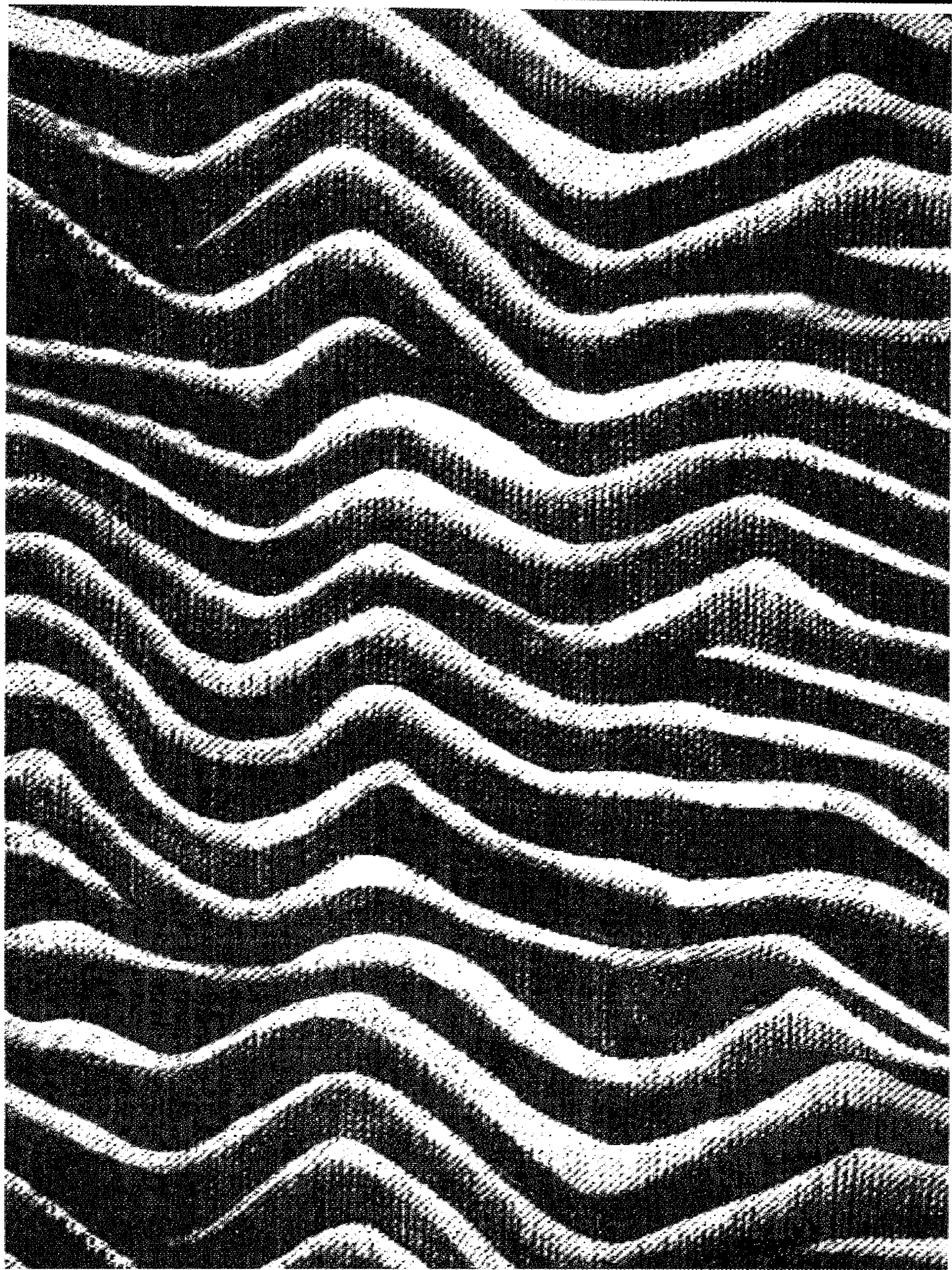
有胜景，即有传说。有人说，山上有一座墓，墓里埋葬着仁慈的圣者；又有人说，山上有座城，城里的居民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导游手册里则讲：山上住着一位冰山公主，她与住在对面的海拔八千六百多米的世界第二高峰乔格里峰的雪山王子热恋，凶恶的天王十分恼怒，用神棍劈开了原本相连的两座山峰，活生生拆散这对情人。冰山公主为情而恸，眼泪不停涌出，最终流成了道道冰川。中国的神话，自古不发达。听这样的传说，终觉浅淡。慕士塔格峰肃穆坦荡，身姿孤峻，带着宇宙

赐予的光芒，千百年地伫立在那里。中国人当有飞腾的幻想，制造出一个类似希腊神话里的英雄来！叱咤惨厉，壮美卓然。

峰下，是山溪汇成的河流〔塔什库尔干河〕，河的旁边是草地和沼泽，有无数的禽鸟自由自在地栖息，这是一幅很迷人的高原湿地风景。我还认识了一种叫旱獭的动物，它们趴在路边懒懒地晒太阳。从边关返回，天色渐暗，再望慕士塔格峰，山巅依旧雪亮，像不灭的火种，燃烧着。印象太强烈了，心潮难平。驾驶员是个维吾尔青年，讲一口普通话，驾技超一流。他喜欢自己民族的艺术，车厢内播放着维吾尔音乐，轻松，华丽。我突然产生了幻觉和联想——感到远去的慕士塔格峰在缓慢流动，流动的旋律似阳刚的大提琴，坚韧有力。高音区开朗、绚丽；低音区浑厚、深沉。慕峰和人类一样，集上帝的恩宠和撒旦的苦难于一身。想着，想着，童年、身世和已逝的亲人，一起浮上心头。

德国诗人赫尔曼·黑塞说过：“这世间有一种使我们感到幸福的可能性：在最遥远的、最陌生的地方发现一个故乡，并对那些似乎极隐秘和最难接近的东西产生热爱。”以沧桑为饮，以岁月为服，我从帕米尔高原布满山岩的沟壑与褶皱里，仿佛看到中国千年的惊涛骇浪。与此同时，我才知道世上有那么多的风景，还没有欣赏过。其实，风景是永远看不完的，这正如我们有许多必须做的事情，其实是永远做不完的。

不遗憾，我看到了慕士塔格峰！人的一生难有山的高度，惟愿我们的灵魂，能像慕士塔格峰一样洁白。



乙 辑

壹拾

纳沙泰尔

附录 让胡适校长的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在北京大学法学院2008届毕业典礼上
作为教师代表的致辞「贺卫方」

壹拾壹

别人都朽了，他不朽

壹拾贰

没有塑像的底座

壹拾叁

关雪「梅兰芳」

壹拾肆

我看到了洪堡大学

壹拾伍

建筑的政治学

壹拾陆

姬路城

壹拾柒

吴哥的绝世微笑

壹拾捌

经过「柏林爱乐」

壹拾玖

坂东玉三郎

贰拾

黑船上的汉学家

壹拾

纳沙泰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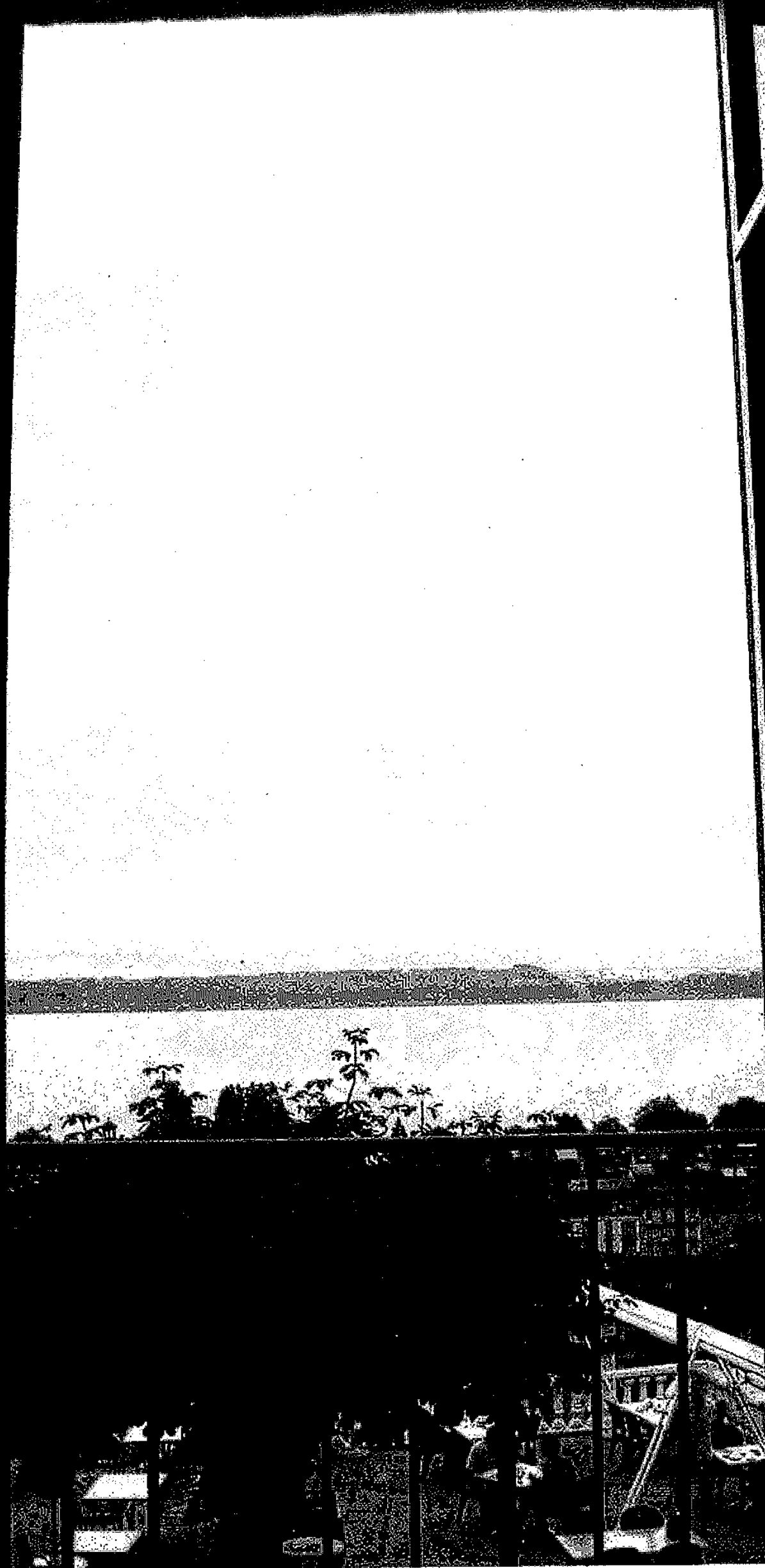
贺卫方

十小时的飞行，抵达慕尼黑，转机飞日内瓦，在机场零距离转乘火车。之后，我终于到达了目的地——纳沙泰尔。到达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

汉学家胜雅律[Harro von Senger]先生的夫人已在火车站出口处等候。原以为要坐车去宾馆，不料她说：“不用，过了马路就是。”果然，不到三分钟，就“宾至如归”了。

在中国，肯定没有很多人知道瑞士的纳沙泰尔城，原文叫

右图：早晨7点醒来，拉开阳台门帘，眼前的风景令我惊叹……





山湖宾馆。

Neuchâtel。一般地名翻译词典把这座城市译为纳沙泰尔，不过当地人的发音更近似汉语发音的“纽夏泰尔”或“纽夏泰勒”。此城离日内瓦，有一个多小时车程。它是著名国际法学家瓦泰尔[Emerich de Vattel]的故乡，而这位法学家对于中国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他是历史上第一位被介绍到中国的西方国际法学家。我参加的研讨会，正是纪念瓦泰尔的名著《国际法》出版二百五十周年而举办的。

安排的宾馆叫做山湖宾馆[Alpes et Lac Hotel，直译“阿尔卑斯山与湖宾馆”]，除了路途周转，到达之后一切都方便极了。胜雅律教授夫人也是这次会议的操办者，她告诉我，胜雅律教授要到第二天晚上才能从德国弗赖堡大学赶过来。关于胜雅律教授，我曾在拙作《法边馀墨》的一篇文章里专门写过。记得在龙应台女士的文章里，也有所描述。他关于三十六计的著作《计谋》，在中国已经有了译本。因为到达时间已晚，加之十几小时的奔波，颇有些疲惫，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早晨7点醒来，拉开阳台门帘，眼前的风景令我惊叹！我看到的竟是一幅绝美的画面：整个城市在俯瞰之下，尽收眼底。往远看，是碧波荡漾的纳沙泰尔湖，过了湖就是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了。这样有山有水、山清水秀的小城，实在是令人欣喜不已。会议要到后一天才开，这样我就有一天的时间游览市容。早饭后，出宾馆，走过一段坡路，便来到了市区。

从旅馆到纳沙泰尔大学，不过几分钟的步程。作为一个城市，纳沙泰尔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3世纪。纳沙泰尔大学创办于1838年，在欧洲当然算不得古老大学。不过，这个三万多人口的城市还是让人有一种典型的大学城之感。刚刚放假的大学校园里行人很少，教堂的钟声更衬托出城市的静谧。

不一会儿，我走到了湖边。相对于这座小城来说，纳沙泰尔湖显得太大。在湖边长椅上坐了半个小时，看着水鸟游弋于被晨光照射得波光粼粼的湖面，那样的悠闲自在，令人恍如置身仙境。看地图，猜测着走向市中心的路径。穿过大学，十分钟就来到了市区的中心地带。

市中心的人略多些。这里，有小巧的港口，古老的各式建筑，以及看上去就是从世界各地来的一些游客。独自游览，好在城市不大，转来转去就又回到了一些熟悉的建筑物旁边。每到一地，总是很喜欢逛旧书店。很快就找到了两家，而且都有着相当的规模。无论是书的数量，还是古旧版本的比重，都令人印象深刻。一个城市市民的文化水准和品位，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书店、尤其是旧书店来体现。区区三万人口的城市，在中国不过是一个县城罢了。而今天又有哪个中国县城——甚至许多省城——的人们，可以享受在这样层次与规模的旧书店里淘书的乐趣？

我在其中的一家位于Chavannes街的旧书店，买到了三本书。一本

右图：波光粼粼的纳沙泰尔湖。



是关于这座城市历史的小书《1814年9月12日》[12 Septembre 1814]，作者名字Jean-Pierre Jelmini，出版年份是1989年。虽然不懂法文，但其中不少很可爱的插图却赏心悦目。第二本是有关中国的英文图文书，书名*China: As Photographed by Henri Cartier-Bresson*，出版于1964年。作者卡蒂埃—布列松是法国人，《生活》杂志的摄影记者，在1949年江山易帜的前五个月和后六个月，他正好在中国，人民共和国建立十年后的1959年他又一次来访。当时他的一些作品发表在《生活》、《巴黎竞赛画报》等刊物上，结集出版给读者展现了更多的画面。当年农民修高炉、拉着风箱炼钢铁的场景令人触目惊心，也让中国20世纪的荒唐历史有了更多的图像证据。第三本也许有点独特价值，即1869年伦敦版的《匹克威克外传》[Charles Dickens, *The Posthumous Papers of the Pickwick Club*, with eight illustrations,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1869]。狄更斯去世于1870年，《匹克威克外传》是他长篇小说的处女作。初版于1837年，我买到的这个版本是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版。仿皮革布面精装，红色封面，787×1092 mm的32开，一卷本，毛边。衬页上有也许是最早买书者的鹅毛笔签名，难以辨认。我对于版本学所知甚少，也许这部旧书还有些版本上的意义。我回到北京，在万圣书园购得董桥先生的新书《今朝风日好》[作家出版社，2008年]，其中说起1976冬天他在伦敦和一位做旧书生意的朋友专门收购狄更斯版本的经历，书的主人是一个老律师，家中所藏的都是狄更斯的初版本，不少书上还有作家本人的签字。那样的书真正是价值不菲呢。我对狄更斯的兴趣，部分来自于他的作品跟当时英国法律制度的关联。记得一份英国法学刊物曾经发表《作为法律史学家的狄更斯》的长篇论文。单看题目，便觉有趣。巧得很，日前跟人民大学

法学院博士毕业的何帆君一起吃饭，他谈及刚刚翻译完成一本关于狄更斯与法律的小书，细问之下，正是前面提到的那篇论文的单行本。我期待它的问世。

买到书了，心里很高兴。接下来，就慢悠悠地闲逛了。转过一个街角，忽然看到了一尊正义女神的塑像。此前见到的多是画像，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雕塑的正义女神，很高兴。马上查看随身带的关于这座城市的小册子，方知此塑像名为“正义之泉”[Fontaine de la Justice，之所以叫“泉”，是因为雕像下面有喷水池]，是雕塑家Laurent Perroud于1545到1547年的作品。正义女神的脚旁有四个人物，他们象征着那个时代的统治者：一位教皇，一位法官，一位皇帝，还有一位伊斯兰教国家的统治者苏丹。正义女神手持利剑和天平，脚下环绕着这类统治者，雕塑充分展现了法治的意蕴——法治就是把权力置于法律之下，就是用正义和法律驯服手握权柄的人。

关于瓦泰尔的研讨会持续了一天。来自许多国家的学者参加了会议，显示出这位国际法大家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主持会议的纳沙泰尔大学的桑多斯[Yves Sandoz]教授为人热情，山湖宾馆露天的餐桌上回响着他爽朗的笑声。我在会议上作了题为“中国的瓦泰尔”的主题发言，向与会学者介绍了1839年林则徐在广州主持翻译瓦泰尔著作片段的故事。关于这段历史，已有徐中约、王维俭、鲁纳[Rune Svarverud]等学者做过深入研究，我没有提供什么新的史料，只是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某些看法。不过，西方的国际法学界，似乎对于瓦泰尔的著作在中国那么早

正义女神像。



就得到翻译还是颇感意外。

因为要参加北大法学院毕业典礼并作为教师代表讲话，在会议结束次日我就匆忙赶回。胜雅律夫妇亲自坐火车送我到日内瓦机场，让人备感温暖。胜雅律教授还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他从一张老上海地图上看到，有一条街的名字是Rue Bluntschli，这个Bluntschli是一个典型的瑞士姓氏，而这个姓里最有名的人物恰好是另一位瑞士的国际法学家[Johann Kaspar Bluntschli, 1808 - 1881, 代表作*The Modern Law of War*]。胜雅律先生怀疑这个街名是否来自这位国际法学家，如果是，为什么以他的名字命名？我答应他回国后设法查考一下。回来后，我在博唠阁上贴文请教，结果有几位朋友都很快地告诉我，这条路原来的汉语名称是音译的“平济利路”，在卢湾区。光绪三十二年[1906]以法公董局副总董[G.Bluntschli]之名而名之，民国三十二年[1943]改为“济南路”。我给胜雅律教授写了邮件，告诉他结果，也许让他略感失望吧。

让我再说一点后来读书看到的有关纳沙泰尔的趣事吧。一个是有关受英王派遣出使中国，曾在承德谒见乾隆皇帝的那位马葛尔尼的。二十岁那年，马葛尔尼在英国完成律师训练，不过他对于做律师却没有多少兴趣。之后他到欧洲游历，到了瑞士，到了纳沙泰尔，承一位高人相助，在这里拜见若干名人，其中的一位是——让-雅克·卢梭。另一个则是有关尼采的。这位哲学家曾两次来到这座瑞士小城，第二次好像是在四十四岁那年，乘坐马车旅行赶上大雨天，无奈羁留在纳沙泰尔。他住的宾馆可以看到全城，可以看到阿尔卑斯山，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说这里的风光如画，甚至受到这美景的感染，他跟妹妹之间也不互相伤害了。再看那宾馆的名称，“Alpes et Lac Hotel”，真是无巧不成书，就是我住的那一家呢。

附录

让胡适校长的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在北京大学法学院2008届毕业典礼上作为教师代表的致辞

贺按：之所以对瑞士小城记忆深刻，另一层原因是我在那里起草了一份题为《让胡适校长的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演讲稿；里面，有我的感受，有我的真情，也隐含着我的宿命。

各位亲爱的毕业生同学，各位尊敬的学生家长和家人，各位尊敬的嘉宾和同事：

刚才苏力院长说他的演说不是那种标准的毕业典礼致辞，也许他是想把标准的留给我，因为我提前起草了今天的讲辞。在中国的法学界，也许我是演讲最多的几位学者之一了。但是以往却很少写出讲稿，这一次却非同寻常。第一个原因，这是我十多年来在我们学校典礼场合讲话的第一次，按照常规，典礼致辞还是要体现一种庄严的特点的。第二个原因，刚才主持人已经告诉大家，我是刚刚从机场赶来。这几天在瑞士离日内瓦不远的一个叫做纳沙泰尔的城市开了一个会，会议纪念当地出

生的著名国际法学家瓦泰尔[Emerich de Vattel]的著作《万国法》[*Le droit des gens*]出版二百五十周年。1839年林则徐到广州查禁鸦片贸易，曾经托人把这本书的几个片段翻译为中文，这是国际法在中国的第一次翻译，也是瓦泰尔著作第一次传播到东方。这也是为什么我被邀请参加会议的原因。按照航班行程，飞机应该在今天上午8点半降落首都机场，我们的典礼也是上午举办。我很担心航班延误，赶不上参加，就提前写好，以备“替身”代读。不过，幸运的是，我赶到了这里。

同学们，在经过了三年、四年或者更长时间在这所校园中的学习生活之后，今天，你们到了要毕业的时刻。毕业典礼上师长们的讲话不免要叮咛嘱托，离情别意，溢于言表。在纳沙泰尔湖畔的这座瑞士小城，遥想各位，我不知对你们说些什么好。在北大的岁月一定给你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成为你们走不出的背景——不只是未名湖畔美丽的风景，不只是书本课堂里的熏陶和训诫，也不只是老师们各具特色的风范，更重要的是，我们这所大学的精神，这种精神已经成为诸位生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说到北大精神，我们每个人都不免产生一种不确定感。是的，这所大学百多年的历史内容是如此丰富，以至于对于什么是北大精神，人们见仁见智，各说各话，一些解读差异之大，简直让你误认为是在说风马牛不相及的两所学校。以我十三年作为本校教师的感受，我们学校最重要的传统便是蔡元培、胡适以及马寅初诸位校长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大学独立、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独立，即不畏权势，不媚流俗。自由，便是在研究与学习中以学术与知识的本原为指向，不受任何非学术因素的干扰。至于兼容并包，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独立与自由的结果，它们内在的要求我们容纳异见，心怀谦逊，因为在博大精深的知识海洋面前，没有霸权，人人平等。

去年年初，借到东吴大学讲学之际，我专程到台北南港拜谒了胡适校长之墓。看着墓前胡先生塑像那泰然自若的面庞，我不禁想起这位终其一生都在为学术自由和大学独立而奋斗的先贤的种种事迹。他虽然早年就名满天下，但却总是把学术视为需要全身心投入的事业。他多次强调，凡成就大事业的人，都是绝顶聪明同时又肯下笨功夫的人。他的治学视野极其广阔，很少有人能够像他那样涉足文学、史学、哲学、语言学、宗教学、政治学等诸多领域，并且在每一个领域里都取得卓越的成就。知识视野的

开阔不仅让他在治学上触类旁通，而且对于国家、社会的发展走势有了更为健全的判断。我们今天回过头来读他的政治评论，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他对现代中国政治、宪政乃至法治应选取路径的论述是何等睿智、明辨，富于洞察力和想像力。可以说，胡适先生亲身参与了中国的宪政建设，从早年的人权论集，到晚年为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所作出的坚毅而理性的抗争，不仅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也为今人包括我们所有的法律人提供了有益的启发，树立了最值得效法的榜样。

同学们，在这个场合我谈这么多关于胡适先生的话，是因为他正是我们的先校长。古人所谓“道非身外更何求”，我们要学习自由、宪政、法治的精髓，探索实现它们的途径，一些外来学说与经验固然重要，但是身边的范例更是值得珍惜的本土资源，我们更应该就近取材、努力仿效。胡适校长那种对知识的不懈追求，对于家国以及整个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和为人处世中体现的伟大人格都是我们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标尺与境界。在中国法治正处在攻坚时刻的今天，能够将上述三者结合起来至关重要。李敖先生曾建议在我们这所校园中立一尊胡适塑像，我很赞成；不过，比塑像更要紧的是，我们要让他的精神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在这座校园里生生不息、发扬光大！

各位同学，各位同事，我在开始的时候说这次演说对我很特殊，也许应该加上一条理由：我也将和在座的各位毕业生一样，在本学期结束的时候离开这所学校。我犹豫再三，是否在这个场合提及这个话题。当然，说起来离开也没有什么复杂的原因，只是人生旅途中的一次“驿站”的变换。“驿站”的说法或许有些消极，不过，“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从一个更高的视角看，人短暂的一生的确像是一个匆匆过客。认识到这种短暂，也许会让我们及时行乐，不过，我总怀疑，那种在紧张心态的压迫感之下的行乐是否会带来真正的快乐，抑或不过是困兽之斗。其实，我们更应该反思，作为人，快乐的本源何在？我们如何将世俗的快乐与精神的欢愉相结合，并且产生出一种行动者的力量？这种哈姆雷特式的问题经常在我的耳边响起，最终促使我做出了离开这一艰难的决定。

就像在座的毕业生一样，我这个在北大学习了十三年的老“毕业生”也要在这里表达自己由衷的感念之情。感谢北京大学，她让我在这里宾至如归，找到了自己精神家园。感谢法学院，感谢各位同事，这里的宽容气息让我这个多少有些异端色彩的教师如鱼得水。我要请求沈宗灵老师、由嵘老师、魏振瀛老师、张文老师、李贵连老师原谅，自己所成太少，有负你们的殷切期望。吴志攀兄、张守文兄，你们的厚爱应该得到特别的铭记。苏力兄，你作为人生的鼓励者、观点的商榷者以及我引为自豪的老朋友，请接受我的敬意和祝福——既祝福你，更祝福我们的法学院！

曾经有人调侃地说，假如没有学生，大学教师这个职业就是完美的。这样的玩笑，也多少透露出大学教师职业压力的一个来源。不过，压力之源又何尝不是荣誉和幸福之源？请允许我说，北大法学院的学生们给了我最高的奖赏、最大的鼓励。多亏有了你们，自己才有如此丰富多彩的教师生涯，才会有桃李满天下的自豪感。我愿意再说一次，“北京大学十佳教师”和“北大法学院十佳教师”的荣誉将是我人生中永久的美好回忆！

说到这里，同学们可以看出，今年法学院安排我作为教师代表发言，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效果：我送别你们，你们也送别我。送人者亦复被人送，劳燕分飞，天涯何处再相逢？好在世界已经变小，资讯传递迅捷，相见不难别才难。我期待着再相聚，愿心中的快乐与幸福以及事业的丰收与你们永远相伴！

谢谢大家！

2008年6月21日于纳沙泰尔山湖宾馆初稿
23日上午致辞后略作修改

别人都朽了，他不朽

章诒和

父亲从德国开会归来，那时我正读小学。他带回两尊铜质浮雕式头像，端端正正地摆在我的书桌上。说：“爸爸给你的礼物。一个是歌德，一个是贝多芬。”

哇，太漂亮了！我爱不释手。

父亲用手掌抚摩着歌德像，自语道：“一个最伟大的德国人。”

“爸，他有多伟大？”



海德堡城堡内的歌德塑像。

这里留下了他的足迹和对爱情的礼赞，城堡墙上镶嵌着那首题为“我把心儿遗忘在海德堡”的情诗——“在一个温暖的仲夏夜，我的耳朵也充满了爱情，她的嘴唇好像玫瑰含笑。当我们在大门前告别，我清楚记得那最后一吻。我把心儿遗忘在海德堡，我的心啊在内卡河边狂跳。”

“别人都朽了，他不朽。”

我读中学了，父亲送了我中译本精装《浮士德》。我问：“书这么厚，写的是啥呀？”

父亲说：“写的是人。”

随手翻了翻，叫起来：“全是洋诗呢，我怎么读？”

“用一生去读。”

“文革”中，铜像和《浮士德》都没有了。

再后来，书店有了各种译本的《浮士德》，我一种也没买，始终没买。而那铜像，也不知道摆放在谁家客厅或书房的玻璃柜里。这些都已不再重要，因为我已经把歌德安放在心窝。不会消失，也不会丢掉。

当小贺把在德国拍摄的“歌德塑像”照片发送给我的时候，往事一下子都浮现到眼前。那样遥远，又那么温暖。

很惭愧！我读歌德的作品少之又少，第一本是《少年维特之烦恼》，之后是《浮士德》，看得半懂不懂，似懂非懂。父亲不是说，要用一生去读嘛。我就没再抓紧时间去重读，至今还是个半懂不懂，似懂非懂。《歌德谈话录》是学了戏曲文学理论专业，作为参考书看的，因

为里面有关于文艺创作与评介的内容。再一本，就是《歌德自传》了，译者刘思慕。《自传》对我的帮助特别大，它将我以往对歌德的零星阅读贯穿起来。歌德太深刻，太丰富，也太复杂和多面，在艺术领域，他是真正的奥林匹亚神山上的宙斯。他的一鳞半爪，够我受用终身。

歌德于我的意义，是在提笔写“往事”以后凸现出来的。想要把“往事”写好，这第一步该如何走？是歌德在指导我。他说：“要想从浅薄、乏味、冗赘和空虚的文学时代脱身出来，第一步只有借助于明确、精密和简洁的文风。”我尽力遵循他的主张去做：初稿写完，跟着就是几番删减。一个形容词，反复琢磨。一件事说完，再掉头细看，瞧瞧讲清楚没有。状物、写景、叙事皆如是。实践证明，按歌德的话去做，还挺管用的。

我写的老故事，为什么常被人误解？我又去请教歌德。在他和一个朋友的交谈记录中，我明白了：“无论哪一个人，本来只从自己的缺点中看出自己的特色，而读者感兴趣的是有缺点但富于个性的作品。”顿时豁然开朗：写作是有缺点的、有个性的。原来我的缺点就是我的个性——当我从内心认可了这样一个事实的时候，便不再苦恼、烦躁。

我也在积累经验。经验是什么？“所谓经验不是别的，就是一个人经验到他所不欲经验的。”

这也是歌德说的。

没有塑像的底座

贺卫方

我曾经两次访问日本国会，第一次就注意到国会主建筑的大厅里的一个有趣场景，那就是，在大厅的四个角，三个角上分别竖立着为国会以及日本宪政发展贡献至伟的三位政治家的塑像，他们是板垣退助、大隈重信和伊藤博文。这三位中的板垣和大隈是宪政初期两党的领导人，伊藤则是明治宪法最主要的设计者和推行者，也是1900年从板垣那里分裂出来的新政党政友会的领导人。但是，第四个角上，却只是放置了一个底座，上面空空如也。

我问陪同参观的议会官员：“那个空着的底座上为什么没有塑



底座之上空空如也。

四手联弹 - 乙辑

像？”

答：“没有人在宪政的初创时代里能够做到这三人那么伟大。放着一个空着的底座，对于后来的政治家是一种激励。”

我问：“当然，明治维新时代这三位的确很了不起，不过，百年来再也没有像他们那么伟大的政治家了么？二战之后的吉田茂难道声望还不够？”

又答：“从推动宪政的发展所作的贡献看，吉田茂跟那三位还是有距离。”

这让我有些吃惊。我曾读吉田茂的《激荡的百年史》，那实在是一本写得很好的书。这本书之所以重要，部分的原因正是因为他本人就是二战后日本历史的重要角色。他是历史的叙说人，也是历史的塑造者。当然，我也很在意他对于日本跟中国关系的看法。在书中，吉田说：“在国际社会中，同中共的关系是日本所担负的责任中最困难的。中国从古代开始就是非常奇怪的。她是东方最优秀的民族，可是从来就不能适应世界局势，偏偏把自己孤立起来，奉行一种孤立的中华主义，走向一条孤立的道路。”这也许代表了不少日本人的看法。

我跟东道主谈自己的看法。今天的政治已经进入平民主义的时代。

媒体越来越发达，政治家想把自己塑造成完人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与此趋势相适应的另一个潮流是，民众对于政治家的道德想像和期望也降低了。加上日本内阁体制的特殊性〔首相更迭频仍，战后诸首相平均任期大约只有两年〕，所以要出现另一尊塑像的可能性实在是微乎其微了。东道主也点头称是。

实际上，如果从后来的对日本宪政尤其是战后宪政作出贡献的人物中选出一位的话，还是有一个适当人选的，那就是麦克阿瑟将军。不过，在国会大厦里竖一位美国人的塑像，即便在日本，恐怕也属于违反“政治正确”禁忌的想法吧。

章
诒
和

天下事，怪怪的！

那么长的时间，我和小贺同住在北京，谁也没提出来合作写书；2009年春天，小贺去了新疆，我们决定要合写一本书了，还要有图有文。绝大部分图片的提供者是小贺。他先是把新疆拍摄的照片拿给我看，呈现的都是西北风情，包括那餐桌上“大盆鸡”。瞧着，瞧着，我

突然觉得视野局限在新疆，未免狭窄。我和他不是分别去过欧洲，又先后东渡日本吗？于是，我请他把在日本、欧洲等地拍摄的照片都搬出来。

我们在一家咖啡厅碰头，他把携带的手提电脑打开：哇，恰似“晓来推窗，六桥烟色开新爽”。我高兴得又叫，又笑。分明是人家的东西，倒像是自己发现了宝藏。在他的这批图片里，我对其中的两张最感兴趣，两张里面就有“没有塑像的底座”。

之所以感兴趣，是因为看不大懂。

我指着这张照片，问：“这是什么呀？”

“没认出来吧。”我的不懂，他很满意。接着，便把上面的文字发送给我。

文中，小贺与日本朋友的问答及思考，让我联想到很多。

天下事，怪怪地！



日本国会大厅里的伊藤博文塑像。

关雪“梅兰芳”

贺卫方

对于一个不懂日文的中国人而言，最郁闷的事情也许就是在日本逛书店了。看着书架上的那些书名，大抵能够知道那是写什么的书；但是翻看内容，却也仅仅能够认出其中的那些汉字而已，似乎应了那句“热闹热闹眼睛”的老话。不过，每次访日，还是一定去书店逛逛，看看，也总会有些收获。例如，过去就买到过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注》，以及《围城》的日译本，丰富了我的钱著收藏。

这次访日，尽管匆忙，在大阪，我还是让陪同我的林和孝先生带我到旧书店去看一下。大阪的旧书店集中在一条铁路桥下面的商业区，名

梅兰芳。1913年摄于上海。



叫“阪急”。我发现，古旧书店的店名大多很有趣味：有一家叫做“古书肆梁山泊”〔我读《水浒》，发现梁山好汉们似乎不怎么读书的〕，另有一家名“中尾松泉堂”，市招用篆书题写，瞧着就亲切。书店品种多样，且有自家特色。虽然不懂日文，但是那些透着古典书香气息、装帧典雅精致的出版物也的确令人爱不释手。

在一家以经营初版书相号召的书店里，我发现了书架上的一本书，纸面精装，带着封盒。书名叫《支那山水随缘》，作者是桥本关雪。从封盒里将书取出，小心翻开，原来是作者在中国游览时写下的随笔，其中有不少作者自己画的插图。扉页之后，就是关雪画的梅兰芳“天女散花”的彩墨图。初版本，日期是昭和十五年六月，问林先生，得知是西历1940年。想不到，在日本这个侵华战争最激烈的年头，关雪在报章上连载自己游历江南、北平、山东、河北等地的见闻，随后结集出版。文体似乎很闲散，加之颇有中国绘画风格的插图，不免令人感觉与中国纷飞战火之间巨大的反差。晚上在旅馆上网，检索作者，才知道桥本关雪[1883-1945]乃是日本画坛的一代宗师，也是研究石涛以及中国艺术的专家。1928年曾在上海举办画展，与中国的不少艺术家过从甚密。傅抱石就有“写关雪意”、“仿桥本关雪访隐图”等名作。

我对于绘画艺术是完全的外行。自己感到好奇的是，像关雪这样对于中国艺术与文化充满感情的日本人，对于日本侵华战争〔包括日本人称为“日清战争”的甲午之役〕内心里是怎样评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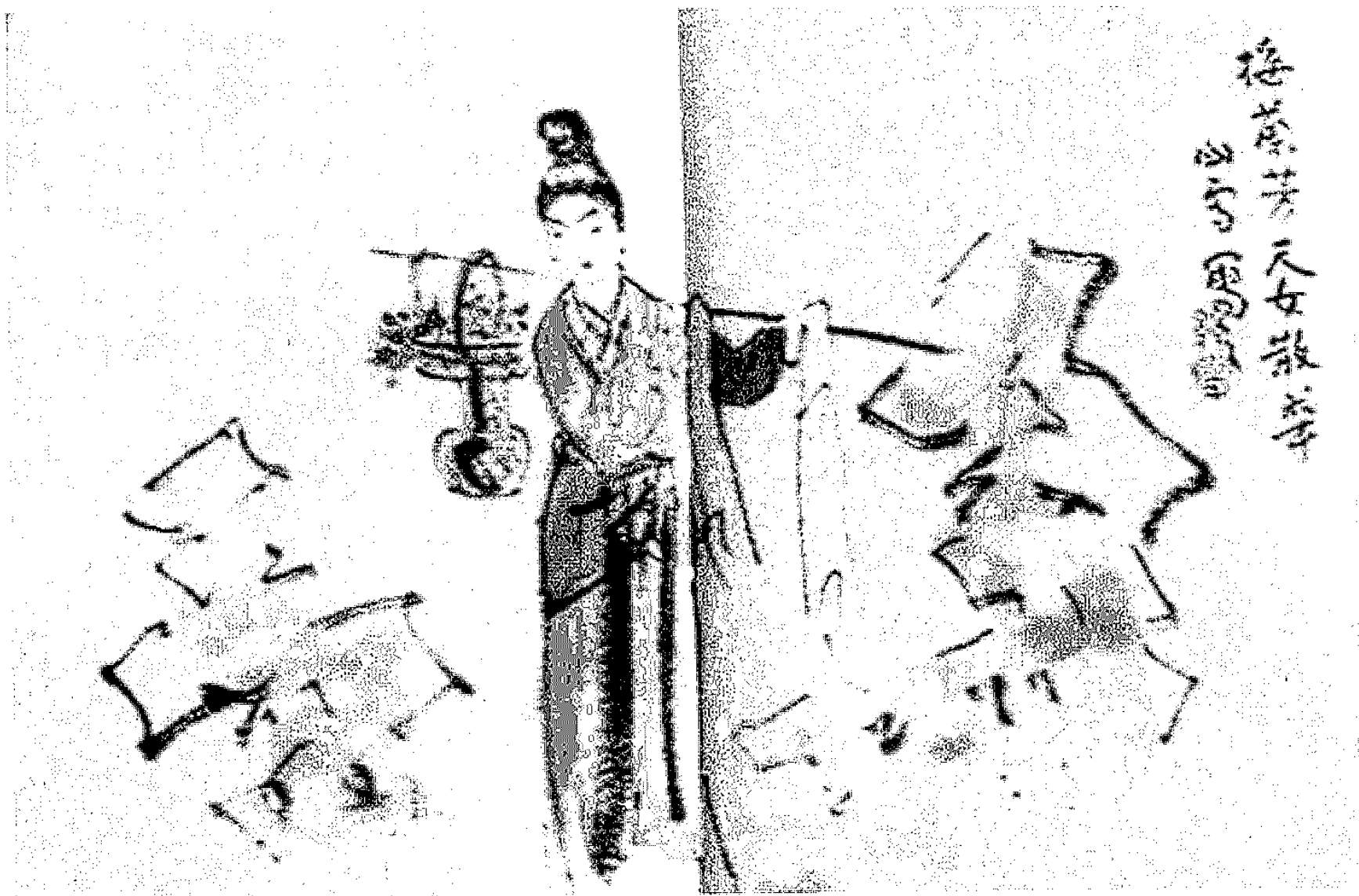
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图书馆里，曾欣赏过日本近代画家的图册，那里面选有关东派领军人物桥本关雪的作品。印象比较深的是他的山水和狐狸，尤其是狐狸，像人一样的美丽、灵性。

很遗憾，他画的梅兰芳就不大美丽了。中国传统绘画与中国传统戏曲在表现方法上，有许多相通之处。比如对神形关系的把握，或神似，或形似，最佳境界是神形兼备。关雪画的“梅兰芳”，神不似，形也不似。从细节上讲，角色的穿戴、行头以及道具，都是错的。可以说，这出戏不是《天女散花》，倒像《黛玉葬花》里的“荷锄”。我觉得，这是桥本关雪的一幅小品，荒率又清寒，属于漫不经心的挥洒。

但我依旧感动，感动于画家的精神。桥本关雪活了六十二岁，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三十次来中国；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后来则由喜欢变为精通。“恨不生长在中国为中国人。”则是他的名言。在我们拼命西化、洋化、全球化的今天，读来竟十分凄凉。鄙薄传统，看不起自己的文化，并非从现在开始。即使是大文人，也是态度各异。下面讲两个小故事，从中可见这种差异之大。

京剧的四大名旦，梅兰芳雍容华贵，尚小云矫健倜傥，荀慧生伶俐

桥本关雪笔下的梅兰芳。



接ぎ木入女歌集
 昭和十一年四月

妩媚，程砚秋则是浓浓的书卷气，以清素悦人。程砚秋的气质，显然与他自幼并长期地接受大名士罗瘿公的影响直接相关。程的艺术与人品，博得许多文人墨客、教授学者的青睐。画家徐悲鸿酷好程派，为其独特唱腔表演和内在精神气质所吸引。对此，徐夫人蒋碧微很是不能接受。她对朋友叹道：“悲鸿是自甘堕落了！”

1948年，清华大学举行春节团拜联欢晚会。校方特别邀请程砚秋出席并演唱。那一年，程砚秋隐居在北平西郊董四墓村，为主持设立在玉泉山畔功德寺内的功德中学而奔忙劳碌。同时，他也向王吟秋等弟子专心授艺。接到邀请，程砚秋满口答应。2月24日下午，程氏夫妇先到吴景超教授府上。车未抵达，吴家和经济学家刘大中夫妇已在门前恭候。傍晚，吴景超设宴款待。晚上7时许，梅贻琦校长、朱自清、吴景超夫妇等人与全校教职员工，一起观看演出。四十四岁的程砚秋身穿青布长衫，清唱《锁麟囊》里的一段“二六”——“春秋亭外风雨暴……”第一句，就掌声雷动，满堂叫好。一段不行，再加一段，程老板几乎下不

了台。这也是他一生中破例的不化装的清唱。当夜，朱自清随即赋诗两首，分赠程砚秋及其弟子王吟秋二人。他赠与程砚秋的，是一首七绝：

韩娥歌哭入云深，
老幼悲欢不自禁。
今夕琳琅闻一曲，
千人忘味各沉吟。

据我所知，陈寅恪也是很喜欢戏曲的。即使到了晚年，他的眼睛失明，也照样去戏院听戏。留下的观剧诗篇，都很动人。

当年的观赏者和表演者，都已远去；如今，老老小小无不沉溺于物质享受的追求和消费文化的快感里。回首前尘，不胜惶悚。六十年来家与国，八千里路云和月。我们和我们的文化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沧海桑田？

壹拾肆

我看到了洪堡大学

章诒和

小贺去过德国。行前，我们因为其他事情通了电话。最后，他问：“愚姐，在德国有需要我做的事吗？”

我说：“没事。”

其实我有事，是心事，就是一心要亲眼看看洪堡大学，那是父亲留学的地方。

之后，我去了德国。终于见到向往了几十年的“洪堡”。



周末，洪堡大学主楼前的旧书摊。

洪堡大学是1949年更名的，此前叫柏林大学。创办者是19世纪初的普鲁士教育大臣威廉·冯·洪堡。由于他所做的工作多为开创性的，在德国被尊为“德国现代教育之父”，遂以他的名字命名。我不懂外文，只有借助翻译过来的图书和文章来了解父亲曾经就读的学校，故非常粗浅，加上记性也坏，所知甚少。我知道在洪堡大学里，产生了人类第一个实验室，第一个研究所，第一本专业刊物，以及第一个研究生院和导师制度。国家给洪堡以物质上的支持，但不干预教育，不干涉学术。

“为科学而生活”，是它的校风。所以，洪堡为举世公认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正是这个洪堡，使德意志大学教育成为西方国家纷纷效仿的模式。

柏林洪堡主楼的二楼是一条很长的走廊，洁净如洗。走廊墙壁悬挂的是一张张放得很大的照片，都是黑白片，都是人物照。绝大部分的面孔于我生疏得很，想必他们应该是学者、科学家，是洪堡的骄傲与自豪。其中，我只认得黑格尔、叔本华、爱因斯坦等几个人。后经过翻查我才知道，他们都是洪堡的教授，当中有二十九人获诺贝尔奖。一所大学所拥有的，超过了一个国家。我是黄昏时分离开的，走廊长长的，灯光柔柔的，无声无息，门自开自阖，庄严，寂静。照片上的教授相貌各异，但眼光都那么深邃。他们凝望着年轻学子和远道来客。

从德国归来，洪堡就成为我心中不断浮现和反复咀嚼的主题。以它为背景，反复体味和想像父亲的留学生活。

1921年，父亲辞去安徽宣城师范校长的职务，那年他二十六岁。回

顾主校一年的得失，他深感自己的不成熟，有继续学习之必要，决意出国深造。于是，束装北上，投考庚款留美。不想，那次庚考只考送一批医科留美生，所考科目为自然科学。这不是父亲之所长，他落榜了。只好回到安徽，另做打算。这时忘年之交房秩五先生，仍在安徽芜湖道尹任上。他很看重父亲，支持他出国留学的志愿，遂向省长许世英推荐。许世英也乐于多培养本省人才，遂以安徽省公费送父亲去德国留学。1922年，父亲来到上海，与朱德、孙炳文和房师亮〔房秩五之子〕一起登上上海轮。他们志向一致：去德国，去留学。

最初，他们都住在一处，父亲和朱德同室，他们成为好友，几乎无所不谈。绝大部分留学生兑换的货币是马克，只有父亲兑换成美元。前者大跌，后者大涨，父亲像意外发财一样。不久，朱德另住去了。父亲深感宿舍不大安静，便住进一个德国家庭，女主人是犹太老妇。当她得知父亲是按美元结账，真是高兴极了。父亲在这个家庭一住四年，首先获益的是他的德语，口语和阅读很快过关。其次，培养了德国人的生活态度和方式。每天清晨洗澡；永远的白色，如衬衫、内衣裤、床单，且天天换洗；问候每一个人；讲究早餐的质量；嘴含食物不说话；早晨必读送来的当日报纸；每天收拾房间，物件的摆放都有固定的位置；注重细节，细到用抹布擦拭房内盆景的叶片；重然诺，守信守时；不随便带人进门；要做事就一定做好，有始有终等。父亲的一生都保持着这些习惯，并深深影响了我们做子女的。

当时的柏林大学只有几个系。他读的是哲学系，最喜欢黑格尔。记得当我告诉他，学校的哲学课也在讲黑格尔的时候，父亲的两眼顿时闪

着光。我又说，还是不大懂啥叫“绝对精神”。父亲立即把我带到书房，一板一眼地讲解起来。他兴致越来越高，声音越来越大，好像面对的不是一个我，而是一群人。周谷城先生在一篇回忆文章里，也描述过父亲和他彻夜讨论康德、黑格尔、弗洛伊德以及海德格尔的情景。从父亲毕生的政治生涯看，的确从哲学里获益不少，培养并训练出很好的抽象思维和概括能力。

父亲在德国留学期间，有两件重要的事情。一件就是由朱德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德国的党小组，朱德是组长，父亲是副组长。在法国的共产党人，有周恩来、李富春、邓小平等。这个旅欧党组织有定期集体聚会之约。每年起码两次或更多，轮流在柏林和巴黎聚会。父亲说，大家一碰面就是各自通报从国内获得的消息。然后，就根据这些消息，分析研究国内的形势和问题。你一句，我一句，非常热烈。另一件事情，就是在1925年春与邓演达的相识。这事于他比加入共产党更为重要。对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的基本观点，他与邓非常接近，乃至邓演达思想和行为影响了他的一生。他们一起创建了第三党。邓被杀后，父亲在第三党的会议上演讲：我们要像寡妇守节一样守住邓演达精神——这是章伯钧的一句名言。

父亲向我讲过留学期间的许多小故事，都很有趣。其中的一个细节，给我印象至深。他说，当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临睡前一定会把剪刀、水果刀等利器藏好。

“为什么？”我很不解。

“孤独，太孤独！一时冲动，会自寻短见。”

威廉·冯·洪堡塑像。



建筑的政治学

贺卫方

一般人读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大抵上是以上卷为主的，因为那里包含着作者最经典的民主学说。不过，下卷里却也有一些有趣的讨论，涉及民主制度与文化的各个方面之间的关系。例如，第十二章的题目也是作者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人建造一些那么平凡的建筑物，又建造一些那么宏伟的建筑物？他主要的解释是，因为在民主体制下，每个个人都显得很渺小和软弱，但是代表众人的国家却非常强大。于是，他们在营造自家的建筑时不会过于讲求，但是，公共建筑却一定要气象宏大才符合国民对于国家的想像。虽然号称一章的关于建筑的讨论不过区区两个印刷页码，其中的思想还是很让人深思。



二战德国海军部大楼。

最近两本这个主题下的专门著作的中译本出版了，一是萨迪奇和琼斯的《建筑与民主》[Deyan Sudjic and Helen Jones, *Architecture and Democracy*, 李白云、任永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另一本是萨迪奇的《权力与建筑》[*The Edifice Complex*, 直译为《宏大建筑情结》，王晓刚、张秀

芳译，重庆出版社，2007年〕。两本书的同一作者萨迪奇出身爱丁堡大学建筑系，现在是著名的建筑评论家。前一本研究的范围主要是议会建筑，从古希腊政治集会一直到最晚近的苏格兰新议会大厦。后一本则侧重分析政治家以建筑显示权力的情结，以及建筑师如何周旋于那些权力与艺术之间，让读者了解建筑与政治的复杂关系。

初读《建筑与权力》一书，对于那么多的政治家热衷于建筑，热衷于通过建筑显示权力颇有些惊讶，凯末尔、希特勒、墨索里尼、巴列维、密特朗、萨达姆·侯赛因、布莱尔……不一而足。关于希特勒，自己过去访问德国时，曾经在慕尼黑看到过一些线条质朴、与古典建筑风格迥异的白色建筑，陪同告诉我那正是纳粹时代留下的遗产。《建筑与权力》一书里对于希特勒这位建筑学院的落榜生如何终生痴迷于建筑的描述，让我印象深刻。在希特勒看来：

宏伟的建筑是消除我们德意志民族自卑感的一剂良药。任何人都不能只靠空话来领导一个民族走出自卑。他必须建造一些能让民众感到自豪的东西，那便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建筑。这并不是在炫耀，而是给一个国家以自信。一个拥有八千万人口的国家有权力拥有这样的建筑，我们的敌人和朋友都一定要认识到这些建筑巩固了我们的政权。

书中有描述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哈查到德国总理府觐见希特勒的那一段，写得真是惊心动魄，既有对于哈查心理的描写，又有对于总理府建筑细节的刻画——总理府前广场四分之一英里的长道，没有任何家具陈设的大厅，透露出无比威严的强硬线条，闪闪发光的青铜门，四千平方英尺的办公室，所有这一切，把书中的一句话的意蕴活生生地表现出

来：“如果说建筑曾被用做战争的武器，那这里便是了。”

虽然萨迪奇在中文版序言里，提到他1992年对北京的访问，不过，他并没有对于中国古今的建筑与权力关系作出论述。

前面我们提到托克维尔，他主要讨论的是民主制度下的建筑风格。但是如果做一个对比，我们会发现专制与民主两种对立体制下的建筑风格却有着类似之处，那就是国家政治建筑的宏大和一般民众住宅的渺小一样形成巨大反差。如果说，民主体制下这个结果来自民众对于国家伟大的想像的话，那么，专制体制下则来自于统治者把建筑作为震慑子民及外人的权力修辞术。此外，如果专制不仅建立在政治的集权上，而且也建立在财富的高度集中上，那么就会对小民百姓的居室风格产生更严重的影响。

此话怎讲？无论怎样的房子，都要建在土地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土地的权利安排对于人们的建房心理和结果影响至大。如果土地的私人所有权得到法律严格的保护，人们就会存长远之心，倾尽全力修造坚实华丽、垂之久远的屋宇。相反，如果土地权利设定短暂，朝不虑夕，甚至压根儿没有私人的土地所有权，那么私人就不可能用心费力建设美轮美奂的豪宅，反而只是追求眼前的享乐。孟子那句话，我们都耳熟能详：“无恒产者无恒心。”与其他生活必需品相比，如果土地权利能够变成真正的恒产，建于其上的房子就会“恒产化”。它不止惠及一代，而且庇荫子孙后代。但是，如果人们没有长远之想，住宅能够遮风避雨就得过且过了。这是建筑的政治学的另一层意义。

壹拾陆

姫路城

贺卫方

2006年9月，承友人陪同，我参观了日本著名的古迹姫路城。

这座以军事目的建设的城堡位于兵库县南部，始建于1346年，完成于17世纪后期。城堡矗立在姬山之巔，灰瓦白墙，造型灵动。人们都说它有如一只展翅高飞的白鹭，所以又叫白鹭城。进入内部，外观轻灵的这座古城，固若金汤的一面更多地展现出来。毕竟是为防御而建，守卫功能的设计可谓用尽心力。战国时代末期著名将军丰臣秀吉的建设不必说，德川幕府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的女婿池田辉政重建和扩建时，即用木材三百八十七吨，还用七万五千块重达三千零四十八吨的瓷砖，以及

右图：姫路城。



大量每块重一吨的巨大岩石。主建筑天守阁高达三十一米。登高望远，四周一切动向都在一览无余之中。日本虽然是一个幅员不大的岛国，但是各地建筑的气象宏大却令人印象深刻。不只是姬路城，其他如京都、奈良的寺庙等古典建筑，以及像国会大厦、最高法院〔最高裁判所〕那样的现代建筑，都是造型伟岸，气度不凡，巨木重石，大处豪气干云，细部则风趣精巧。如姬路城，能够把军事需求与艺术审美结合得如此和谐，足以显示日本人在建筑方面巨大的创造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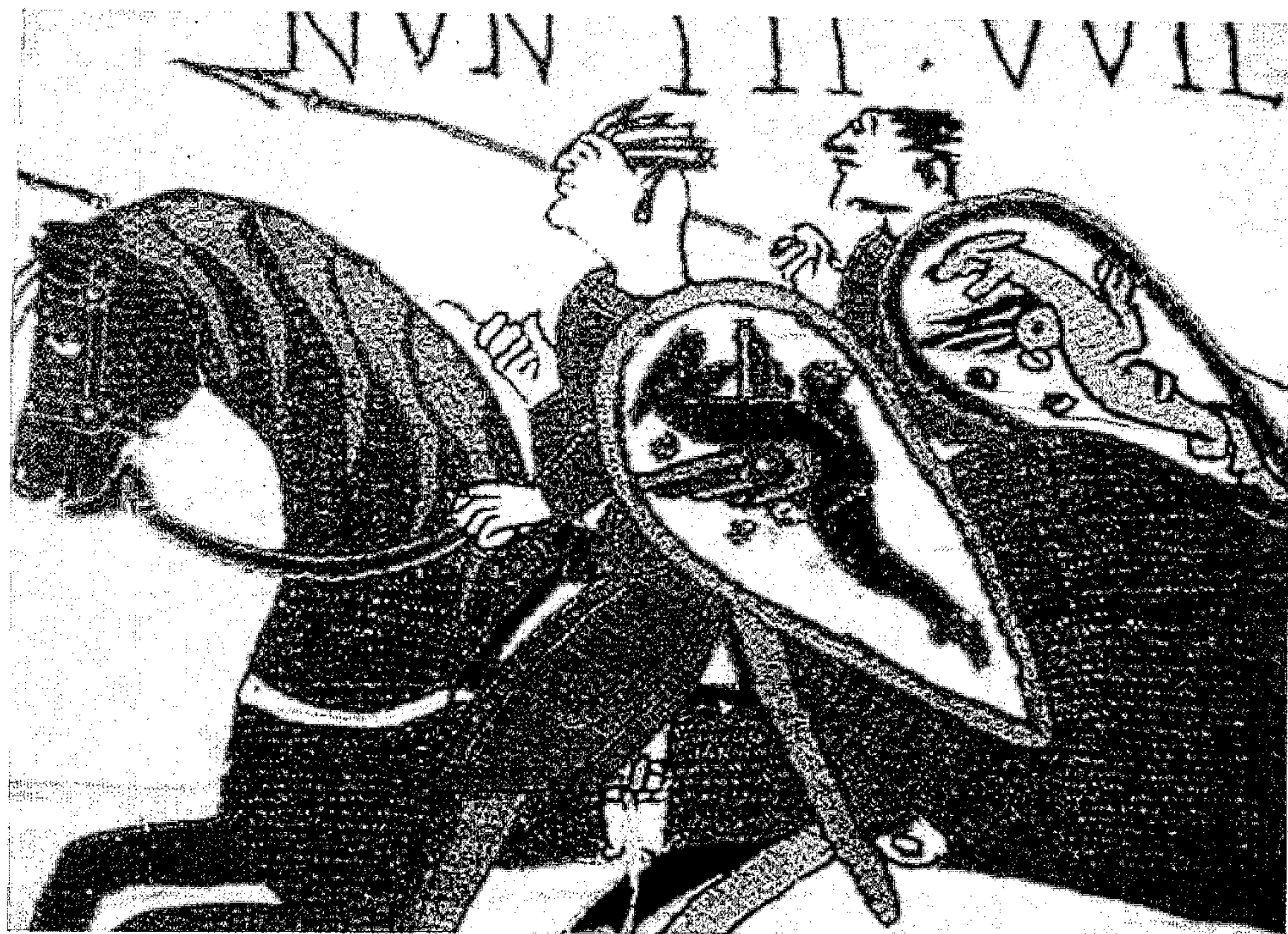
在天守阁建筑的底部外墙上，我发现了一片镶嵌的巨砖，上面雕刻着各种圆形图案。那是什么？同行数人都猜不出。经过询问，才知原来池田辉政在修建城堡时，得到当地名门望族的鼎力襄助。这些圆形图案，正是那些贡献巨大的家族的家徽。这就像国内的一些建筑，尤其是在寺庙中，常见竖立着功德碑，上面会镌刻一些为建筑作出贡献者的姓名。然而，我们这里却只有姓名，没有家徽。这或许不能说都是因为那些人只是以个人名义捐献，也难以仅仅从艺术偏好或品位去解释。因为我们事实上就是没有这类象征家族的符号。我们没有，但日本却有。不仅日本有，欧洲也有。关于姬路城的介绍文字中常说，这座城堡有助于人们对于开始于幕府时代的日本封建社会的理解，这块家徽牌中是否蕴含着某些可以揭示中日社会差异的奥秘呢？

欧洲历史上的家徽或称纹章[heraldry]，起源很早。最早大多也是起于战争的需要，即为了便于身着护体盔甲的战士能够辨别敌我，防止自己



家徽板。

手持饰有纹章盾牌的欧洲武士。



人相互打起来。后来就更多地与家族相联系，成为门第、身份的符号。一般认为，欧洲大规模的纹章使用是在12世纪之后，血统观念与贵族政治紧密结合，出于强化血统意识的需要，家族的标志变得十分重要。流风所及，也影响到其他机构或法人，国有国徽，城有城徽，大学有校徽，足球俱乐部也有各种不同的纹章。一位纹章专家曾说，纹章文化大多盛行于欧洲以及欧洲殖民地区，但日本是少有的例外。为什么在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深受中国影响的日本，在纹章或家徽上却偏偏跟欧洲遥相呼应呢？

旅日有年的李长声先生说起日本的徽章来，口气多少有些不屑。在《浮世物语》一书中，他说一些日本人因为本国与欧洲一样拥有纹章的缘故而不免“沾沾自喜，傲然四顾”。他说：“虽然都作为战场上识别敌我的标记，但西欧最初是画在盾牌上，从起源上来说与日本是两码事。而且，徽章在欧洲是个人的标识，而日本是家族、家世的记号，所以叫‘家纹’，译作家徽似便于理解。”李先生又解释道：“中国没有产生家徽，或许是因为汉字本来就具有图案性，你看，远处烟尘滚滚，冲过来一彪人马，旗上大书一个‘李’字，但刘项原来不读书，士卒都认得吗？”对此，我略有疑问：如是图案，那就认图而不必认字。金庸小说《侠客行》里那主人公石破天，不就是因为不认字反而可以把石壁上的刻字看成图画，才破译了那识字人根本无从解读的神功剑法么？再说，中国同姓之人甚多，只是以姓氏为徽记，不同家族也还是不容易互相区别。所以，汉字的象形特征不大能解释中国何以没有家族纹章。

依我猜测，家族的独立性难以见容于专制统治是更重要的原因。按人们都耳熟能详的说法，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一直是奉行家族主义的。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放大。把家庭内部亲情关系的准则推演到政治关系中，父慈子孝就会转化为孟子所谓“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不过，这种理想化的设计却每每走向反面。常见的结局，一是君臣关系的常态变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另一个则是以家族伦理始，却以消灭家族主义终。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帝力所至，不许豪族逞威。一切足以威胁或妨碍君权的势力，最终都消灭殆尽。在这种情况下，家族、贵族阶层以及同业行会等国家权力之外的联合都难以保持基本的独立性，甚至西方宪政秩序得以产生的阶级化社会结构也无从发育。君主、贵族、官僚以及民众之间的四权博弈格局，更是闻所未闻。日本在历史上引进中国典章文物很多，不过，我们最伟大的科举制却拒之门外，正是由于这种“民主”的选官制度足以打破那里的阶级结构。

看起来，家徽或纹章存在与否只是历史上的一个微观现象。不过，“一沙一世界”，也许是揭示不同国家社会结构和历史走势差异的一个符号化的暗码。



一幅姬路城全景画。

壹拾柒

吴哥的绝世微笑

章诒和

没有读过高棉史，但我知道古高棉王国有个重要人物，叫阇耶跋摩七世。他的英名传扬天下，并不在于以武力重新统一帝国的赫赫战功，而是因为他在旧都附近另建的一座吴哥王城。

在位几十年的阇耶跋摩七世〔在位期约为1181—1219年〕是个建设之君，把新吴哥王城规划为方形的棋盘样式格局。他修建道路，把帝都 and 边远的国土联系起来，道路每十三至十六公里就设有驿站和诊所。他还修建旅馆、水库、医院以及许许多多的寺院庙宇。一座医院的落成碑文上，写着这样一段话：“君王深心充满怜悯、造福世间之情，立下誓言：



描绘国人征服的浮雕。

历尽劫难，微笑依然。



‘愿以此功德，救拔投入轮回生死海的所有众生。愿后继高棉君王偕嫔妃、贵胄及亲友，得达无疾无患之解脱国土。’”拿这段话和我们的某些竣工贺词相比，似乎有着更多的感情色彩。阇耶跋摩七世也似乎想把他的高棉王国，搞成一个神权下的福利国家。

吴哥王城中心高筑神庙圣山巴云寺[Bayon]，又称巴戎寺，其规格小于吴哥窟[苏利耶跋摩二世开始修建，约在1112-1150年间]。小贺拍摄的，正是巴云寺众多塔尖所刻雕像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座。他把图片拿给我看，当时就觉得眼熟，不知在哪里见过。回家立刻翻书查找，终于在英国学者修·昂纳与约翰·弗莱明合著的《世界艺术史》里看到相同的图片，只是拍摄者选取的角度与小贺有所不同罢了。

再查读相关的详细材料，才知巨型雕像很有可能是仿照阇耶跋摩七世的面容，而此前一直被认为是湿婆[Shiva，印度教主神]的模样。雕像是被神圣化，也是极其艺术化了的，体现出观音菩萨的面部特征：凤眼半闭，厚唇微启，呈沉思状，静观自在。四面脸——向东、向西、向南、向北，象征着阇耶跋摩七世凝望四方，带着永恒的微笑。这个绝世的微笑，被后人称为吴哥的微笑，有人专门拿它和卢浮宫的蒙娜丽莎相比，讨论谁的微笑更具诱惑力。雕像的面部巨大，有男性的力量，表现法力无边；面容是柔和的，是女性的外貌，凸显大慈大悲。在这里，世俗与性灵、神性与人性自然融合在一起。一个痴迷吴哥艺术的女摄影师告诉我：随着阳光强弱和投射角度的变化，人面头像的这些表情也随之变化

呢！我想，要获此感受，恐怕需要无数次地去吴哥，去巴云寺了。

小贺去吴哥，吴哥王国早已消失，雕刻工匠也没有了，连讲述吴哥故事的人也难寻踪迹。剩下的，就是石头，或散落，或堆砌。他只能把镜头对准石头，也正是无语的石头保存了吴哥和吴哥记忆。艺术、宗教的作用和力量，比出于政治目的修建的纪念堂、纪念碑、纪念馆似乎还要顽强、牢固。我们用眼阅读吴哥王城，看到的是惊心动魄的美感。若用心阅读吴哥王城，便会感到历史移动着缓慢的脚步一步步迎面走来。阇耶跋摩七世一生的荣耀，浓缩在这里；长达几个世纪的吴哥王朝的兴衰，也汇聚在这里。

巴云寺的雕刻工程从未完成过，但在阇耶跋摩七世去世后，国情发生了变化，教派发生了变化，艺术的反映方式也随之变化。时间久了，高棉雕塑中那令人震撼的硕大佛像就此成为一种遗传，流传到了泰国、缅甸以致更远的地方。但巴云寺——吴哥文明的最后光芒，是永远无法抹去的。

一任春光、夏暖、秋意与冬凉，阇耶跋摩七世怡然地凝望四方，他凝望什么？也许古代文明和当下生命一样，充满秘密，也充满玄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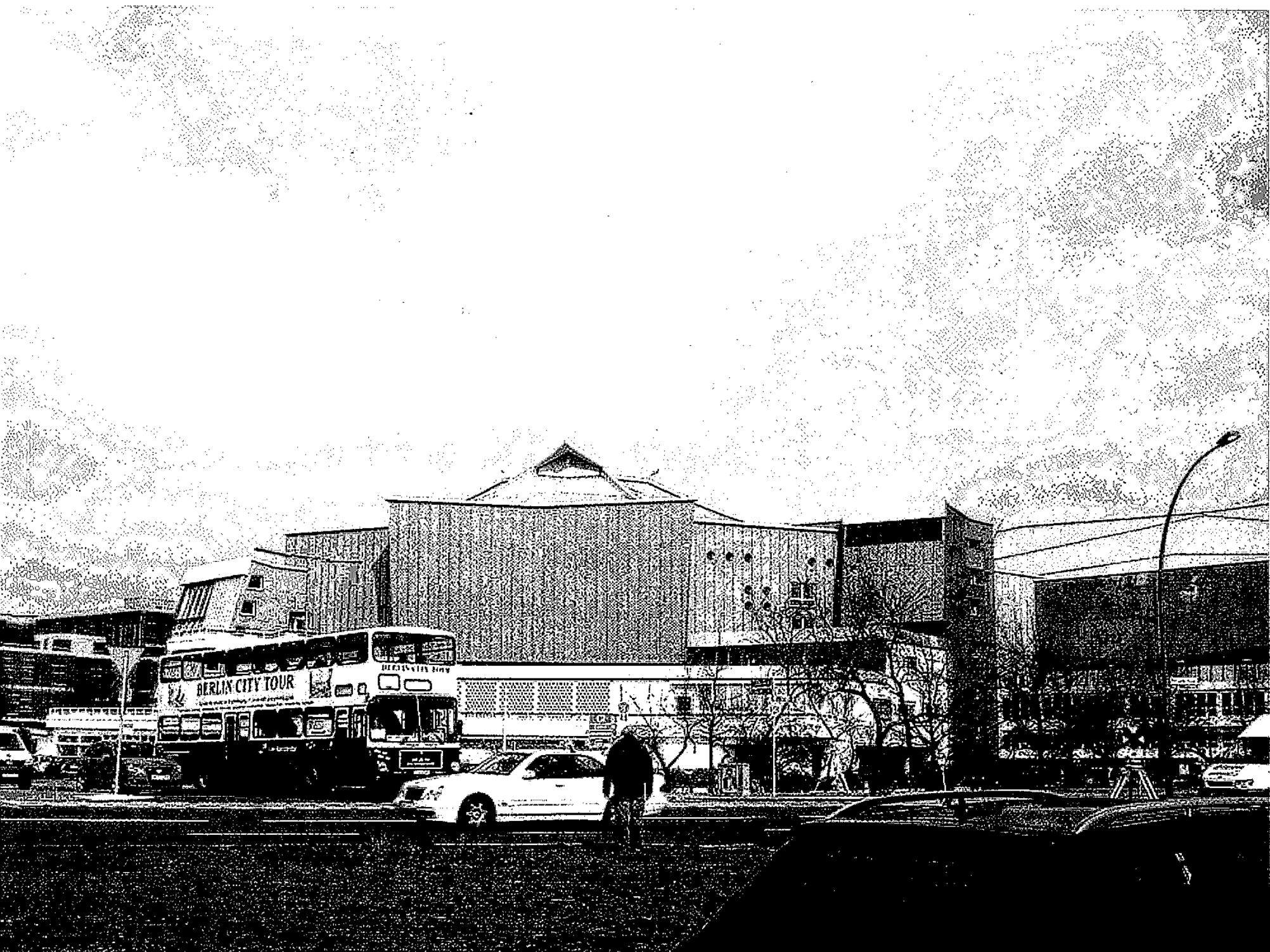
壹拾捌

经过“柏林爱乐”

贺卫方

我曾两次访问柏林，曾两次经过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奏厅，但都无缘进入参观，更不用说听一场那里的音乐会了。

这个演奏厅的建筑设计本身即为一个伟大的作品，它最为独特之处是将整个乐队置于大厅的中心。四周是自由伸展的、不对称的观众席，呈八角形布局。大厅建成后，不仅对战后德国影响至深，而且它的全新建筑理念持续不断地延伸到世界各地。北京新建的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也是其衍生物。演奏厅的外形是由内部空间决定的。周围的墙体曲折多变，极不规整，甚至难以形容。我每次走过，在蓝天白云之下，看着那



“自由管弦乐共和国”。

黄色的墙面闪耀着质朴又亮丽的光芒，都会油然而生一种崇敬的心理。

听众进入厅内，穿走廊，绕立柱，上台阶，过矮墙，才最后来到自己的席位。初次来此的人一定会产生扑朔迷离、非同凡响的印象。这种座席的安排，彻底改变了传统音乐厅的长方结构。它的直接效果是使乐手与听众之间拉到了“零距离”，制造出随和、轻松、潇洒的气氛。艺术家们在这种场景下也享受着与听众互动的乐趣，那是心灵的感应，情感的交融。只有亲身体验到这种距离下演奏感受的人，才会理解这样设计的巨大魅力。

柏林爱乐乐团享有世界性盛誉，古典音乐爱好者都无不对其风格交口称颂。演奏厅环廊里，悬挂着自这个乐团1882年诞生以来历任指挥的照片，从维尔纳、冯·彪罗、尼基什，到富特文格勒、冯·卡拉扬。每一个了解这个著名演奏团队的人，都会对于这些光彩照人的名字肃然起敬。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中，柏林爱乐的代表符号是卡拉扬。自1955年起，这位卓越的指挥家统率乐团长达三十四年之久。他对于作品有着独特的解读，指挥风格严谨、深刻，极富冲击力和感染力。这种风格也许有某种神秘的来源。当卡拉扬看到天上飞翔的大雁，他喃喃自语，认为那种飞动中的秩序背后一定有一种难以解说的链条，可把每一只大雁的意志集合为一个感人的整体。卡拉扬是一个独裁者，明确地说有两个地方不能有民主，一个是军队，一个是乐团。据说，这种独断专行的风格在他的晚年引起了不少内部的困难，柏林爱乐毕竟以“自由管弦乐共

和国”号称于世，每一个成员都自以为是这个共和国的公民。只是这专横的卡拉扬太有魅力了，他的声誉压制了反叛，同时也约束了自己，把他的意志限制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在一部他的传记纪录片中，我们看得到那次演奏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幕后场景。上台之前，他甚至要叮嘱大家用别针固定燕尾服的某个部位。他说：今天的演奏要电视直播，全球将有数以亿计的听众在听着我们。走上台的卡拉扬庄重而优雅，全曲一气呵成，令人陶醉。那真是贝多芬演奏史上的极品之作。

在柏林爱乐的演奏中，让我特别感动的是两个协奏曲，一是穆特的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另一个是基辛的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年少的穆特和更年少的基辛跟银发满头的卡拉扬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但那又是多么令人惊叹的和谐！细看，穆特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她的眼睛很少直视卡拉扬，也许余光以及排练时形成的默契已经足够了。但是，那位俄罗斯天才少年却时常抬眼看着指挥，他的演奏是如此成熟、大气，只有那怯生生的眼神，才忽然让我们忽然意识到他还只是一个少年。

卡拉扬死于1989年7月。最后的时刻，音乐家的耳朵仍然是超乎常人的。他头枕着妻子的手臂，轻轻地说：我听到上帝在召唤我的名字……

壹拾玖

坂东玉三郎

章
诒
和

我于2008年3月下旬赴日。除了演讲、接受传媒采访以外，自然是樱花，和纸，煎茶，神社，新干线，金阁寺，二条城，居酒屋，枯山水，浮世绘，等等了。人未离东瀛，即有记者来问：“此行收获如何？”

我答：“收获可概括为‘三幸’。一有幸结识日本学者和在日本工作的中国朋友；二有幸欣赏坂东玉三郎的《牡丹亭》；三有幸参观东山魁夷百年诞辰的画展。”

如此三点，对方多少感到有些意外。其实，有这样的感受，自己也



杨贵妃〔坂东玉三郎饰〕。

意外。限于篇幅，我这里只说坂东玉三郎。戏票于一个月前便预订妥帖，演出在有名的京都四条南座。进得剧场，水红灯光洒满水红色丝绒沙发，一派华艳；观众衣冠齐楚，气氛安谧。这与我们的戏院子里的嘈杂喧哗，完全不同。国人是要以亢奋的情绪来说明看戏原本就是“找乐子”。而他们是要以端庄的仪态来表达对艺术的钟爱。演出当中有二十分钟小憩，朋友陪我去休息大厅。大厅里的人不少，没有我们幕间休息时见惯的“呼朋唤友”和“高谈阔论”。几个玻璃橱窗陈列并出售坂东玉三郎的剧照，它们不是复制品，是真正的照片。每一张都有编号，每一张都漂亮，每一张又都很贵。我早就不收藏剧照了，原有的也陆续捐给图书馆。但是，看着这些顶级美丽又是顶级洗印的照片，即使再贵，我也要买了。我想要的最美的一张已经售空，于是另选了四张。买它，不为别的，就是想留住这一点美的记忆。如今，中国舞台的盛大豪华演出可谓多矣，连传统的三国戏也捣鼓得如百老汇般的富丽堂皇。但是，所有的场面和阵容加起来，恐怕也抵不上一个坂东玉三郎的美丽与魅力。

坂东的表演行当，在中国叫男旦，在日本叫女形[Onnagata]，也就是男人演女人。坂东玉三郎曾说：女形表演的女人“单单在视觉范围内的描写是不够的。那个女形能够感受到女人心情至何种程度，才是重要的”，所以，“女形是细微要素的积累。”关于“比女人还女人”的说法，他在《我的想法》一文里写道：“这大概因为女形是‘作品’，才更好看的缘故吧。例如，听维瓦尔第的《四季》，就可以断言四季是音乐。实际上的四季要比维瓦尔第的《四季》精彩得多。所以，不能说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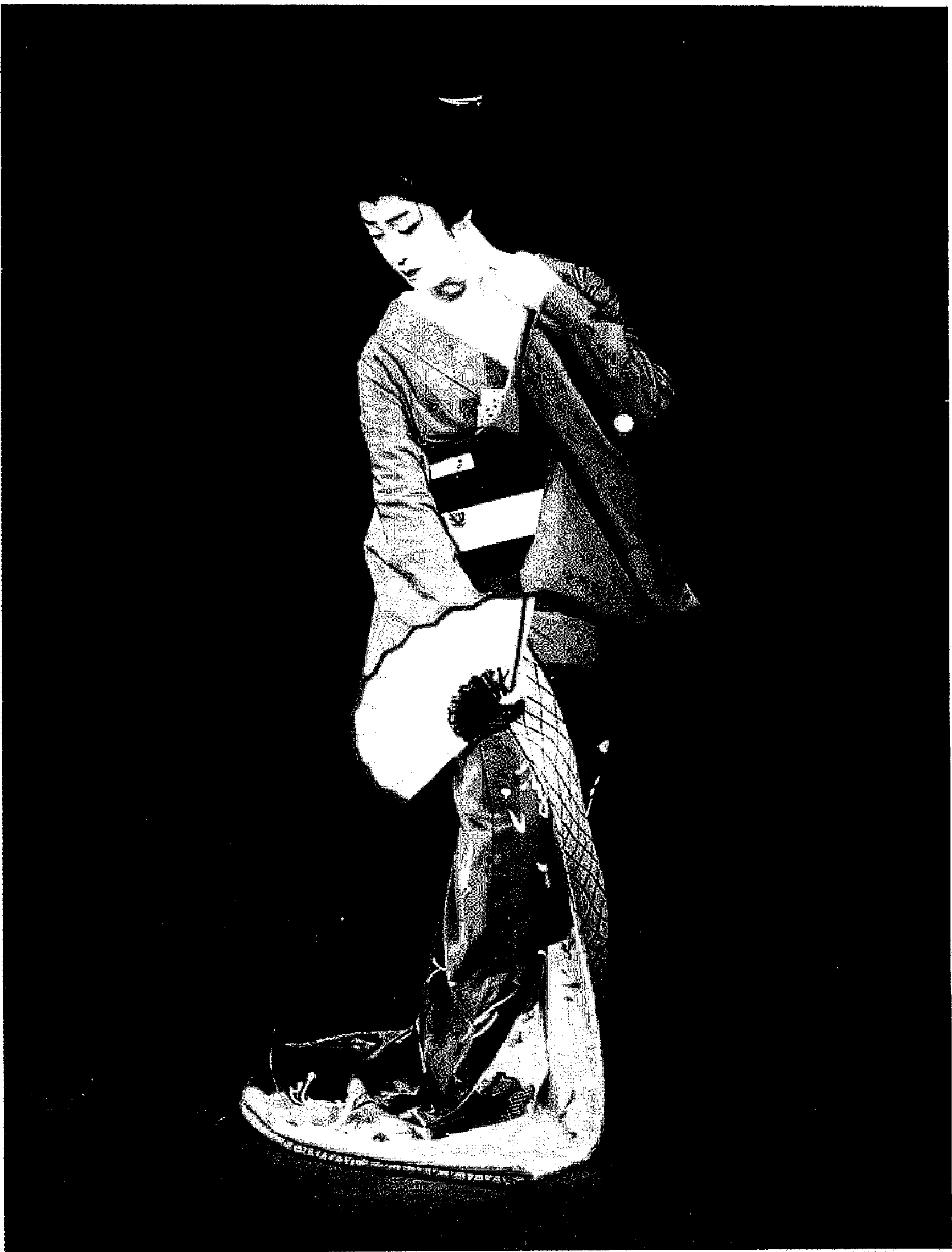
右图：坂东玉三郎剧照。



瓦尔第的《四季》比实际上的四季更像四季，但是作为作品，其完成度很高，人们可以通过它来感受四季。在某种场合，甚至比实际上的四季更能感觉到四季。我想，就是这么回事。因此，女形比女人更像女人这种事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是比女人更接近男人。”坂东玉三郎有着很高的文化修养，故而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特性就有着比中国艺人更为准确的认识和分析。

我看的演出剧目是《杨贵妃》和《牡丹亭》。前者参照了梅兰芳的《贵妃醉酒》，按日本传统歌舞伎的舞台形态表演的。白脸白衫，素雅到极致，而两把无比艳丽富贵的牡丹图案折扇翻飞、舞动，则流泻出一个帝妃内心的愁绪与风情。歌舞伎的节奏比京剧要慢一些，所以表演多以细微制胜。《牡丹亭》是用汉语演唱〔伴以日文字幕〕的昆曲。半场演下来，我已是眼泪汪汪，惊叹不已又感叹万分。惊叹的是他把一个中国古代青春少女杜丽娘从活唱到了死；感叹的是他把已死的梅兰芳精神复活在东瀛。昆曲是中国明清士大夫的娱乐节目，一个不大的厅堂，一块红地毯，一只笛子，便算得昆曲的天地和境界了。但若是以为昆曲是不要观众的，那又是错了。比如，它的高度精致的歌舞性，就完全是为了台下看客的观赏。每一个字，都有严格的动作规范，即你唱到哪个字，眼睛该看哪里，手势该摆成什么样子，两腿又该如何——一切都不可随心所欲，完全由老师传授且世代遵守。正是由于昆曲的艺术成就非同一般，所以好演员、大演员都会唱昆曲，特别是昆曲中的经典剧目。

右图：坂东玉三郎剧照。



汤显祖笔下的杜丽娘，经过无数艺人的不断塑造，已经趋向稳定。到了梅兰芳以及指导坂东玉三郎表演的张继青那里，昆曲《牡丹亭》的搬演则基本满足了观众对她的完美想像。我想，坂东玉三郎扮演杜丽娘的神奇和成功，完全是这位日本歌舞伎大师尊崇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和表现。他以天分来接近人物的内心情感，以技巧来满足观众的审美需求。而自觉维护中国艺术的经典与精髓，才使他得心应手地做到艺术美感与文学涵义的统一。全剧从头至尾、举手投足，皆可看出坂东玉三郎对《牡丹亭》心存虔肃。这虔肃不仅使一个名伶〔歌舞伎国宝级大师〕在进入角色时能恪守规则、兢兢业业，也使得他在创作的前前后后保持着自制与谦恭。当他一次次鞠躬向观众致谢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坂东多么像当年的梅兰芳，比梅葆玖还像。是的，当艺人对传统文化的虔肃完全凝聚于心，敬诚和崇拜也就成为了自觉。有一身的气质做戏剧的文化底蕴，有准确的人物情绪做外在的表达，请问：坂东玉三郎塑造出来的杜丽娘，能不动人吗？

数百年的时间，中国戏曲由孕育形成到蔚然大观，创造了那么多的表演、音乐、舞蹈、服饰的程序，造就了那么多的艺术家，编创了那么多的好剧目，从而形成了一个无所不包却又和谐完整的戏剧体系。这期间仿佛有个无形的力量在那里不断地推动、调和、淘洗、熔铸，使中国戏曲按照时代的眼光、观众的情趣和美的规律去丰富、完善和提高。清末，代表着中国戏曲最高水平的京剧，被这个无形的力量“制造”了出来。民初，既代表着舞台艺术发展最高水平，又代表着中国戏曲体系的梅兰芳，被这个无形的力量“推举”出来。这种无形的“制造”和“推举”，包含着多种因素。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是无数能人、高手都无条件地把自己的眼光、独到的智慧和强大的财力输送给梅兰芳，恰逢

梅兰芳本人又是个绝世天才。在这个天地里，梅兰芳是艺术的主宰。台上是中心，台下也是中心。试想：当梅兰芳登上舞台，那清晰流畅的道白，多愁善感的表情，圆润婉转的歌唱，妩媚多姿的舞蹈，连同十万大洋的全堂行头，都附着在他一个人身上，而他又只是在描绘着一个女人形象并述说着她的人生际遇的时候，你能不激赏痴迷吗？现在，这个无形的力量明显地体现在坂东玉三郎的身上了。相反，在我们的演员身上则很难找到，尽管他们也有了知名度。

一个瑞士女记者曾问我：“你们不是也有票房价值很高的艺人吗？”

我说：“不错，是有票房价值很高的艺人，如于魁智，但于魁智不会创造。”这话恐怕需要加以解释——不是于魁智不会创造，而是我们没有教他如何创造。我们的学校是在培养听话的孩子，艺术学校则是在批量生产演员。出了学校到了剧院，演员的艺术再好，哪怕封你为表演艺术家，你也不是中心，身边更无智者和高级专业人士专为你编剧，专为你谱曲，专为你制衣，专为你筹划。剧院的目标根本就不是为了艺术，而是为了其他目的。要知道获奖很容易，而“三年出个状元，十年出不了一个唱戏的”啊。我常说：戏曲是彻底完蛋了，因为没有人。这里的人，不是指国家一级演员，是指角儿，大角儿，像中国梅兰芳、日本坂东玉三郎那样的艺人。

我有一张他身著玄色长衣立于会馆舞台中央的照片。孤零零的，很美。他不演戏也美，这也很像梅兰芳。

黑船上的汉学家

贺卫方

1853年7月8日，日本浦贺港，四艘黑漆漆的大船突然从遥远的海面上直驶而来，引得岸上的人们一片慌乱。从船上悬挂着的旗帜，看得出这是美国军舰。头一年，荷兰人就曾透露，美国人有可能来这里强迫日本结束锁国，建立贸易关系。想不到，他们还真来了，而且如此气势汹汹！

日本人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可怕的型制巨大、配备精良的军舰。可以想像，动武的结果只能是自取灭亡，于是只能和谈。率领舰队的统领是美国海军准将佩里[Matthew C. Perry]。他不仅是一位著名战将，还是个擅长威逼利诱的谈判高手。次年2月，佩里又率领九艘战舰——差不多把



佩里[1794—1853]舰长肖像，夸张的笔法显示出日本画家对美国人的想像。其汉字题款为“北亚墨利加合众国水师提督ペル二之肖像。年龄六十岁许，毛发半白”。

美国海军四分之一的兵力都带来了——陈兵江户湾。巨大的威胁之下，日本终于决定签订条约，开放口岸，从此走上了融入世界之路。佩里率舰闯关的事件，史称“黑船事件”。

这是日本国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但在一些历史书里，对这个事件缺乏相对细节化的描述，有的地方还存在某些悬念。例如，一般史书都说这是美日间的首次直接交往。但是，谈判是怎样进行的？假如各自说本国话，那么又是何人充当通译？黄遵宪的《日本国志》里写到这个事件，也不详细。

近读卫斐列所编的《卫三畏生平及书信》，发现汉学家卫三畏[S. Wells Williams]正是佩里带去的翻译，并且是对于条约签订起到重要作用的人物。要知道，此前作为传教士的卫三畏，已经在广州生活了整整二十年。传教之外，他编辑出版《中国丛报》，还忙着编写英汉辞典《汉英韵府》。佩里率舰队是在1853年4月6日到达香港的，他很快拜访了卫三畏。理由再简单不过：因为要远征日本，就需要翻译，而他在美国就听说了，卫三畏懂日语！一个难得的可以沟通东西方文化的人才。

卫三畏的汉语，尽管十分精湛，但对日语却难称娴熟。他的夫人在一封信里说得很清楚：“他被人扣上了日语专家的头衔，但实际上他只是十年以前跟一个日本水手学过一点日语，并且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练习过。他的日语基础是如此薄弱，可以想像，成功完成任务的可能



黑船〔日本版画〕。

性是极小的。”往前追溯，据卫三畏1837年9月10日致安德森牧师的信以及吉利克《伯驾与中国的开放》一书，卫三畏接触日本水手的时间是十六年前的1837年，当时美部会计划将七名在外国海域遭遇海难的日本水手送回日本，顺便探查正处在闭关锁国的日本。那次他们乘坐的是名为“马里逊号”的商船，由于传教士身份敏感，卫三畏是作为自然学家的身份出行的。这次访问完全失败，因为日本人根本不允许他们登岸，也拒绝七位水手返国，还用炮火袭击他们。七位日本水手只好原船回到中国。其间卫三畏开始向这些日本人中的一位学习日语，甚至还在日本人的协助下将《创世记》、《马太福音》等篇章翻译成日文——那的确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

不管怎样，佩里将军还是对卫三畏深信不疑，反复劝说，甚至说这是这个大计划能否成功的决定条件，四十一岁的传教士兼汉学家只好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1853年5月启程，经过琉球，7月抵达日本。日美进入交涉阶段，或许语言真是问题，日本人忙从长崎找来一个会荷兰语的通译，才大致解决了相互沟通问题。双方很快达成妥协，在7月14日举行美国总统信函交接仪式，美方四百人〔其中五十名官员，五十名乐师〕，日方一千五百名军人，五十名官员。双方举止得体，秩序井然。卫三畏说：“这是一次东方与西方的会晤，是国际交往史上的一大盛事，也意味着美国参与亚洲事务的开始。”

美日正式签约是在次年3月12日。据卫三畏的记载：“在举行签字仪式时，日方特使带来了三份日文本的条约，一份荷兰文译本，还有一份中文译本。我们则带来了荷兰文和中文译本各一份，英文译本三份。”其中，有个细节很重要：卫三畏熟悉《中法黄埔条约》，所以，美日条约的第九条就是根据他的建议，规定了日本须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这也许是汉学家对于此次缔约内容的一个相当实质性的贡献。

美日两国签署条约，相互居然要交换中文译本，这在中国之外的国际交往史上或许是很少见的情形，部分原因正是由于卫三畏的汉学家身份，在不通对方语言的情况下，双边都需要增添一个可沟通语言的译本来确保条约内容的准确。在最后签字时，双方核实中文译本，发现一方的译本多了一个字，就把它擦去了。签约时，不仅英文和日文原始文本，而且别种译本也要签署。签约之外，卫三畏还专门起草一份文书给日方，阐明西方世界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所遵循的准则，以及向西方开放对于日本的好处。这对于日本此后的开放政策或许也起到了某些作用。

此后，也有“尊王攘夷”运动以及小规模的和列强的冲突〔如1863年的“萨英战争”〕，但是大体而言，西方算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了。对于日本而言，虽然条约也有对于主权的损害，但是通过这种相对和平的方式融入国际社会毕竟还是幸运的。与之相比，中国的开放过程就艰难而曲折得多。从19世纪早期开始的一个世纪里，中国与西方甚至崛起后的日本之间战争频仍，兵连祸结，条约丧权辱国，赔款动摇国本，领土惨

遭瓜分，实在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多少有些无奈的是，中国在西方强权下的失败每每成为日本的借镜和警钟。日美条约能够和平签订，跟日本人获悉此前中国在与西方对抗中的惨败就有很大的关联。佩里的船队从英国割据的香港出发本身的象征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

因对中国有着长久的观察，踏上东土的卫三畏也免不了把日本人和中国人两厢比照。他说日本的官员服饰“花花绿绿，相当怪诞，显示出他们的品位不高，比起中国的长袍差远了”。下面这段话，是他刚刚到达日本一周时给他弟弟的信中写下的：“和中国人比起来，日本人给人的感觉是更加理性，精力也更加充沛。但是我觉得他们的生活并没有中国人那样舒适。他们的行动很不自由，也没有中国人那样有灵性。不过，与中国人相比，他们有着更强的进取心和好胜心。当这两个民族都认识到与别国进行交流的重要性以后，很可能日本人会在世界上为自己谋取到更高一些的地位。”——即使今天读来，他的话也值得我们三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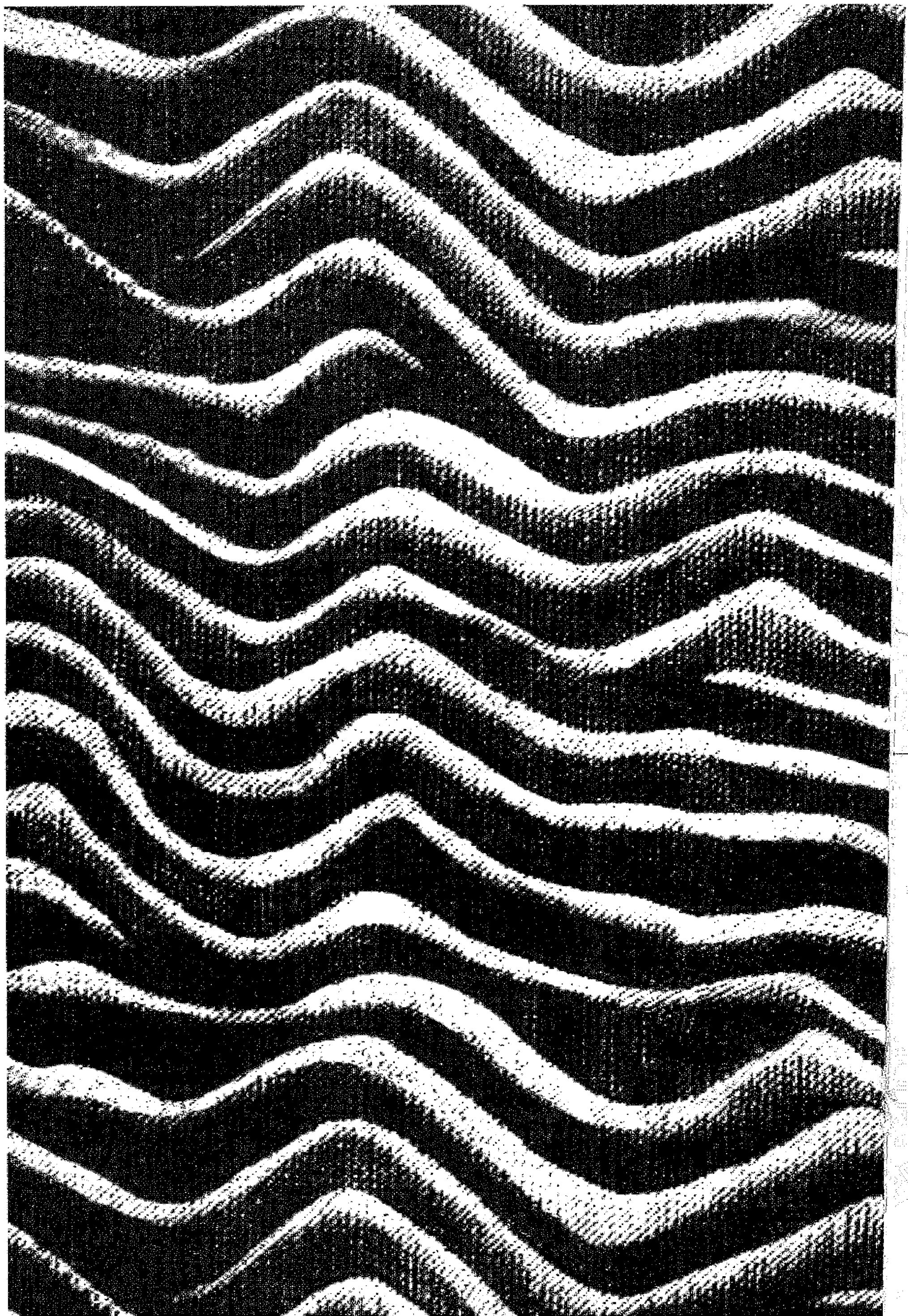
历史有如重复上演的戏剧。相隔近百年之后的1945年9月2日，美国军舰又一次来到东京湾。在“密苏里号”上，新一代的“佩里”麦克阿瑟将军及其他同盟国的九名代表与日方签订投降协议。“密苏里号”上空飘扬着两面美国国旗，一面是日本偷袭珍珠港时悬挂在白宫上的国旗，另一面，是专门从马里兰州首府紧急空运来的，那上面只有三十一颗星。它正是当年佩里将军的旗舰“波瓦坦号”上悬挂过的国旗。难怪历史学家道尔[John W. Dower]说：“以佩里旧日的旗帜炫耀着对日本的惩

戒，这是当年的佩里哪怕是在最疯狂的梦境中也能想像不出的。”

国旗是个细节，它的意义颇有一点象征意味，既能令人回想起“黑船事件”，也能让我们思考历史的承接与延续的微妙关联。

1860年，卫三畏成为美国驻华公使馆〔北京〕临时代办，1876年退休。1877年返回美国，任耶鲁大学汉学教授，成为美国第一个教汉学的教授。

这是后话，也是故事的收场。



丙辑

贰拾壹

若生在明清，就只嫁张岱

贰拾贰

胡颂平的日记

贰拾叁

他们像传说一样过去了

贰拾肆

《格列佛游记》里的党争

贰拾伍

学《论语》，说孔子

贰拾陆

非常独立，非常沉默

贰拾柒

很后悔，没为他写一个字

贰拾捌

像冬天飘摇的芦苇

贰拾玖

他那支笔是怎么练的

叁拾

说知名品牌

叁拾壹

一生负气成今日 四海无人对夕阳

叁拾贰

陈姑娘，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

叁拾叁

端木露西：蔚蓝中的一点暗淡

叁拾肆

汉语拼音与威式注音

叁拾伍

好吃勤做

叁拾陆

只养仙人掌

叁拾柒

乡事偶拾

叁拾捌

他们更耐人寻味

若生在明清，就只嫁张岱

章诒和

做学生的时候，读过《陶庵梦忆》。那是作为戏曲文学理论专业参考书而读，像一味药，遵医嘱吞服罢了。今天重阅，那感受就不是“一味”，而是千滋百味了。

张岱活在明清交替之际，出生仕宦，衣食无忧，其经历和文字都值得玩味。四十岁以前，他在读书与享乐之间“摇滚”“摆荡”。王朝更迭，命运逆转，中年的他立志修史，携带着浩繁的明史手稿，辗转于江南山林庙宇。在困苦的物质条件下和痛苦的精神状态里，开始了另一种生活。历尽繁华，也阅尽苍凉。



南府《劝善金科·十殿》之二十一鬼卒。

他太会玩，也太会写。张岱自称：“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自为墓志铭》〕纨绔子弟的奢豪之举，有之；晚明名士文人的狂狷之性，有之。但是，你还不得不佩服这个张岱，经史子集，无不通晓；天文地理，靡不涉猎。所著除《自为墓志铭》中所列十五种之外，还有诗集、文集、杂剧、传奇等作品。其中《夜航船》一书，内容有如百科全书，包罗万象，共计二十大类，四千多条目。他的著述之丰，用力之勤，令你惊叹不已。这也使得他与一般纨绔、风流名士彻底区别开来。

事情的结局，常与本人的意愿相悖。张岱倾心于史，但并未以史书〔《石匱书》〕留名，倒是那些散文为其赢得盛誉。我爱读他的散文，生动，讲究，雅致，简约。祁彪佳不是说了嘛，别人用一二百字才能说完的事，到了张岱笔下，只需数十字辄尽情状。本事了得，这是什么功夫？即使用上电脑，我们也是望尘莫及。张岱的文章和他为人一样，有傲世刺世的锋芒，又有玩物玩世的谑癖。

张岱的记性极好。少时听来的事情、看到的景致，皆藏在心。长大后一一写出。他的精妙文章，为后人保留了多少前朝旧事和生活样态。记得有一篇文章叫《西湖七月半》，描述的是杭州人逢七月十五游湖赏月的情景。文章最有意思的地方，不在于写景，而在于说人。由于游客太多，美景是无法欣赏了，张岱索性就在一旁看起人来。他的主题就是

乾隆甲寅年雕版

陶庵夢憶



清乾隆版《陶庵夢憶》書影。

新編目連救母勸善戲文卷之上

新安高石山人鄭之珍編

開場 末

館甥葉宗泰校

畫堂春 宇宙茫茫、俊傑多苦。目名利奔波。光陰轉眼。太如梭。綠髮成皤。魏國山河安在。漢家事業如何。逢場作戲。且歡歌休。

恁驢陀 借問後房子弟 內云 裝扮了 末 且問今宵搬 內 搬演目

救母勸善戲文上中下 末 既如此我已知道且說上 連行孝

傳長者好善齊僧佈施 感上帝寶橋接引登天

劉安人開堂遣兒出太 傳羅卜婦家諫母團圓

那先來者傳 末 揖生上 請了大家齊肅靜另作眼兒觀 下



明刻本《目連救母勸善戲文》書影。

“看人”。文章写明五类“可看之人”。一类是峨冠盛筵的炫富者，一类是左右盼望的名娃闺秀，一类是浅斟低唱的名妓闲僧，一类是不衫不帻、噪呼嘈杂的醉汉等，张岱笔下那份儿超然、轻松且带着戏谑成分的美学趣味，实在不是我们学得来的。

上个世纪80年代，我随张庚先生去湖南祁阳县看目连戏的内部演出。这个被查禁几十年的剧目，以空前盛大的排场和无所不包的技艺再现于舞台的时候，我完全惊呆！单是“海氏悬梁”一折，自尽后的女子被吊在长竹竿的尾梢，在观众头上急速摆荡旋转的刹那，看客们面如鬼色。目连的母亲刘青提下地狱，游遍十八阎罗，一步一吟，押解的众小鬼甩出铁制飞杈向她的背后猛然刺去，我忙捂眼睛。越看越怕看，越怕越要看。全本目连戏从前要演八天七夜，整整一百块牌〔即一百折〕。1984年，由我供职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出面，把所有的艺人请出来，连七、八十岁老艺人都搬动了，勉强凑够四天三夜的演出。每晚散戏，顶着星月返回招待所，一路感慨，且夜不能寐，我不禁联想起以精细笔触描述目连戏演出盛况的张岱。

张岱能躬身自省，觉得自己的人生前后充满矛盾，活在“七个不可解”之中。如“以书生而践戎马之场，以将军而翻文章之府，如此则文武错矣”，不可解。“弱则唾面而肯自干，强则单骑而能赴敌，如此则宽猛背矣”，不可解。话虽如此，其实他这辈子在成败得失之间，从来是坦然又凛然。在要紧处，也从未动摇或矛盾过的。张岱还说自己无一

事不败，“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义不成，学文章不成，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偏偏，这个“一事无成”的张宗子，成了明清第一散文大家。他以书写的方式，确立了自己的人生终极价值。

有人这样形容：哪里人声鼎沸，锣鼓喧天，哪里肯定有张岱；曲终人散，风冷月残，有人吹出一缕悲箫，那听客肯定是张岱。

一个多么丰富、美好的男人。所以，我说：若生在明清，就只嫁张岱。

張岱的浮華與蒼涼

史景遷
溫洽溢 譯

[illegible]

研究设计

史景迁著 《前朝梦忆》 书影。

貳拾貳

胡颂平的日记

贺卫方

两年前的一天，我途经学校图书馆，忽然想起特藏部主任张红扬女士曾电话告诉我，胡颂平先生的家人已经将胡先生的日记全部赠送北大图书馆，若有兴趣，张女士希望我不妨来馆一看。我对胡适及其相关文献一直是大有兴趣，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于是就径直来到了特藏部。真巧，张主任正好在办公室。她没有介意我这种未约即来的冒昧，跟对于胡适文件颇有研究的周老师一起，陪同我观看了胡颂平日记以及胡适藏书。

在有关胡适研究的文献方面，胡颂平先生的贡献是世所公认的。他



胡颂平日记封面。

胡颂平日记里夹存着的照片和名片。



编辑了煌煌十卷本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给学术界提供了最翔实准确的资料。在此之前，年谱的编纂以丁文江、赵丰田的《梁启超年谱长编》最受推重，但胡颂平先生的胡适年谱长编初稿出版之后，“梁谱”就瞠乎其后了。无怪乎余英时先生兴奋地称颂，“这真可以说是中国年谱史上一项最伟大的工程了”。

除了年谱之外，胡颂平先生的另一贡献是编辑了《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该书出版于1984年，是作者利用担任胡适秘书的机会，把耳闻目睹的胡适谈话记录下来。日积月累，集腋成裘，成就了这本堪与艾克曼辑录整理的《歌德谈话录》相媲美的作品。书的后记里，作者说：

“这个谈话录所记的谈话，都是根据我当年的日记，所以绝大部分是对我个人说的。……我用的是袖珍日记簿，经常放在衣袋里，白天难得有空，总要到夜里回家默记的。一年下来，渐渐的记了六七本。”后来当然是更多了。毫无疑问，这些随听随记的谈话原始记录，不仅仅是我们了解胡适晚年思想的珍贵史料，按照毛子水的说法，也是有益于世道人心的极足珍贵的好读本。

当周老师把九十余册日记中的六册放到案子上时，自己还是有些惊讶，那是一种相当小的开本的册子[回来找了相同开本的书，发现应当是787×1092 mm的64开本]，像是60年代流行的语录的样式，塑料封面。里面是密密麻麻的小字，工整而秀气。自1958年12月给胡适做秘书开始，胡颂平就恢复了中断二十年的记日记的习惯，随日记录胡适的言行。翻着凝聚

了作者的勤勉劳作的这一册册日记，我不禁肃然起敬。日记里还夹存着一些纸条、照片等，纸片上也有对于某些事项的记录，或许是当日记本不在身边时，为了备忘专门记下的。自己很希望北大图书馆能够在征得颂平先生家人同意的前提下，将这些日记准确整理出来，公开出版。胡颂平编写晚年谈话录时，不少涉及到的人还都在世，取舍之间或有某些忌讳，现在该是完整出版的时候了。

看过日记，张主任、周老师又陪同我到书库参观胡适的藏书，这正是胡适1948年离开北平时留下的一百零二箱书籍文件的一部分。据周老师介绍，大致上珍稀书籍都被国家图书馆收留了，手稿文件等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其他中外文书籍都在这里了。满满当当六七个书架上的这些中外文书籍，涵盖领域极为广泛，体现了胡适宽阔的知识视野。很珍贵的是，其中不少书系原作者题赠本。我意外地发现了美国已故大法官弗兰克福特[1882-1965]的一本著作，翻开封面，就看到了作者的题赠字样。另外，不少书上还有胡适阅读后留下的批注，这对于研究胡适思想的价值也是自不待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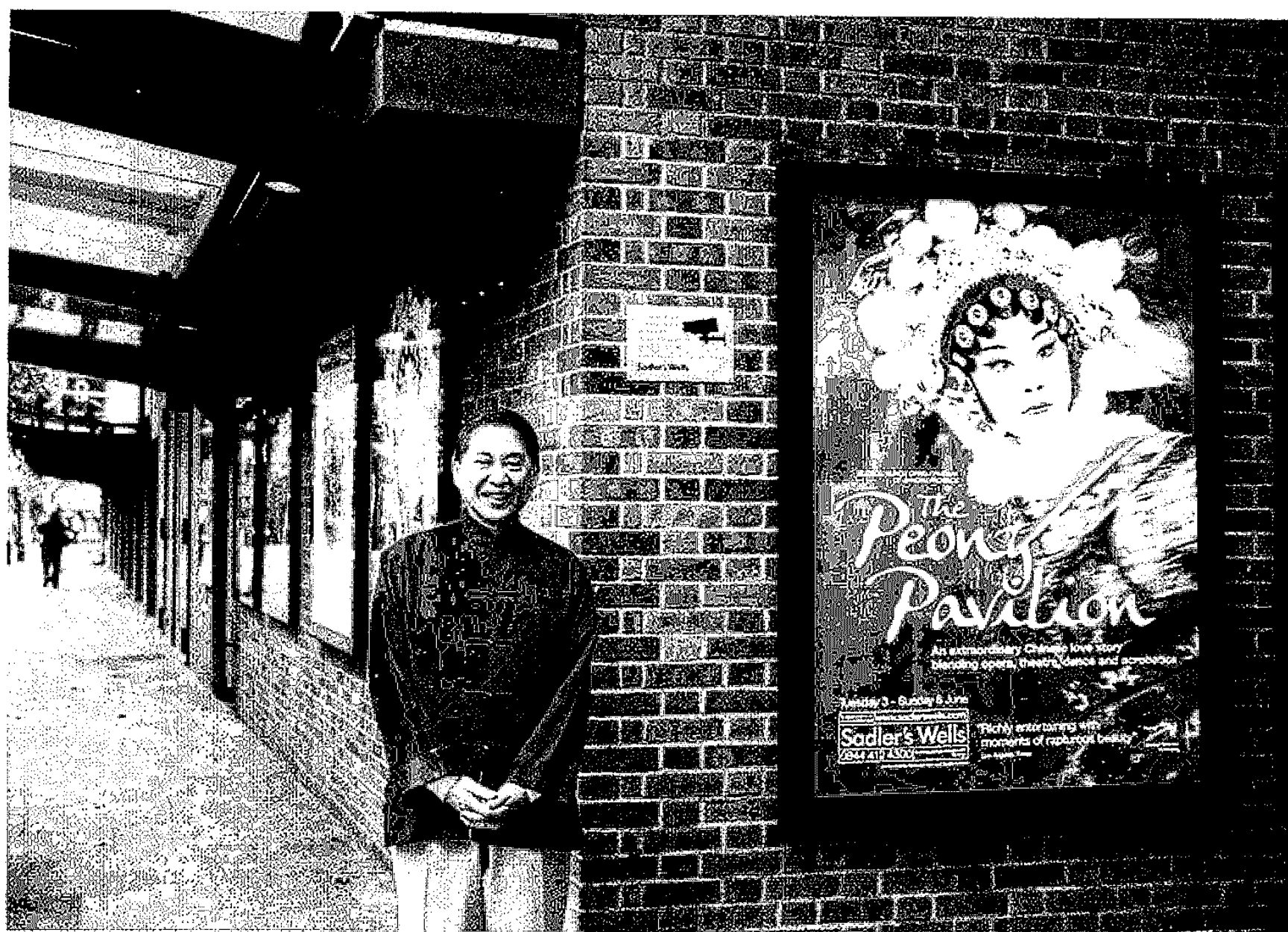
从作者1948年打包封存，到此后的秘不示人，这批书与我们已经睽违一个甲子了。如果北大图书馆能够早日设立专门的胡适纪念室，将它们陈列上架，并向本校师生以及一般读者开放，这对于北大、对于中国当代史研究、对于广大读者，真正是功德无量的好事情啊。

他们像传说一样过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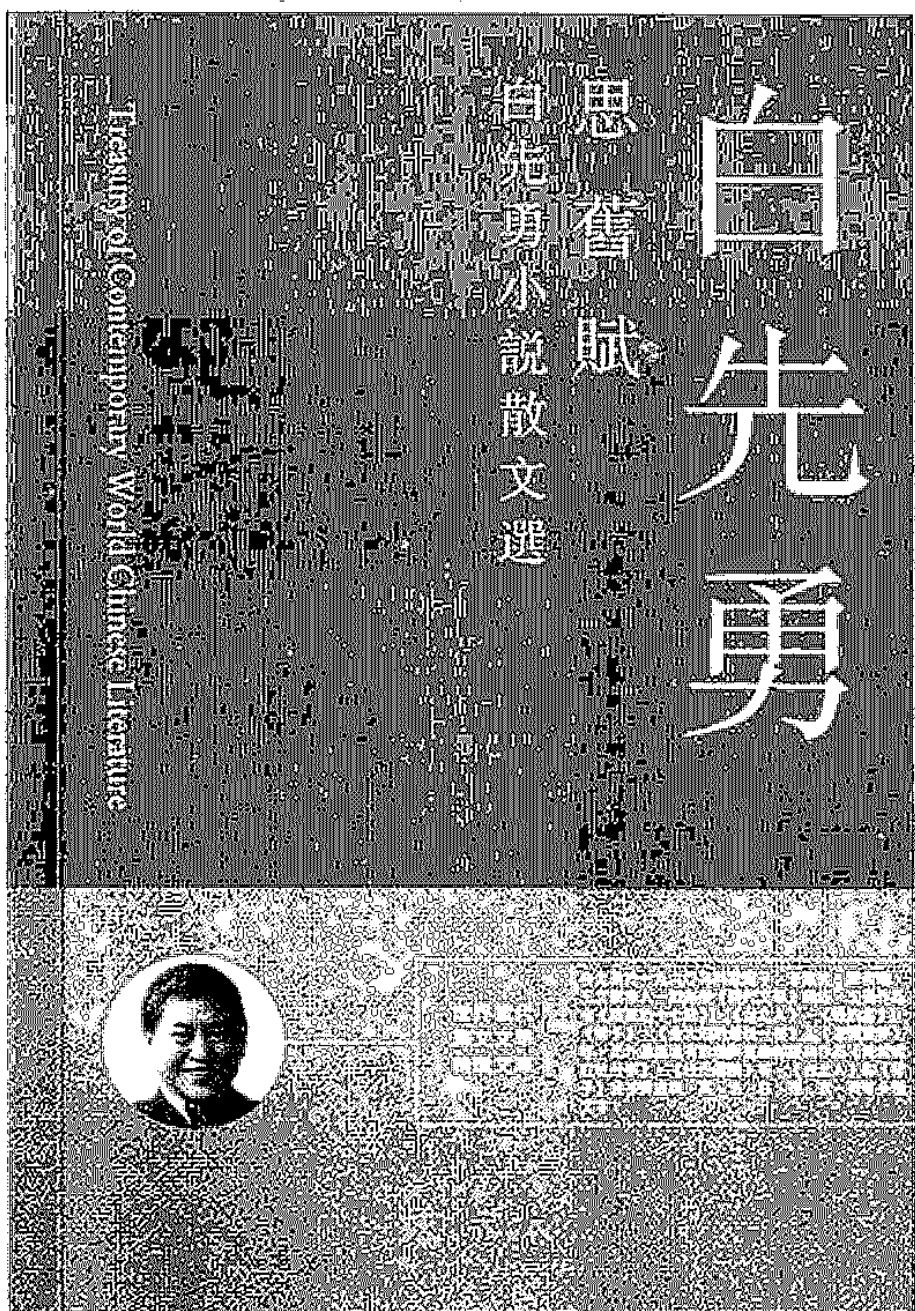
章诒和

香港《明报》月刊的潘耀明先生说，他与新加坡青年书局合作要出一套“世界当代华文文学精读书库”，五十集为一套。经过编委会讨论并投票，我忝列其内。要求作者于2009年6月前，交上自选的书稿。

我看那庞大且有盛誉的编委名单，顿时吓得半死：大陆前文化部部长，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世界华文媒体集团编辑委员会主席……我觉得单是出版编委的作品，就足够“文名遐迩海内外”，达到“丛书式‘全球化’覆盖”了。我算啥？一个写故事的老妇。



白先勇近照。〔许培鸿 摄〕



白先勇自选集《思旧赋》书影。

香港朋友颇能揣测人的心思。见我数月不回复，便把他们先期出版的白先勇作品集用特快专递寄来。我与先勇兄是世交。父亲与白崇禧将军在抗战时期的重庆以及1946年的宁沪两地，均有所往来。当然，两家子女并无联系。2005年年初，我和先勇兄在台北碰面，一见如故。俩人一致确认：即使初识也是世交啦！他带我去一位教授家做客，我一下子结识了十一位朋友，个个风度儒雅，外语、文学、绘画、书法、宗教、版本啥都懂。映衬之下，我成了俗人，一些话题还插不上嘴。大家说呀，笑呀，从白天闹到黑夜，足有六、七个钟头。回到“中央研究院”才发觉自己已是筋疲力尽。2007年春，我与先勇兄重逢在香港城市大学。他握着我的手，连声道：“向你致敬。”

此后，先勇兄拿出很大的精力投到青春版《牡丹亭》的排练与演出中。我应邀到北京大学礼堂观赏，戏到结尾处，先勇兄出场了，灰白头发，绛红衣衫，像个神仙从天外飘然飞来。剧场顿时沸腾，全场起立，所有的鼓掌，高喊，尖叫，都是送给他的。其魅力超过了年轻的柳梦梅和美丽的杜丽娘。对此，我的心情很有些复杂。快死的昆曲因他的个人魅力而重新抖擞，这值得庆幸。大概也只有他才具有这样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可以说是他一个人在支撑一个剧种，问题是这样的支撑能持续多久？

先勇兄一直在撰写父亲白崇禧将军的传记，大家都期待能早日看到。前不久，我读到其中的一些章节，万万想不到一个写《游园惊梦》

的人，能把战争场面既写得波澜壮阔，又分析得合情合理。董桥先生是最早读到的人，看后向我竖起大拇指，赞叹不已。昆曲是艺术，传记是文学，两件都是大事和难事，对先勇兄来说两边都同等重要和急迫。好在他是个奇才，善于平衡又游刃有余。我除了佩服，还能说什么！

白先勇的这本自选集，取名《思旧赋》。精的小说、美的散文，尽在其中。从《玉卿嫂》、《树犹如此》到《〈牡丹亭〉西游记》，人生的现实感和艺术的终极意义，无不融会于内，体现于外。

有他在前，我愿尾随其后。我把自选集取名《可萌绿，亦可枯黄》。文稿编好，又附短序。这序，让我憋了好几天。似乎所有的话，已经说完。最后，还是写了：

已是“坐六望七”的年龄，因多少有些厌倦衰老的生命旅程，而愈发珍视昔日之梦。不知怎么搞的，一切甜蜜的感受竟都与过去的事物相关，尽管我很清楚沉溺于往事是进入暮年的重要标志。

我写的储安平、康同璧、张伯驹、马连良、言慧珠等文人、艺人，仅仅是记忆

中〔包括所能搜集到的材料〕勾画出一个简单的轮廓。他们的丰富性，复杂性，深刻性，远远没有挖掘出来。今天的年青人阅读他们，有着面对遗迹一般的陌生，可观赏，可玩味，或许有人神往，获得一点昭示。但无论如何，眼下已经再难找到与之相近的气息。

他们像传说一样过去了。每一个都是夺目的，都是惨伤的。这是一种宿命，谁也无法藏匿或逃避。他们像瑰丽却肃杀的秋景，搅碎了人生如梦的愁肠。连我自己都没有重读的勇气，怕老泪涌出。

人们习惯地说：“泪尽，继之以血。”如果，血也尽了昵？

2009年7月7日于北京守愚斋

《格列佛游记》里的党争

贺卫方

《格列佛游记》又名《在世界几个边远国家的旅行》，表面看来似乎是一部少儿读物。作者构思奇特，作品色彩斑斓。孩子们喜欢，成年人也喜欢。主人公格列佛向读者讲述了在四次航海中的经历，而每次都要碰到极其独特的情况。全书分四卷。第一卷，他到了小人国；第二卷，他遭遇大人国；第三卷，他在飞岛国游历；第四卷，他到了慧骃国。情节自然是虚构的，但在虚构情节中我们可以看到英国现实社会的明显印迹。

让我颇感兴趣并产生联想的，是作者斯威夫特所描述的小人国里政



TRAVELS
INTO SEVERAL
Remote Nations
OF THE
WORLD.

IN FOUR PARTS.

By LEMUEL GULLIVER,
first a Surgeon, and then a CAPTAIN
of several SHIPS.

VOL. I.

LONDON:
Printed for BENJ. MORTON, at the Middle
Temple-Gate in Fleet-Street.
M, DCC, XXVI.

《格列佛游记》书影。





党纷争，以及该国与另一国家之间的战争。这位卓越的讽刺作家展现了他的无与伦比的想像力和冷嘲热讽的功力。例如，书中说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起因，是吃煮熟的鸡蛋究竟应该从哪一头打破。在一个叫做利立普特的小人国里，两党激烈的争议居然来自对于鞋跟高度的选择。站在格列佛的手掌上，内务大臣描述了他的国家政党斗争的新动态：

七十多个月来，国内两个政党一直相互争斗。一个党叫特雷姆克森，另一个党叫斯莱姆克森。区别就在于，一个党的鞋跟高，一个党的鞋跟低。事实上，据说高跟党更合古法，而国王却决意一切政府管理部门只起用低跟党人。你不可能不觉察，国王的鞋跟就特别来得低，至少比朝廷中的其他官员低一都尔〔约合十四分之一英寸〕。这两个政党的积怨非常深，他们从来不在一起吃喝谈话。我们估算，特雷姆克森即高跟党在人数上胜过我们，可政权在我们一边。我们担心的是，国王陛下的继承人王子殿下有点儿倾向高跟党，至少我们发现他的鞋跟一个高一个低，所以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白马译，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页28〕

以鞋跟高低区分两党，实在是奇妙之想。它让孩子们看得兴致勃勃，而大人们则明白所谓的高跟鞋是暗指辉格党，低跟鞋代表的是托利党。不过，我以为这种情节的设置也许还能反映折出斯威夫特的政党观念，或者是他对于英国当时政党纷争的挖苦。从另一个角度看，假如不同政党之间的冲突来自如此琐碎的习俗，也许会将国民的注意力吸引到既有冲突却又不至于导致分裂的那些事项上，而降低那些本来让人不共戴天的事项的重要性，最终将不同阶级和族群整合为一个共同体。

在现代典型的两党政治国家里，政党打破了族群之间的界限，二者所争者，不外乎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税收以及社会福利政策、堕胎与安乐死以及是否容许同性婚姻之类。两党之间唇枪舌剑、面红耳赤，读者看得如醉如痴，大呼过瘾。不过，我仔细想来，这种以社会政策为划分界限的政党政治成功地淡化了血缘、阶级、宗教信仰等因素在政治生活中的意义，增强了人们对于超越族群之上的国家的认同，也许可以说正是政治文明进入一个更高层次的标志。

因此，现代党争的基础要在两个方面有所突破，一是走出那种部落血缘政治的初民社会轨道，用日常化甚至看似琐碎的事项去划分政党；另一个，与前者相关联，任何政党都要承认它不是神圣的，不是所有真理的垄断者，否则，其他政党就没有存在的任何空间，政治就不好玩也没法玩了。

斯威夫特是个神学博士，后做过教士、牧师和副主教。想不到他留给我们的是伟大的文学创作，是一种把幻想与现实勾连在一起、把叙事和讽刺结合在一起的能力与智慧。

学《论语》，说孔子

章
诒
和

从前，家里有好几种版本的《论语》，但德文版的《论语》，我还是从小贺拍摄的图片里第一次见到。至今也没来得及问他：书从哪里来？

1957年前，我不曾读《论语》，也不感兴趣。1957年夏季，报纸上登出父亲的言论。其中有这样一句：“还是半部《论语》治天下。”

大人们都说：“这话的性质太严重了！”既然那么严重，那我就有必要把《论语》找来看看。我就读的北师大女附中有教学实验性质，普通学校只有“语文”课，而我们是将“语文”分为“文学”和“汉

論語注疏卷一

魏何晏集解

唐陸德明音義

宋邢昺疏

學而第一

首義

以學爲首者。明人必須學也。凡十六章。

疏

正義曰。自此至堯曰。是魯

論語二十篇之名及第次也。當弟子論撰之時。以論語爲此書之大名。學而以下。爲當篇之小目。其篇中所載。各記舊聞。意及則言。不爲義例。或亦以類相從。此篇論君子孝弟。仁人忠信。道國之法。主友之規。聞政在乎行德。由禮貴於用和。無求安飽。以好學。能自切磋而樂道。皆人行之大者。故爲諸篇之先。旣以學爲章首。遂以名篇。言人必須學也。爲政以下。諸篇所次。先儒不無意焉。當篇各言其指。此不煩說。第順次也。一。數之始也。言此篇於次當一也。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注

馬曰。子者。男子之通稱。

謂孔子也。王曰。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之。誦習以時。學無

乾隆四年校刊

语”两门课程。万不想秋季开学，“文学”里的第一课，就是《论语》选读：“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忙不迭收拾书包，登上自行车跑回家。

一头撞进父亲的书房，大叫：“爸爸，我读《论语》啦！新发的课本里有《论语》，那他们为什么批判你讲的‘半部《论语》治天下’？”

父亲大悦，夸我会想问题。此后，读《论语》成为我的功课，成为父亲的快乐。诵读《论语》，父亲很少讲解，他的观点是古文读多了，自然就懂了。后来的一切也证明，这个不求甚解的主张，多少有些道理的，因为文字压根儿就是潜移默化的东西。

1957年后，跟着父母一起经历曲折坎坷，我渐渐体会到一本《论语》，无非是教导我们如何做人罢了。你觉得它浅，它就浅，浅如“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你认为它深，它便深，深似“朝闻道，夕死可矣”。于是，我也就深一脚、浅一脚地看下去。《论语》学来是给自己用的。年龄不同，阅历不同，学识不同，对它的理解自也不同。所以，也无须在电视讲坛里给大家找个指导老师。那老师像个水龙头，只要一拧开，《论语》就成了自来水——哗哗地汹涌而下，流呀，流呀，止都止不住。挺好，也挺吓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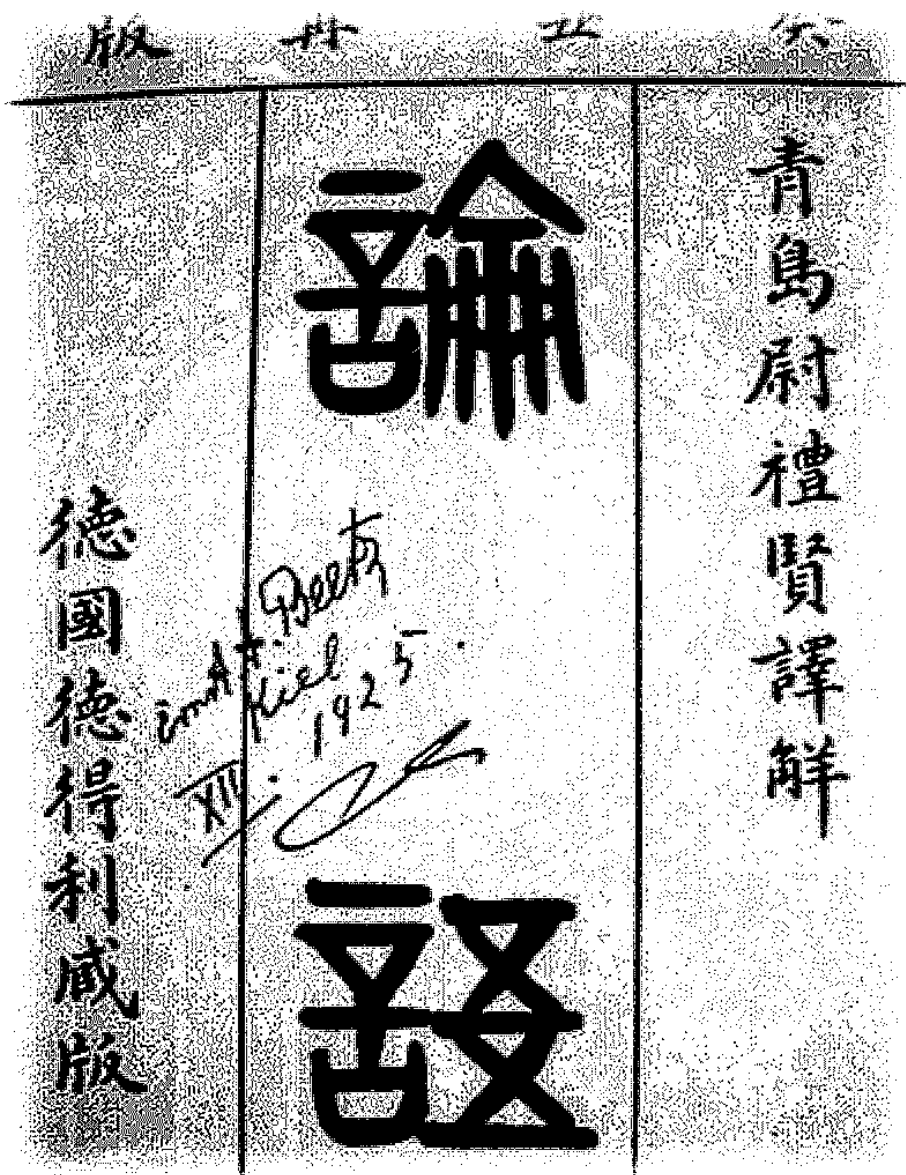
《论语》里的一些经典格言，我是会背的，也仅仅是会背。事情的变化，发生在劳改队。我发配到荒野，站在山之巅，我们这些女犯的劳动任务是把半人多高的荆棘、茅草，统统斩尽砍光。劳改农场设在阴湿

高寒地区，出太阳，即为烈日，不出太阳则是阴雨浓雾，哪里去寻人间四月芳菲天？我第一次上阵，就遇到雨夹雪。不停地挥动砍刀。不到一个时辰，我的两个手心、手背和胳膊，布满近百条刀痕与血痕——它们是荆棘扎的，草的锋利边缘划的。真的不明白，看着挺柔软的草木，怎么都成为对付我的利器？我偷偷地哭，不敢出声，泪水搅和雨水一起从面颊滚落。人湿透，心湿透。我双手合拢，仰望上苍，恳求天堂的父亲保佑我，不致倒下。绝对不能倒下啊，不能病，不能死，不能疯，否则，将无以自拔，也永无出头之日了。

我拿什么来拯救自己？惟有父母的身影和教导。这时，和父亲一起读的《论语》里的许多话：“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以及孟子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都自然而然浮显出来。每个字都那么铿锵有力，好像都是针对我在讲。它们激励着我的意志，也温暖着我的心。当然，勇气并非全部来自书本，但书本里的道理和精神，如果真的接受了，进入了心灵，那就可以转化为勇气。再说，生活就是这样，把你逼到死角，自然就坚强了。悲伤到极点，命运就会对你微笑。

我至今认为，无论是律己还是待人，孔子制定的标准都太高，这个标准在现实世界几乎难以存立，但它又确实在教育我们去完成这个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孔子长眠之地，在孔庙附近。现在已是旅游胜地，有很多人去拜谒，祭奠，寻踪。我虽不曾去过，但坟茔下的哲人，一直鼓舞着像我这样深感疲惫的独行者和普通人。



这是贺卫方在波恩一家旧书店里买到的德文版《论语》。扉页上译者是尉礼贤，即后来以“卫理贤”而广为人知的那位著名汉学家。名前属有地名青岛，但却不是他的祖国德国或家乡斯图加特。“癸丑再版”，为1914年初第二版。

我们这一代人与孔子初次相遇的情景有些吊诡。

1966年，“文革”开始，我上小学。那时的语文课本里，所谓“封资修”的货色都祛除殆尽，内容多为主席语录、诗词以及像《高玉宝》那样的文学作品。连算术、几何也要突出政治。例如一本教材里这样解释“等腰三角形”：“南京长江大桥钢梁结构中的三角架，可以发现这些三角形都是等腰三角形。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等腰三角形是特殊的三角形，它有些什么特殊的性质呢？……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特殊性中存在着普遍性，在个性中存在着共性。’由等腰三角形的性质，我们可以得到轴对称图形的一般性质……”

大约是在1974年，这种“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情况突然改变——一场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拉开了大幕。我们这些远在穷乡僻壤的中学生根本闹不清领袖为什么会忽发奇想，把孔子和林彪挂在一起批斗，只是鹦鹉学舌地跟着喊而已。因为要批孔，就不能不了解一点孔子的言行。从当时编印的一些批判材料里，我们知道了孔子如何克己复礼、拉历史倒车，如何杀死新兴地主阶级革新派少正卯〔还有同学读别字，把这位法家先驱的大名说成“少正卵”〕，奴隶起义领袖柳下跖如何痛骂孔

老二，革命群众怎样群起而攻之，让孔子变成丧家之犬的……一时间，孔子彻底等同于妖魔鬼怪。虽然时间已经过了三十多年，但是这场运动所造成的影响仍然依稀可辨，就像曲阜“三孔”里被砸断的石碑，复原之后，裂缝斑斑难掩。

后来上大学，读研究生，专业是法学，研究生时期则学西方法律史。不过，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于本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经典不甚了了怎么也说不过去。于是就细读了《论语》，孔子脸上的妖魔化油彩就逐渐褪去，恢复了一种正常的肤色。

当然，孔子的学说毕竟复杂得很，不同的人读出来的一定是有差异的。不带偏见地阅读，我们的确感到孔子信而好古，对于正在消失的那种秩序充满着怀念。他倡导一种非功利的学问态度，反对“为人”之学。他笃信道德教化的力量，在治理国家的事业里，法律只具有一种补充性的功效。他对于超越经验世界之外的事物兴味索然，敬鬼神而远之。他重视正名，因而喜欢讨论语言问题，特别留意交流的沟通性，说：“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他对写作的要求是文与质之间的平衡，即文质彬彬的境界。作为历史上第一个“民办教师”，他坚持“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本意是通过教育提升下层阶级之知识程度而晋身贵族阶层，但客观上却打破了当时尚属严格的阶级壁垒。他既讲求与身份相适应的待遇，却又赞美“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的简朴生活。他对于弟子曾点的人生理想大为赞赏，那理想居然如此低调而富于诗意：“莫春者，春服

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从一个法律学者的角度看，孔子学说里隐藏着一些排斥法治的因素和特色。除了前述德治理想外，“君子不器”引领了一种轻视具体制度建设的普遍心态，高调的理想可以让少数人达致“内圣”，却无法令整个社会的实现“外王”；“必使无讼”预示着法律价值的自我消解；

“君子之德风”意味着政教合一，政治管理的过程同时也是教民化众的过程，于是赋予权力天然的道德优势。另外，读《论语》时，我发现孔子多次表达对于木讷少言的赞赏：“多闻阙疑，慎言寡尤”，“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刚毅木讷近仁”。相对的，他对辩才无碍的人评价都不大好：对“巧言令色”者的指责全书凡五六见；“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诛杀少正卯这件事，无论如何，是开启了以言治罪的先例的。而且后世中国公共生活中没有演说和辩论传统；衙门之上，看不到律师身影，听不到雄辩滔滔，判决书不讲严密的推理，都跟儒家尤其是孔子的这种偏好有某种关联。

圣贤大儒高言动人，社会治理一塌糊涂，这就是我们这个老大帝国一直走不出的一个困境。其实，在“先贤祠”里有着显赫牌位的朱熹早在八百多年前就坦率地承认：“千五百年之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

奉行儒教时尚且如此，那连儒家都要加以贬斥的时代，情势之可悲可叹，伊于胡底，就更不想可知了。

贰拾陆

非常独立，非常沉默

章诒和

小贺所摄图片里有不少是树，且为一树一景。只要是树，我就喜欢。并非是他拍摄得有多好，实在是因为树的本身。我每天去附近的公园散步，也为锻炼，也为看树：苍松、翠柏、悬铃木。

2009年1月2日，台湾《联合报》副刊登出了一篇对我的采访文章。题目是“章诒和用笔勾住魂魄”。记者是个大学生模样的女孩子，可爱，也敬业。啥都问，你越回避的事，她问得越起劲。她说要到章伯钧曾经住过的东吉祥胡同看看。我不让她去，她偏去！不但去了，还拍了照片！不但拍了照片，还登了出来！不但登了出来，还做了手脚！把我

坐在星巴克咖啡店的照片背景切换成章宅的灰墙红门。这下，我成了一只看家狗，蹲在了胡同口。

女孩提出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有来世，你想做什么？”

我毫不犹豫地告诉她：“做人太苦，我不想做人，想做一棵树。”

“树？”



“是。”

“为什么要树？”

我说：“你看那些树，非常独立，非常沉默。一半在土里安详，一半在空中张扬。一半沐浴日月，一半洒落阴凉。”这是别人说的，我很欣赏，记住了。

此后不久，去了英国，我又想做苏格兰的黑头羊了。来世做什么都行，就是不做人。

左图：槐花香满树，汉王墓前孤。2009年4月26日摄于河南芒砀山汉梁王墓前。

貳拾柒

很后悔，没为他写一个字

章诒和

2006年秋天，台湾时报的朋友带给我一本书，书名叫《宫前町九十番地》，很别致。作者叫张超英，很生疏。

我问：“好看吗？”

答：“非常好看。”

把书带回家放置了一段时间，才从书柜里取出。本打算翻翻，瞟几眼，不想拿起就看了个通宵。

地番九十町前宮

張超英 口述 陳柔縉 執筆



一個台北富家少爺的流金歲月 時代風華盡在其中

時報出版

在頂峰時離職，那年他五十二歲。如綻放之花，悄然離去。

四手聯彈 一 丙輯

197

这是一本回忆录，李昂认为：是一本比小说还要精彩的回忆录。看后，我觉得这个评价一点不过分。全书找不到多少华丽辞藻，它的精彩靠的不是文采。全书找不到什么离奇情节，它的精彩也不靠结构编排。我觉得，全书的精彩之处来自张超英本人——一个非常独特的角色。

张超英出身富豪之家，现在的人们知道台湾的富翁王永庆。其实，他的祖父〔张聪明〕在20世纪之初，就是大名鼎鼎的实业家。在日据时期，他以经济支援的方式致力于反日运动。二战后，蒋介石败退下来，情报头子毛人凤的落脚地就是张家。张超英是个独苗，生在日本，求学香港，还住过上海，接受了非常完善的教育。其父张月澄是台湾精英分子，“二二八”惨案被判处死刑。张家花了大钱，虽把人救出，但从此梦碎，心也碎。张超英本人亲历豪华排场，也目睹都市穷人冻死街头的惨景。十三岁那年，在家中与当时的首富林熊徵吃午饭，每人一碗切仔面。不想，第二天，传出林老板去世的消息。骤然巨变，对这个“含着金汤匙长大”的青年，产生了终身的影响。“生命竟能像点火柴一样，才刚划过燃烧，瞬间就火灭人寂。”他感到人生的无常，钱财的虚无。于是，这个多愁善感的青年，开始思考生活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张超英靠自己的能力进入台湾新闻处，做了三十一年公务员，却始终没有参加国民党，也拒绝当什么“眼线”。在工作中，力图以超然的

态度对待周围发生的一切事物。无论谁当政，张超英一心所想的是台湾人的庄严和地位。有人骂他是“汉奸”，又有人骂他是“台奸”，他都一笑了之。没有修养和信念的人，是根本做不到的。张超英晚年口述的这本回忆录〔执笔者陈柔缙用了十二年的时间完成〕，与政坛人物撰写的东西有极大的差异。后者不是往自己脸上贴金，就是惦记如何把这辈子干的事说得周周正正，起码能自圆其说。张超英则不同了，由于推崇自由、独立人格并身体力行，所以他讲述往事的时候，能淡化意识形态色彩，摆脱官方样式和国家框架，也不计较现实的利害，像说家常一样娓娓道来，像大雁盘旋天空一样，随意自在。而一些很有见地的话，都是亲历后的独立判断，读来既有亲切感又具说服力。比如，他说：“在蒋介石活着的时期，整个社会都神经兮兮地反共。海外和台湾的知识分子，不论主张台独或亲共，基本上都是被国民党的专权腐败逼出来的思想出路。”这就属于真知灼见，不经过思考是讲不出来的。所以，他关心的不是哪个党执政利益，觉得自己是台湾人，要尽可能为台湾做点事，而不是为国民党或其他哪个党卖命。总之，张超英在自己搭建的舞台上，尽情表演，一切都是活灵活现的！事情像老故事，人物如老相识。

这里，我举他笔下的宋楚瑜来说明这书是如何地有趣。1978年，张超英回台述职，第一次见到宋，当时他三十五岁，任新闻局副局长。张超英发现这位副局长讲话扼要清楚，没有废话。谈起新闻局业务，有

种“闻一知十的感觉，和他谈话很轻松”。蒋经国要宋楚瑜多到日本看看，好好学学。宋几次赴日，每去一地都认真听取解说，通过观察提问题，令人印象深刻。“而一般大官考察不外哼哼哈哈，抱着到此一游的随便心情，急着赶赴旅馆，坐下来吃一顿大餐而已。”一次，宋一行数人抵达仙台。进了宋楚瑜下榻的房间，大家吓得瞠目结舌，其豪华让人产生是总统房间的错觉，大小共三间，还有一间密室，是用来藏姨太太的。宋楚瑜一看，就急了，问：“超英，到底多少钱？”宋是工作狂，晚上回到旅馆也是9点多。但他还是要找张超英聊天或看材料，以致于李登辉很吃惊地问宋：“你怎么懂日本这么多？”张超英最得意的一笔，就是通过私人渠道安排了日本内阁首相中曾根康弘与宋楚瑜的私人会晤。虽是在高尔夫球场的“巧遇”，谈话也不足半个小时，内容也与政治无关，但在那个非常特殊的年月，却是要冒极大风险。当时，日本首相毫不知情，完全是依照幕后导演张超英一节一拍地“表演”下去。诸如此类的细节，书中比比皆是。我常想，要等什么时候，我们的官员写回忆录不再板起面孔，也能像《宫前町九十番地》那样好看，有趣呢！

日本的樱花最美，盛开时节，春风一吹，便散落如雨。张超英在顶峰时离职，那年他五十二岁。如绽放之花，悄然离去。

台湾时报的朋友知道我很喜欢这本书，便建议我写一篇书评，我未置可否，总觉得对张超英的了解太少，也肤浅。

后来，他患癌症去世，我很后悔，没给他写一个字。

像冬天飘摇的芦苇

章诒和

从第一次看戏曲舞台演出，就知道有个角色行当叫龙套。四人一堂，穿着一样的“龙套衣”，或举旗或拿枪，跟着主角转来转去、跑上跑下的。他们不是乱转瞎跑，是要按着事先规定好的动作和位置，跑出队形，跑出气氛来。男的龙套，一般扮演的是士卒、衙役。女的龙套，多半是宫女丫鬟〔俗称宫娥彩女〕，即后妃、命妇所带的女侍从。我特别喜欢京剧《贵妃醉酒》的众宫女，个个收拾得就跟小贵妃似的，漂亮死了。对司空见惯的事物，我们也就习以为常。谁都不会细想那些宫女，到底是什么样的？



《宫女谈往录》书影。

最近在同事的书柜里见到上下两册的《宫女谈往录》〔金易、沈义羚著，紫禁城出版社〕，随手翻来，不想越翻兴致越浓，索性借回家看。作者是一对夫妻，毕业于1949年前的老北大。他们与一个清朝末代宫女住得很近，渐渐熟了，成为朋友。晚上，口袋里揣上两包高碎〔茶叶末〕和一兜半空〔瘪花生〕到老人家里，请她讲清宫轶事。老人姓何，宫里叫“荣儿”。她讲话尽管总说“谈起过去的事，惹人伤心”，但是她断断续续地还是说了不少。宫女离世后，夫妻本着“求真”的原则写了出来。文中有史，亦文亦史。书中，我们看到的是比较真实的中国宫廷女奴的生活场景。用无数细节刻画慈禧本人及其晚景，也真是入木三分。“一壑一丘，皆成小致。”它为我们呈现的不过是封建宫廷生活的一角，仅此一角，就足以让我们震惊和思考。《谈往录》所具有的真实、透析和细微，我们现在的史学家、政论家未必能及。作者运用散文笔法，语言流畅自如。平静的叙事，如云如絮，有着冲淡幽深的气氛。

全书可分为宫女生活、慈禧起居、光绪佚事等几部分。我最感兴趣的，不是老佛爷和可怜的光绪帝，是那些更为可怜的宫女，是那些生动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琐事。举几个例子来说。刚进去的宫女中流行着一句话，叫：“老太后好伺候，姑姑不好伺候。”姑姑就是管理她们的老宫女。姑姑权力非常大，可打，可骂，觉得你没出息，可打发你去当杂役；火气也非常大，动不动拿她们出气。常常是不说明原因，就先打先骂。荣姑娘说，不怕打骂，疼一阵过去了。就怕罚跪，墙角一跪，不知道要跪到什么时候。遇到这情况，就常哀求：“好姑姑，请你打我

吧。”姑姑所有的事，都由她们侍候：洗脸，梳头，洗脚，洗身子，一天用十几桶热水。日常针线活儿就更别提了。姑姑都是好漂亮、讲模样的人，处处争强斗胜。衣服鞋袜，成天价地拆、改、做。像荣姑娘这样的年轻宫女，天刚一亮就起来，深夜才睡，侍候太后侍候姑姑——原来奴才的劳动不止是“奉献”给主子，也“奉献”给她们的同类，而所受的痛苦，也不全部来自主子，也来自于同类。

荣姑娘聪明麻利，有幸给慈禧“敬烟”。老佛爷抽的是水烟，她每天用手捏着被点燃的一小撮蒲绒，手指头都烧焦了，即使烫死也不能出声，更不能掉下火星来。宫女要轮流给慈禧“值夜”。在储秀宫西偏殿的一角，铺块厚毡垫子，你可以半靠半躺在那里呆上一夜，像只看门狗。荣姑娘后来有幸“侍寝”，那就更辛苦了。没毡垫子，只能靠西墙，坐在地上，离老太后二尺远近，面对卧室门，用耳朵听着：老太后睡觉安稳不？睡得香甜不？出气匀不？夜里口里燥不？起几次夜？喝几次水？翻几次身？夜里醒几次？咳嗽不？早晨几点醒？都要记在心里。说不定内务府或太医院的人要询问。

一次，作者这样说：“您挑选最快乐的事谈谈，让我听着也高兴。”

荣姑娘沉思一会儿说：“我们是奴才，没黑夜没白天地给别人支使着，别人快乐我们陪着快乐，别人笑我们去陪着笑，别人不高兴，倒霉

的又是我们。我们只有眼泪往肚子里掉，哪里能有高兴的事呢？宫里头无论上上下下全是假的，像一台戏。谁唱得好，得宠；谁唱得不好，受气挨打。此外，整天拿膝盖骨当脚用，不是磕头就是请安，天天如此，年年如此，我们又有什么高兴的事啊！”读到这里，真是辛酸！

谈到吃，这大概要算荣姑娘最得意的话题了。比如早饭，她说：“早晨，我们也吃粥，花样非常多。有时是稻米粥，叫蚊子心米，细长的粒，两头尖；有时是蚌珠米，圆圆的粒，亮晶晶的，发粘；有时吃红稻米粥，据说是温泉的水养的，熬出来的粥，红红的，像高粱米粥色。也吃小米粥，也吃细玉米面粥，冬天也吃薏仁米粥，扁扁的粒，据说是保养人的。吃干的东西，花样更多了。有杂样馒头，这个，我们看也不看一眼。年轻的人，都找香的，酥的吃。香油酥圈、马蹄烧饼、麻酱烧饼、炸三角、肉末等。有时也有清真的，炸卷果、炸馓子，更好的是有时有素菜，香菇面筋、腊羊肉、酥虾等等。总之，宫里做饭的师傅们，是不会亏待我们的。要知道，我们摸黑起来，等待候老太后上朝以后，才许我们吃饭呢，已经饿得前心贴后腔了。”

荣姑娘终于老了，按旗人规矩，趁着自己还能走动，要尽可能地向亲友告别，这叫“辞路”。金易夫妇也以礼相待。买了一只鸡，一斤羊肝和“一窝丝”面，略备小菜，请她吃鸡丝汤面、涮羊肝，祝她吉祥长寿。第二天清晨，大家凄然告别。问地址，她说自己也不清楚。其实，不问也清楚，在给主子奉献终生之后，不就该等死了吗？远离人群，独

自迈向坟墓。活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她怎样地活，死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她怎样地死。十八岁那年，由慈禧指婚，赐给一个姓刘的太监。荣姑娘会安葬在丈夫的旁边。

2009年的10月，北京最美的季节。在秋风残照下，大修后的紫禁城金碧辉煌。金碧辉煌的背面是什么？无数的荣姑娘可以告诉你。那些正史不收、野史亦无所志的旧事，无足轻重，零星散碎，像冬天飘摇的芦苇。而它们恰恰是活的史料，真的历史。

世上许多事，除非亲自体验，是无法想像的。

贰拾玖

他那支笔是怎么练的

章诒和

一到东京，就认识了李长声，那是2008年的春季。我们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聊，很快成为朋友，似乎是认识很久的朋友。你问日本的历史，他能告诉你；你问日本的风习，他能回答你；你问日本的文学，他能说出个子午卯酉来；连点鸡毛蒜皮的问题，也能给你个完满答案。单这个本事，我就佩服得不行。用父辈的老话形容，叫“日本通”，今天则称之为“知日派”。

去东京的浅草寺，离庙门尚远，已然人流如织，熙熙攘攘。很败兴！看看旁边的李长声，走得精神抖擞，讲话兴致勃勃。我不禁问道：



“你陪国内的朋友来过多少次了？”

他淡淡一句：“无数次。”

在贩售纪念品的商店里，我拿起一个铜制菊花工艺品摆弄。他双手接过来，自言自语道：“菊花，皇家纹章，十六瓣……”

听了，顿生感动：他的自语，实则为我。既让我知道这非同小可的日本菊，也意在保全“章大姐”的体面。

我们一起到日本现代美术馆，参观“纪念东山魁夷百年诞辰画展”。观后出来，早过了午餐时间，又渴又饿。路上，碰到一家纸店，我兴致陡起，不管不顾地一头钻进去。东挑西拣，搞了半日。李长声默默陪我，静静等我。出得商店，我突然想起：他有糖尿病，是需要及时进食的。

返京的日子到了，李长声开着漂亮的雷克萨斯送我去机场。分手时真有些舍不得，希望他的话匣子老开着。由于带的书太多，超重了！日本小姐二话不说，随手在一张A4复印纸画了几笔，举到我的眼前。一看：“17000！”心想，这肯定是“罚金”了。回到北京，用伊妹儿告诉李长声。他在邮件里回复道：“不贵，大姐，一切都值得。”



東京灣閑話

李長聲 作

《东京湾闲话》。李长声作品书影。

以细节识人，大抵无误。从此，“长声兄！”我叫得爽爽的。

李长声待人好，书也写得好。笔下，颇有苦雨斋的派头和味道。一副闲适冲淡的神态，寥寥几笔却言之有物，清爽简约的文字是极其考究的。写春色，如嫩竹；话秋色，似晨霜。举个例子吧，那么多的人描写日本樱花，说它如何之美丽，怎样地清雅。不承想我们的长声兄将它比做泼妇，“哗地”开了，又“哗地”落了，神了！

李长声所写，涉及范围极广。像个万花筒，拿起轻轻一摇，就是一幅日本社会图景。五色缤纷的，煞是好看。而他所写，又无一不是日本现实中的人，事，物，景，结结实实的。笔触始终落在“实”的社会生活的层面上，这使得他的文章有着非常执着和强悍的内容。不像某些东渡客，给我们送来洋洋洒洒的日本观感和色彩极佳的图片，看着总不免轻飘浮荡。依我浅见：再宏伟的叙事、再华丽的文采，“文学”的大厦都需要一个“实”字碑做基石。李长声的作品很实在，不易被时间和时尚淘洗，即使再短的小文，你也会有所得。是啊，文学比战场更惨烈——被剽窃，被查禁，被金钱收买，被政治打压以及整体“边缘化”。但是，并非所有的春花，惟有到了秋日，才能确认它的存在。

现实生活中的人，事，物，景，牵引出李长声的喜怒哀乐。这些具体又真挚的感情以一种洒脱的态度，将文思推入到“性灵”的层面。文坛上常说的“独抒性灵”，简单说来，不就是指作者能对“人”有所认

识，且不断深入吗？换言之，也就是作家能以个体生命去体验人类生存途中所共有基本状态，包括各种心绪、心理。李长声善于思考，文笔上佳，许多人还记得他在上个世纪80年代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好文章。我想，坚持真实的、自由的“个性”笔墨，当是他成功的奥秘。

李长声另一特点是在“实”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长期观察与潜心思考，融入相关的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民俗的、心理的、地理的各种因素，彼此交叉、演化、渗透，合力推进，最终完成一个文学主题。日本艺伎是令人感兴趣的话题，也多少与我的专业相关。对这个延绵数百年的事物，李长声写得纵横驰骋，自与别人不同，从艺伎历史渊源、名称演变到职业规范，仔细道来，并澄清了国人的许多误解。他在《风来坊闲话》一书里，告诉我们：艺伎集中住地叫“花街”，又称“花柳巷”。但花街不是娼妓馆，艺伎卖艺不卖身，“以歌舞弹唱为能事。客人谈事则默然斟酒，客人取乐就陪着谈笑游戏。”她们的服务“现在以两小时算账，而在江户时代则以燃尽一根香计算时间”。李长声又说，艺伎从少女时受训，“像日本庭园一样，看似自然，其实是极尽人工。”连她们穿怎样的木屐，哪只手提和服的下摆等琐细之处，均有所交代。其专业化程度，不亚于戏曲服饰、穿戴制度研究。李长声非但有很好的社会洞察力，且视线广泛。他能从艺伎与政治家、文学家的往来关系方面，开掘出更深的文化内涵。前者有伊藤博文、田中角荣、小泉纯一郎。后者如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渡边淳一。政治家包养艺伎的传统风习，使艺伎日后有了写作的本钱；而文学家则用生花妙笔，将

她们写成了国色。难怪李长声叹道：大和魂实质不是好战，是好色。

笔走到此，准备“收官”，不想台湾远流出版公司给我寄来他的新作《东京湾闲话》。翻开目录，立即看到“搞笑艺伎”的篇目。花街女子是日本历史的一抹余晖，它既是人们乐此不疲的谈资，也是作家反复咀嚼的素材。但像李长声写得如此出色，毕竟不多。

李长声写饮酒，写捕鲸，写街景，写书店，写浮世绘，写辞世歌，也是精彩、精致又精辟。叙事，娓娓动听；状物，不厌其烦；写人，道地白描功夫。不明白了：他那支笔是怎么练的？

平淡琐细之中有真知灼见，酣畅淋漓之中见深厚质朴——没有岁月的洗礼，没有生活的磨砺，这个文学境界是达不到的。



李長聲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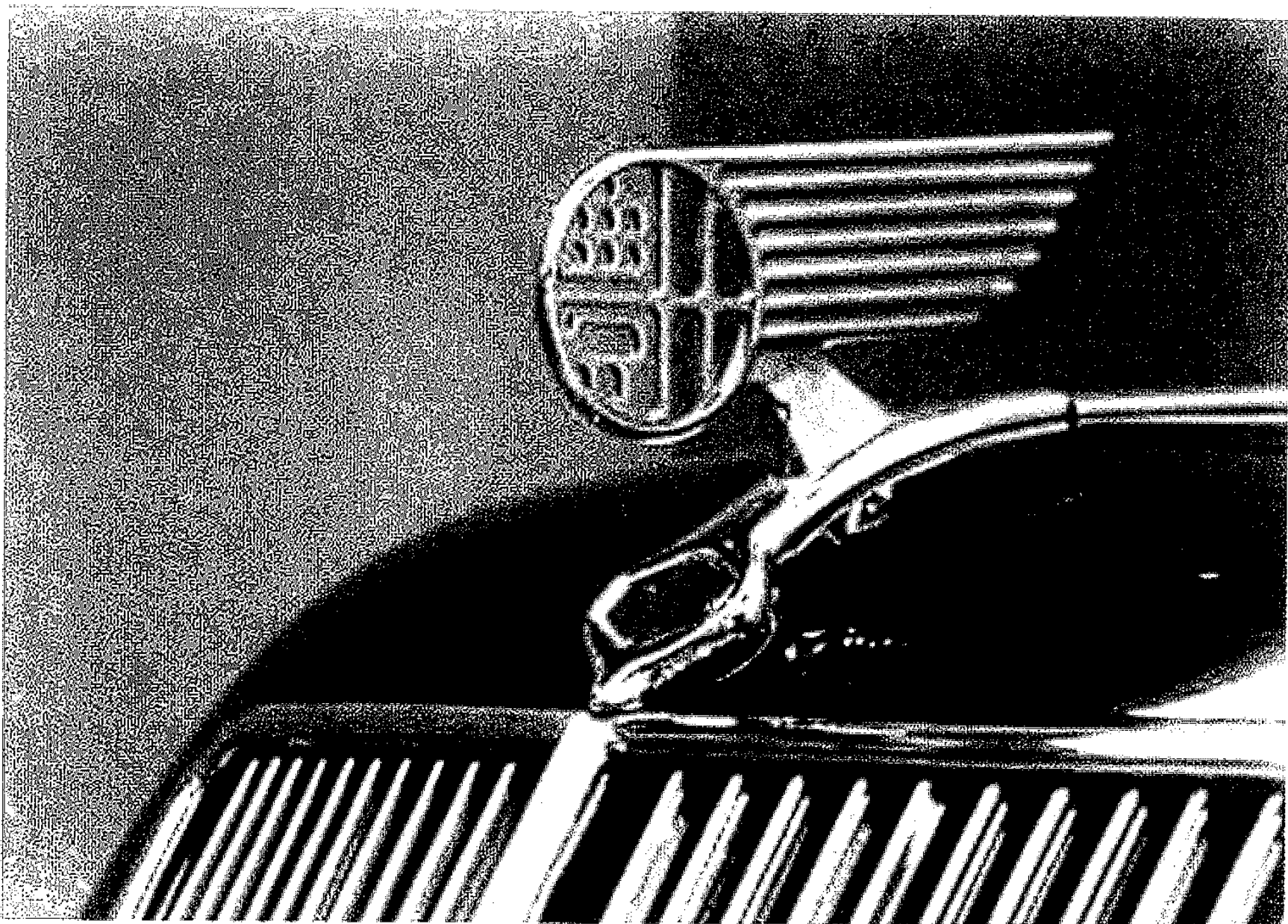
「風來坊」翻譯過來就是流浪漢、漂泊者、漂泊的根柢有無常觀，但情緒未必是悲觀，反而往往是樂觀的，唱的是自由之歌，漂泊不同於盲流，雖不免淒苦，卻像有人生的求索，好似在雨霧中行進，看不見目標，但那目標是存在的。

《風來坊閑話》。李長聲作品書影。

说知名品牌

贺卫方

2007年8月27日上午，我从首都机场起飞，去往日本访问。北京到东京的飞行时间是三小时一刻钟，跟到广州时间差不多。航班属于国航与全日空代号共享那种，其实就是国航的飞机和机组人员。飞机上有几份当天国内的报纸，其中就有《环球时报》。有一篇文章，题曰“中国民族品牌哪里去了”。文章回顾了改革开放之前上海的几种知名品牌——上海牌手表、永久牌自行车以及蝴蝶牌缝纫机——的黄金时光，历数了后来合资过程中一些民族品牌——例如香雪海冰箱、沙市日化的活力28洗衣粉等——是如何遭到遗弃的，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制造大国”，却又是一个“品牌小国”。随后文章的作者们，又提出如何保护中国品



第一批丰田轿车上的汉字标识。

牌。一位受访者说最重要的是要在质量和技术方面高人一筹。但是，困难恰恰在于，怎样才能在质量和技术上高人一筹？

报纸预告，第二天还会再推出一篇相关报道：“外国如何保护民族品牌”。但是我不能第二天还赖在这趟航班上，不过，好在网络时代，跟踪阅读不成问题。第三天，我在网上看到了那篇后续报道。其论述，不外乎分析美国、日本、韩国和法国政府如何通过法律和行政努力，给品牌以保护和宣传，等等。但是，对于那些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响的品牌如何能垂之久远，却仍然是语焉未详。

在飞往日本这个品牌大国的途中，我一直琢磨这个问题。尽管对经济学和产业发展，自己完全是外行，不过作为一个消费者，某些感觉还是有的。一年前在名古屋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之余，也曾参观过丰田汽车公司的产业展览馆和汽车博物馆，对于这家著名企业的创业史有一些粗浅的了解。在我看来，《环球时报》的这篇文章并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实际上，一个国家能够出现许多名牌产品乃是许多因素作用的结果，政府对于著名民族企业和品牌的保护只是一个很次要的因素。一个关键的因素是所有权制度。在今天，所有驰名全球的品牌几乎都是私有企业的创造物，而且，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实行所有财产公有制或国有制的情况下创造闻名遐迩且持续久远的品牌，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的現象。

还是以日本为例。我们知道，早在明治初期，日本就开始出现了一

些较大的财阀。像三井公司，作为一个家族企业，“它早在17世纪就在京都、江户和大阪建有纺织品商店和贷款机构”。作为武士企业家的典范的岩崎弥太郎，利用藩中剩余船只创立了三菱公司，至今仍然是世界范围内极具声望的商业机构。但是，几乎没有一个驰名品牌属于国有企业。据汪公纪《日本史话》载，1890年之后，政府还将那些国营企业里最赚钱、最有前途者卖给民间，让私人经营，最终导致制造业的飞速发展。其中原因不难理解，那就是国有企业没有足够的动力催生这样的品牌。试想，如果无论效益如何，企业主以及雇员的收入都是一笔恒定的工资，奖赏和惩罚都无法依据一种合理的标准分配，人们凭什么要努力地把产品做得精益求精？质量优异、不断地寻求消费者需要的满足的产品无从带来收益的提升，结果也只能是得过且过。从前，我们的解放牌汽车居然可以三十年如一日，正是这种体制所带来的必然后果。

一个品牌的培养离不开经营者的深谋远虑。商业的品牌跟大学一样，它的声誉要依赖长时间的精心培育。怎样的机制，能够让人们在很长时间里时刻不放松地去经营、去不断地推陈出新，赢得消费者的持久信赖，这个问题跟企业制度的设计有密切关系。胡适曾经感叹汉朝的太学当年何等盛况，但是却后继乏力，早早地退出历史舞台，正是因为没有现代大学具有的确保其处变不惊、遇到任何情况都可以保障正常运行的特殊体制。商业品牌也是如此。改革开放以后，外国产品再次进入中国。我们吃惊地发现，许多字号都是我们百年前就遇到过的。爱立信，清末就进入朝廷的电话机。美孚1号，我小时候家里有一个装煤油的铝

名鉄ニューグランドホテル
MEITETSU NEW GRAND HOTEL

名鉄
ホテル

名鉄ニューグランドホテル

TOSHIBA

Panasonic

SONY

SANYO

NEC

intel

FUJITSU

LEXMARK

SoftBank

De CoMo

YAMAHA

FUJIFILM

Victor

一座日本建筑上的知名品牌大汇集。



桶，上面就是那个熟悉的标志。当那些著名的日本企业又纷纷来华投资，不少人看到那些熟悉的标志，回忆起当年被这些公司抢掠到日本做劳工的悲惨经历。它们的字号居然历百年而不变，历百年而不衰。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早期的那种通过家族纽带、血缘忠诚带来持续发展的经营机制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但是，现代管理的重心仍然要通过各种制度去维护管理人员对于企业利益的忠诚。更不必说，像日本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在维持企业声望于不坠的过程中，家族纽带的作用仍然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的企业要培育自己的民族品牌，这样的“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机制是最值得深入研究和建设的。

品牌培育还需要良好的法律环境，以确保那些苦心经营品牌的企业可以不受伪造侵权的影响。如果假冒伪劣盛行，一个李逵周围有无数个李鬼在，同时法律又不健全，或者虽然有法律，司法机构却不能独立和公正地揭露和惩罚李鬼，民族品牌一定会变成民族“伪劣”品牌，能够持续久远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还有一个看起来不大，实际上很重要的因素——即如何给品牌取外文名字的问题。在不同国家来往很少的时代，取名字只要注重本国语言的发音以及意义即可。而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越来越需要注意商标的跨国或跨语言问题。这一点，日本人也是觉悟很早的。参观丰田公司的时候，获悉丰田最早是生产纺织机械的企业，到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生产汽车。开始仍然沿用从前的商标名称Toyoda，甚至第一批汽车的前罩

标志上还有汉字“丰田”二字。但是，后来很快就改Toyoda为Toyota，这样对于西人而言读起来就更顺畅。汉字也不再使用。索尼公司如何费尽心力取名Sony也是脍炙人口的故事。观察日本的商标，大多十分注重字眼在一般欧美人看来的内心感觉，试想Sharp在英文里的“锋利的”、“敏锐的”、“灵敏的”等意义，作为电器的商标是再合适不过的；Canon是很古老的西方词汇，来自希腊文，最初意义是丈量用的木杆或尺子，后来引申为规范、尺度等，天主教会的法律便名为“Canon law”，用这样的词作为讲求精确的照相机商标，是何等地富于吸引力！

反观我国的品牌，这方面就考虑较少。基本上就是把汉字拼音一下，“春兰”便是Chunlan，“长虹”就是Changhong，“恒源祥”就是Hengyuanxiang，“中华汽车”就是Zhonghua，凡此种种，一个共同的问题是这样的字在不懂汉语的外国人看来没有意义。另外，一些名称我们自己会读，但是，像Hengyuanxiang或者Zhonghua这样的词，找些老外来读，大约十有八九是读不出来的。读音都困难，又如何能够成为人们口耳相传的驰名商标呢？当然，还有不少商标是意译法，但是也存在着许多不顾外人感觉硬译一气的现象。一个经典的误译是把“飞鸽”商标译成Flying Pigeon [pigeon是那种不能高飞、只供人吃的肉鸽]，这样的产品如果能在西方飞得高飞得远，成为畅销产品，那肯定是个奇迹。

叁拾壹

一生负气成今日 四海无人对夕阳

贺卫方

2007年7月，我和几位朋友在庐山上小住几日，时间充裕，心境放松，倒也是难得的休闲。匡庐风光，既有自然之境，也有人文之景，端的是值得仔细品味的好去处。

到了最后一天，约定下山，靠近中午时分，闲聊中，同行的柳经纬教授忽然说：“在博物馆参观的时候，看到一个信息，陈寅恪先生的墓地好像在庐山。”闻听此言，我顿时精神大振。陈寅恪先生的家乡是在



陈寅恪、唐墓墓。

离此不算太远的江西修水，但因其终老广州，我便以为陈墓当在岭南。如果陈寅恪先生墓地真的在这里，我们却失之交臂，那岂不是太大的遗憾？跟东道主杨西律师商量，能否赶快跟本地人士咨询陈寅恪先生墓地的确切之处，能否利用离去前的时间去拜谒、瞻仰？马上电话联系，果然获得了可靠信息：陈墓在庐山！就在我们昨天曾去过的植物园。昨天参观植物园，我们居然不知那里长眠着中国当代最伟大的学者。

杨律师立刻发动他的坐驾，一行五人就向植物园飞驰而去。在植物园停车场，询问管理人员陈墓的具体方位，奇怪，没有人知道“陈寅恪墓地”，只晓得植物园里有个“三老墓”。所谓三老，是指为这个植物园作出重大贡献的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陈封怀和秦仁昌三位先生。而孤陋寡闻如我，也确实不知道三老墓是这几位老学者的安息之所。想来，墓地总会集中于一地。于是，就沿着三老墓的指示牌往前寻找。庐山植物园是一个好大的园子，古树参天，路径交错，五个人分头撒网式地寻找，总算找到了三老墓。可是陈寅恪墓还是不见。机敏的柳经纬兄往旁边寻找，很快，就发现了三老墓左上方高处的陈寅恪墓。

这是一座造型异乎寻常的墓碑。几块未经雕琢的石头并立在一起，一块高一些的柱石上面镌刻着碑铭：陈寅恪唐筭夫妇永眠于此。背后刻着立碑人，即陈先生的三位女公子和庐山植物园。另一块横置着的石头，刻着黄永玉先生题写的“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署名“后学湘人黄永玉敬书”。下款又标明该墓修建于2003年。

回来后查有关资料，方知陈寅恪先生得以安葬庐山的曲折经历，还有黄永玉先生为此所作的不懈努力，包括广东的学者对于陈寅恪先生最终长眠庐山而非广州的惋惜。不过，陈墓最终安放在庐山，还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这不仅因为陈先生故乡在修水，其先人散原老人在山上有故居，还由于这山顶上的植物园偏远而静谧。也许是有意的安排，园中所有路牌都未标注陈寅恪墓地在此，客观上也减少了到这里来的游人数量。陈公晚年，遭遇浩劫，工资停发，存款冻结，他所住的中大寓所——东南区1号楼被大字报覆盖。临终前，他的眼角不断流泪，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现在，他老人家总算可以得到永久的安静了。“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默默地注视着这“乱山堆雪”般的墓碑，想到陈公一生的凛然傲骨和人格操守，不禁心潮涌动。深深地鞠躬！鞠躬，也难以表达我内心的哀思、敬畏与仰慕。

2009年11月，中山大学东南区1号楼重新开放。

人已然远去，先生精神不死！

陈姑娘， 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

章
诒
和

2009年10月31日，我刚由乌鲁木齐返回北京，就得知歌手陈琳自杀的噩耗。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她就是我认识的“陈姑娘”。看到报纸刊出的照片，无可回避了，亡者就是陈琳，就是我的陈姑娘了。

除了陈琳的前夫沈先生，几乎没有人知道我认识她，且是朋友。几天后，沈先生发来短信，说希望我能在她的追思会上讲几句话，让它随着歌声飘入天堂。我回复道：我会以文字的方式来表达。

陈姑娘。



四手联弹 — 丙稿

从死讯传来至今，我的心一直不平静，很想写两句。是悼亡，也是写给自己的。因为，死是所有人一致的归宿，早晚而已。

记不清是哪一年，我到望京小区看望由重庆来的学者王康。客人太多了，多到谁也不认识谁。夜幕降临，大家围坐在几乎望不到尽头的长桌吃饭。突然，一个年轻女士把众人排开，一定要挤到我的旁边。

她坐下了，微笑着自我介绍：“我叫陈琳。”这名字太平淡了，平淡到和她身上那件白布衬衫一样。

旁边的主人做补充：“陈琳是流行歌手，挺有名气的，我们重庆人。”

“我叫章诒和。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

“章老师，我知道你。读过你的书，多好的书哦！”

吃惊不小，一个流行歌手。“真的吗？我非常感谢。”说罢，埋头吃饭。只顾和王康说话，便也不怎么注意她。

没几分钟，我发现陈琳的位置空了，人呢？毕竟我和剧团、戏班打过多年交道，知道演员的情感状态。我放下筷子，跑到卫生间。果然她

在那里，把脸埋在盆池，用手不断撩着自来水，冲洗自己的眼睛。她在流泪，在哭泣……

“陈姑娘！”我轻轻地叫着。

回转身，眼里挂着泪，脸上全是水，非常可爱。她说：“啊，‘陈姑娘’，多好听！章老师，你以后就这样叫我吧。”

之后，她向我解释，自己喜欢哭。高兴，要哭；难过，也要哭。现在哭，是高兴，因为意外认识了我。

我说：“你太年轻。成熟的艺人，都不这样。”

“我不年轻，都三十多岁了。”

我们一起回到了餐桌。重庆的菜，太辣。我能吃的只有放在眼前的油炸花生米。不一会儿，手机响了，临时有事。只得匆匆告辞。

等电梯的时候，陈琳跑来，说：“章老师，能把你的手机号码给我吗？”

就这样，我们手机短信频繁。她一天能发送十几条，每一条的落款

都是：“陈姑娘。”

一天，陈琳来电话，说要送我一件小东西，而且是最喜欢的，还是她亲手做的。一下子懵了——自失去所有的亲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最喜欢的？我们约定在友谊商店的咖啡厅碰面。陈姑娘来了：旅游鞋，运动服，布挎包，墨镜，素面，短发，任谁也猜不出她是个有些名气的歌手。

她说，自己早到了，不过是坐在汽车里等我。我要了一杯美式咖啡，她只喝矿泉水。话没说上两句，她从挎包里取出一个塑料口袋，打开口袋，取出一个日式小陶碗。双手递到我的眼前，说：“章老师，你打开看看吧。”

揭开碗盖：五香花生米，装得满满的。顿时，我联想起在望京小区餐桌上，只吃花生米的情景。“陈姑娘，你这样用心，我该如何谢你？”

后来，我拿一条英式图案的丝巾以为回赠。她闹起来，说礼物太贵重，自己所赠不过是一碗花生米罢了。因为不公平，是绝对不能收的。不容分说，我把丁香紫颜色的围巾绕在她的脖子上，让她自己去照镜子。说：“不好看，管保退货。”

她乖乖地去了，笑嘻嘻回来。红着脸说：“真好看呢。”

我很感动，她性情率真，称她为姑娘，是叫对了。

我们多次在咖啡厅碰面。陈琳送我的光碟，里面是她的演唱专辑。她还告诉我，在学习英文，幻想着能去美国专门学习流行音乐。

自打听说我是一个人生活，陈姑娘就一百个不放心了。天天短信问我，早餐吃了吗？午餐吃的是啥？晚餐准备好了吗？我被盘问得像个罪犯，一日三审。一天，她打来电话。说马上开车来接我，家里炖了一锅鸡汤，鲜死了。

她把丈夫介绍给我。沈先生很客气，将华丽敞亮的客厅让给我俩聊天，自己则躲进书房去了。家中的摆设，简单却不失精致，角落里有高尔夫球杆、网球拍。我觉得，陈琳的生活过得已经很爽了。

不久，在无意中得知我的脚“崴”了。这下子，她比我急。非拉着我上她家去住几天。说，有个好按摩师等着呢！

一次，我们谈到子女对待父母的问题。她讲出自己多年的苦恼。我说：“任何父母都是有缺点的，甚至是过失。但他们毕竟是你的父母，而孝敬老人则是一个人的道德底线。所谓孝敬也很简单，比如，你看到重庆明天的天气是四十度，能不能打个电话问候家人；碰见大风大雨，能不能打个电话，提醒关好窗户。其实，父母要求子女的并不多，一声

问候，就足以让他们眼泪汪汪。”陈琳很快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让我啼笑皆非的是她同样也关心我，只要北京刮风，下雨，高温，陈姑娘的短信就来啦：关上窗户没有？衣服穿暖了吗？煮绿豆汤没有？有一天，陈琳打来电话，让我猜她在干什么。我说：“你太难为人了。”

她不无得意地说：“母亲病了，我在医院陪伴呢！”

2006年，我送了本新著给陈琳。读后，她对我说：“和过去的艺人相比，我很知足了。但是在技艺方面与老前辈相比，那差得太远、太远了。我今后会努力，要把歌唱得更好。”

我问：“怎么才算好，标准是什么？票卖得好，就算好？上了央视，也算好？还是获了奖，就是真的好了？”

一连几问，她沉默了，表情变得很复杂，困惑又茫然。我知道陈琳有四川清音和扬琴的功底，于是，鼓励她走自己的路。我说：“戏曲段子，你就是再不会唱，也比半男不女的李玉刚强三分。”她说，自己现在也有点喜欢京剧了。我建议她先学梅派。没几天，她就在电话里给我唱《贵妃醉酒》，毕竟受过专业训练，一出手，就像那么回事。但是，她不时尚，既赶不上选秀的“超女”，也拼不过阴阳“怪胎”〔注：不是指专业男旦〕。人生的痛苦，有时候不一定是自己遭遇的失败，而是他人无端的成功。我甚至觉得鼓励陈姑娘上进，乃是绝大的错误。因为一个

非顶级的歌手，越是有雄心，就越艰难，并潜伏着覆没的危险。今天也不同于“万恶的旧社会”了，从前的戏班子，演员按头牌、二路、三路顺序排列。现在，管你是大姐大，还是黄毛丫头，都站在第一排，竞争残酷，甚至不择手段，使出台下功夫。

我也有对不住陈姑娘的地方。一次，她打来电话，正逢我与别人商谈事情。有些不耐烦的我，对她说：“你能不能先说到这里？”

旁边的朋友插话：“什么人？”

“一个歌手。”

“你还认识歌手？！”对方惊呼。

大概忘记关手机，陈姑娘肯定听见了。因为好几个月她没理我。她该生气！

陈琳的热情如滚开的水，纤弱如纷飞的絮，温柔如缠绕的藤。一旦迎面扑来，叫你猝不及防。她急切地需要把爱分送给朋友，也急迫地需要被爱。在今天这样只讲利益的社会，陈琳的多情就非常令我担忧。

我们从来不谈婚姻爱情问题，恰恰她的危机就发生在这里。陈姑娘匆

忙再婚，我吃惊不小。我觉得她不是在重拾爱情，而是在寻找依赖。离婚后的陈琳，害怕孤独与寂寞。于是，寻找新的爱情，便成为她自我逃避的方式。应该说：因害怕孤独寂寞而去恋爱、通过别人以求得安慰是当代青年的一种十分常见的心理。没想到出道多年的陈姑娘也这样做了，把自己的幸福和未来都装进了婚姻。而依赖，很可能就是被利用或彼此利用。这是最危险的！难怪有人说：爱可以拯救，也可以毁灭。问题是当陷入爱情的时候，狂热中你能分得清是拯救还是毁灭？果然，婚后没几天，陈琳与丈夫就产生尖锐的冲突。激情消退，大梦方醒，她赠房、赠车的种种慷慨，都成为证明自己愚蠢的注脚。草率又失败的再婚，使她感到无比的悲愤和羞耻，这段时间，她几乎中断了与好友的一切往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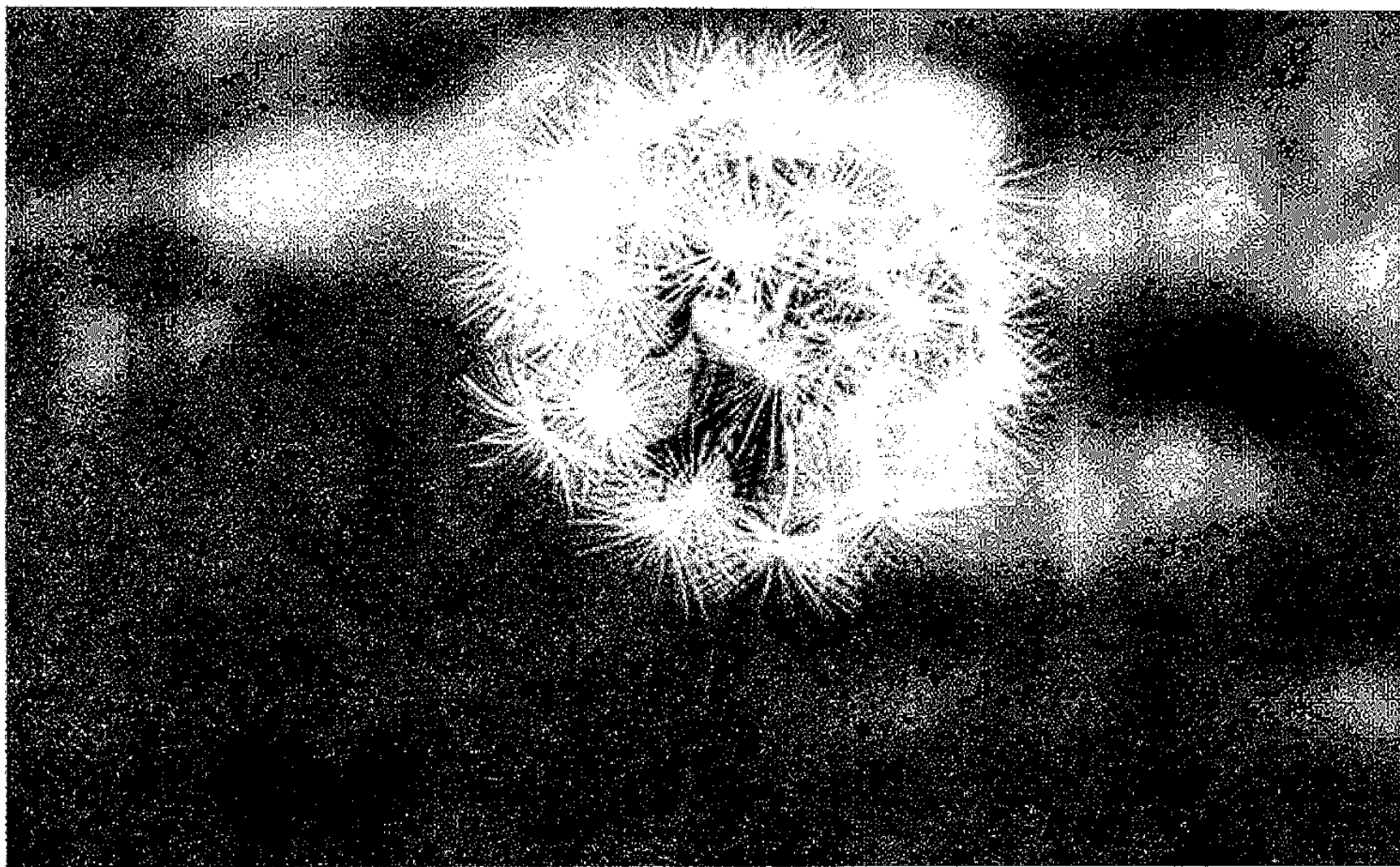
再有名气的演员，任你高居星空，光耀尘世，其内心都极其脆弱，不堪一击。婚姻的破裂和事业的艰难使陈琳不能自拔。何况，艺人从来都是掩盖真实的自我，而把笑脸、身段、歌喉，以及所谓的光鲜、轻松、快乐，抖擞出来。他们被别人观赏追捧，却并非被人痛惜关怀。他们那种无法向外人道来的凄凉、困顿、苦情和无奈，从某种程度上讲并不下于打工仔。加之，陈琳性格内向又倔强，苦撑门面、苦水自咽的生活，就使得她格外痛苦了。一切都有限度，超过了限度，陈琳决定撒手！

事情终于发生了，一个初冬的夜晚，陈琳做了自我了断，从九层高楼纵身跳下。陈姑娘把歌唱到黄泉路上，把爱弄到血肉横飞。离世的时候，她结婚刚刚三个月，这也使她的生命永远停留在年轻的岁月。“你

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我等待着那最后孤独。”万不想，陈琳成名曲中的两句歌词，像谶语一样应验了。

死亡是她最后的歌唱，也是最后的绽放，像蒲公英，貌凡而内秀，色素而至纯。花谢成絮，随风而逝，便再无踪影了。

此刻，外面飘着雪，路灯幽暗，我的心特别凄凉。



貌凡而内秀，色素而至纯。

叁拾叁

端木露西： 蔚蓝中的一点暗淡

章
诒
和

从父母那里，我知道储安平原来的妻子叫端木露西〔原名新民〕。他们是光华大学的同学，有四个孩子。离异后，她常住上海——仅此而已。

储安平很少对朋友谈及家庭。朋友知道他有两度婚变，谁也不便去问。只是在办理第二次离婚手续的时候，储安平到我家诉苦，说：女方离婚条件太高，自己真的没有那么多的钱。

储安平、端木露西结婚照。



適安兄
三小姐新
民與儲
安平君
合影

现在，我与储家子女储望瑞、储望华保持往来，即使通话、聚会，我也从未打听他们的生母。端木女士像个难解的谜，沉埋数十载。

2009年7月，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举办了纪念储安平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这是一个对储安平生平、思想及其评价的全面性、系统性研究的开始。与会的多为年轻学者，气氛热烈活跃。在团团热气里，端木露西的轮廓渐渐被勾勒出来。特别是来自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周蕾女士撰写的《端木露西的女性主义思想》一文，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储安平夫人的重要信息。

端木不是一个普通女子！她出身富裕家庭，相貌端庄，有着独立思想和自主的性格。还在苏州中学读书时，就已十分活跃，演过话剧。她饰女主角，而男主角的扮演者，则是一表人才的蒋纬国。她与储安平于1934年结婚。翌年，在《中央日报》副刊创办的“妇女周刊”任主编，发表过《南开回忆》等文章。1936年，随夫到英国留学。端木曾对儿子望华说：“你父亲当初的英文还不如我，我比他好。但到了英国，我发

现他的英文一下子好起来，连英国议会的激烈辩论都听得懂。”

从英国回来，二人仍一起在中央日报社工作，社长是程沧波。夫妻关系的裂痕就因社长而起，端木与他的一段婚外情，闹得沸沸扬扬。绯闻让程沧波在1940年被迫下台。据说蒋委员长把他叫去训话，狠骂一通。于右任惜才，说“风流无罪”，遂调程去监察院当秘书长。

风波平息，储安平一家继续自己的日子。1940年11月，他们来到湖南安化县。储安平在那里的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教授，端木则担任该校附中校长。夫妻俩合办了一家“袖珍书店”。1943年，储安平主编“袖珍综合文库”丛书。收录了妻子的《海外小笺》。1944年，露西散文集在湖南蓝田编成。不想，书编完了，家庭也完了。这一年〔也有可能在1945年〕，夫妻分手。

1951年，端木任上海一所中学校长。1964年，提前退休。1998年，在上海病逝。端木后来再婚，丈夫是气象学家。

我反复看这张结婚照，一个多好的男人，面白，身修，美丰仪。一个多好的女子，聪颖，优雅，有才情。为什么就合不到一起呢？望华认为，这是由于父母的个性都太强，谁也容不得谁。特别是母亲总觉得是父亲限制了她。其实，储安平多少也有责任。他太热心工作，太淡漠家庭。别说对妻子，就是后来他独自抚养四个子女，也是立足于孩子们的自立，而感情投入不多。望华说，1950年，为送大哥望英参军，父亲带一家人去外出吃饭，他算是生平第一次吃北京烤鸭。储安平也太简单，太朴素，乃至有些“抠门”。从小清贫日子过惯了，“一块豆腐乳要分几天吃”。就是以后当了主编，每天晚上回家，也是让保姆单为自己炒一碟小菜，无非是肉丝炒蒜苗之类。物质上不尚奢华是储安平一生的特点，也是难得的优点。但面对妻子，这样的习性还是优点吗？恐怕就很难讲了。汤显祖在《牡丹亭》里咏“如花美眷”，唱“似水流年”，殊不知如花美眷最怕那似水流年。任何婚姻，哪怕再和美，都可能潜藏着变数与危机。

1940年，端木在经历那段与程沧波的婚外恋后，写下了有名的散文《蔚蓝中的一点黯淡》。文章里，有这样的话：“在现社会制度之下，我们不能否认在二万万多的女同胞中，无论她的阶级如何，十分之九的妇女归根结底还是需要在家中做主妇，做母亲的。”可见，她的心是不安的，也是不甘的。她向往的是蔚蓝，而自己眼前的状态则是黯淡。

端木露西早晚会离开丈夫，离开孩子——一切都已注定。

她平安地度过了后半生。事情到了最后，黯淡的到底是谁？是她，还是储安平？

汉语拼音与威氏注音

贺卫方

与友人聊天，座中一位来自泰国的朋友问：何以北京大学官方英文名称中，“北京”是“Peking”而不是“Beijing”？我不免追溯一番威妥玛—翟理斯注音法 [Wade-Giles Spelling System] 的来历及其被汉语拼音所取代的事情。几年前，北大以及清华的英文校名似乎很引起一些争议。我对于这个问题有些未置可否，但是，对于汉语拼音中自己感觉到的一些问题却一直有些如鲠在喉，想提出来，尽管我在语言学方面是完全的外行。

记得在地名、人名方面汉语拼音强制性地取代威氏注音法，好像是



柳迎春在读谁发来的短信？

80年代中期的事情。我1978年上大学时开始学英语，知道我的姓要拼成Ho的，那个时候重庆叫Chongking，南京叫Nanking，广州似乎叫Kuangchou或者更独特的Canton的。这跟我们从小学习的拼音完全不一样，心里很新奇了一阵。到了威氏注音法废止后，自己却有些困惑，也越来越体验到它在中外交往中的不便。

最初的麻烦，正是从自己的姓氏开始的。我发现跟外国学者交往，除了专门的汉学家外，我一律变成了“黑先生”或“黑教授”，这是因为这个姓跟英文第三人称单数的he完全一样，老外当然就发“黑”音了。加上我们没有像一些常在外国生活的朋友那样给自己取一个Henry或John之类便于记忆的名字，就给交流带来了不小麻烦。我想，我的这个“黑”还好，毕竟是男性，黑就黑吧！那位美国的何女士该有多别扭：Ms. He，“他女士”，性别反差够强烈的。我一直觉得如果用英语设计一段对话，可能会很有趣：一位姓何的女士跟一位姓余的男士[Mr. She]，再加上一位姓游或者由[我们法学院就有一位前辈学者由嵘先生]的老者之间对话，其中He said如何如何其实是何女士所说，She answered实际上是余先生的回应。再有Mr. You再穿插其中，不断搅和，不把读文章的老外“忽悠”死才怪。显而易见，这样的情况对于我们的传播和交流都是不小的问题。

如果说上面几个例子还只是让外国人发音不准的话，其他一些事例则是人们根本读不出来。例如，姓夏的[Xia]，姓徐的[Xu]，姓钱的

云南腾冲和顺镇的一处路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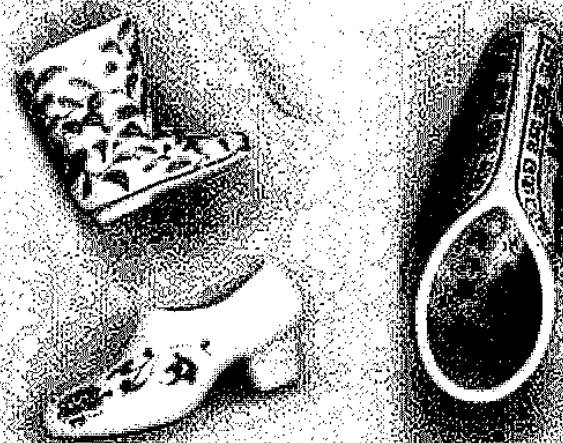


[Qian]，所有以Z开头的[Zhang, Zhao, Zhu, Zhuo, etc]，老外看着名片肯定要发傻。我的一位姓夏的老同学在哈佛做访问，外国人几乎没有能把他的姓氏给发准的，za, jia, ra, 怪声怪气，不一而足。而旅美文学教授夏志清就没有这个麻烦，Chih-tsing Hsia，外国人尽管叫起来没有我们说得字正腔圆，但是大体上不会有问题。我还听说，一位姓习的人在美国一家银行办理存款手续，他那个大写姓氏“XI”着实把银行职员难住了，晕了半天，居然大喊：“Mr. Eleven！”也难怪，那不正是罗马数字“十一”么？地名也一样，北京还问题不大，但是广州、杭州那么多的zhou，西安、西宁那么多的xi，青岛、青海那么多的qing，外国人基本上是很难发准音的。

记得去年读过一本翻译家写的书[一时间竟想不起是谁的书、哪本书了]，作者谈到过汉语拼音的另一个麻烦。在复兴门外的那座燕京饭店，本来准备叫复兴饭店的。这位翻译家听说后急忙跟有关部门说，这个名字万万叫不得，因为它的外文名称[Fuxing Hotel]将会让外国人想入非非：一般西方人读音听起来的意思居然是“性交饭店”！有关部门从善如流，避免了一场大尴尬。可是，北京以及不少城市里Fuxing还多的是，复兴门内，复兴门外，广电部，中央台，大厦林立金融街，对外介绍都少不了这色迷迷的Fuxing或者Fuxingmen。人名也不能幸免，作家肖复兴不也要Fuxing个没完么？这全怪汉语拼音有时会碰巧具有了实体意义。但是，威氏注音法——Fu Hsing——就没有这个问题。

除了外国人发音上的不便利外，全面拼音化还带来了与人和地相关文献信息的全面混乱。改制前后，同样一个人在外文中就变成了两个人。《不列颠百科全书》为了信息准确，不得不在每一个中国地名和人名词条后加注威氏注音，但也只能是词条名，正文里还是用威氏注音。一个人名，两套注音，Chuang-tzu变成了Zhuangzi，一般读者哪里会知道这本是一个人？这对于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我们的国学自然是一个障碍。另外一个弊端是，两岸四地之间也发生混乱，两边本来都姓张或章，我们这边是Zhang，那边却是Chang；两边都是邓家人，这边是Deng，那边却是Teng，本是同根生，到了外文里却是八竿子都搭不上，繁简字之外又多了一层隔阂，亲兄弟也不相认，有害于两岸统一也未可知呢。

瓷鞋——高跟的、小脚的、带筒的。



好吃勤做

章诒和

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对我实施受用终身的教育。所谓受用终身教育，就是讲一些与生存之道相关的行事规则。大概由于母亲文化水平比较高，极少啰嗦，更无废话。她说的话很像“格言”的，我大多牢记在心，也努力付之于行。但实践的效果和初衷大半不符。这里，以母亲的三句话为例，做个简单的说明。

第一句：女孩子，不要占小便宜；否则，要吃大亏。

实践的结果：我从未占过小便宜，但大半辈子都在吃亏，而且一吃

就一定是吃大亏。

第二句：你要会讲话，会写字，也要会穿衣，这是面子功夫，为的是以后能谋个好差事，有碗饭吃。

实践的结果：写字穿衣姑且不论，要命的问题是我一直不会讲话，最终导致了此后的命运。

第三句：女孩子，不能好吃懒做，将来看婆婆怎么收拾你——这话，母亲是笑着讲的。我把头一歪，问：“那能不能好吃勤做呢？”站在一旁的父亲忙点头，连道：“可以，可以。”

我高兴地扑向父亲！此后，我奉行的原则就是好吃勤做了。

我的勤做，是一点点培养起来的。小学设有“劳作”课，老师教我们捏小泥人，做石膏像，做砚台，用高粱秆扎飞机模型，兴致可高了。我用小刀削高粱秆，不小心把手指头削下一块皮肉来，鲜血直冒。妈妈赶来替我包扎，不觉得疼，嘴里还哼小曲儿。这是我“勤做”的初级阶段。我的高级阶段完成在监狱。从杀猪、烧炭到打裕襟、纳鞋底，没有不会的。

1978年，我回到北京，带着高度自觉且极其完美的“勤做”回到母亲身边。毫不夸大地说，我整日价手脚不停。没活儿干的话，就把狱中手艺拿出来展示，做个精装纸本啦，自制咸鸭蛋，给旧衣服改个样式啦。我不停地在房间走动，把母亲搞得眼晕又头晕。母亲也有夸奖我的

时候，那就是我经常下厨烧菜煨汤。母亲的朋友来得多，我的干劲就来得高。一个春节，能烧几十个菜。并非是我多么酷爱烹调，而是因为我要以此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我在牢里有多累，她的心里就有多苦。

2003年，随姐姐到美国探亲旅游，我顺便把这份高度自觉且极其完美的“勤做”带到了大洋彼岸。人家准备废弃的炒锅，被我擦得锃光瓦亮。地上拣到的树枝枯叶，我收罗来做成一幅立体图画，没人欣赏，就自我欣赏。一天，外甥带我去一家小酒店买葡萄酒。我一眼看到店主人身后有个玻璃大瓶，里面装的全是软木瓶塞。我顿时亢奋起来，一把将外甥拽到身边，激动万分地说：“瓶塞！我想要那些瓶塞！你能跟店主说说吗？告诉他，我的专业是搞艺术研究的，属于正牌的国家级艺术研究机关。这些瓶塞又多，又好。我要自己动手用它们做成一件艺术品，为美国之行做个纪念。问问主人，能不能送我或卖给我？成全我的创作吧！”说得真诚又急切。

外甥把我的话翻译出来，店主人点点头，微笑着，顺手拿起了个牛皮大口袋，“哗啦”一下，把玻璃大瓶里的“宝贝”倒了进去，就伸手递给了我。我真不知该如何表达自己的谢意！遂问：“能不能与我合影？照片也将被我用瓶塞装饰起来。”店主人，非常乐意。我们笑着走到一起。

回国不久，我《酒瓶塞》完成，手工制作，我的手工。美国小酒店里的合影也被我用瓶塞装饰好，放在一个显眼的地方。

好吃勤做，真的很好。

叁拾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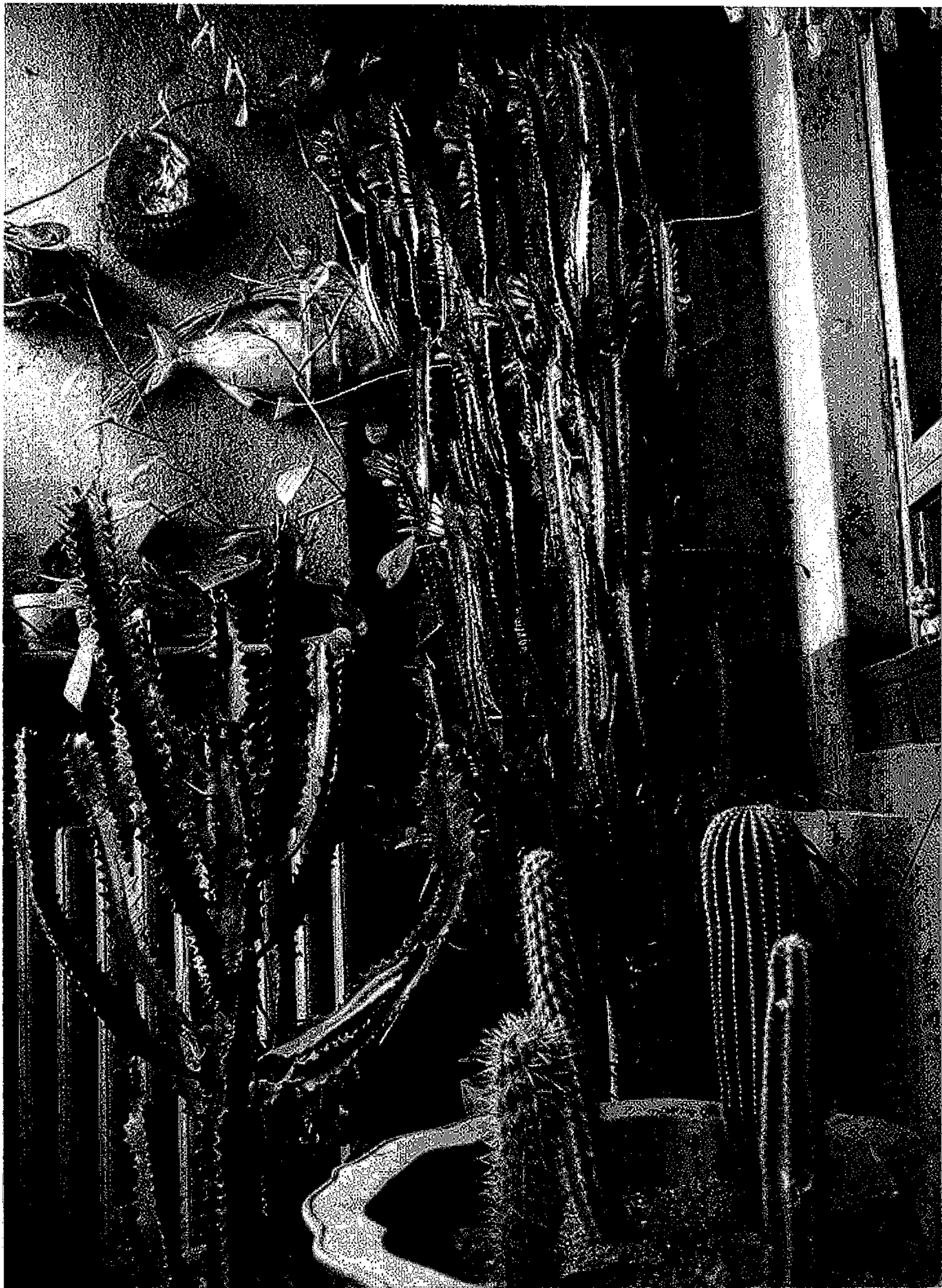
只养仙人掌

章诒和

父亲喜花草树木，庭院里养的花木数也数不清，说四季有花香，是一点不为过的。他每次出差回家，带回家的东西有两样。一是书，二是花。在北方，植物的越冬是个大问题。为此，父亲在西跨院修了个花房，把娇嫩的花木集中到这里。要说漂亮，最漂亮的还是梅兰芳送的八大盆腊梅。干、枝、叶、花皆可赏可品。父亲去世后，庭院里的香与色，都进入了记忆。以后，我家搬到了水泥楼，住单元房。花木葱茏，四季有香，成为我心中的想像。

家族的延续，靠血脉，也靠生活方式。父亲喜欢什么，我长大了也

我的阳台。



四手联弹 - 内箱

喜欢什么，很自觉，很奇怪，也很顽固。觉得这是章家印记，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为有此印记而自豪。于是，我在狭窄的阳台，也开始摆弄起花草来。植物是生命，来不得半点疏忽，植物不是子女，又不得过于认真。而我呢，时而疏忽大意，时而过分认真，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买几盆，死几盆；再买，再死。弄得阳台花无一朵，绿无一抹，却堆满一百多个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花盆。

经过一番思考与比较，我认为需要更新品种。决定啥都不养，只养仙人掌。仙人掌那奇妙的外表和顽强的生命力，让我惊叹和感动。越养越爱，即使仙人掌也常被我养死，死了一盆，补一株，成批死，成批补。我喜欢仙人掌的高大，粗直，锋芒，看了能感受一种气势、倔强和力量。我还喜欢仙人掌的安详宁静，对城市的浮躁，对人群的喧嚣，对时间的流动，它仿佛无动于衷，保持着近乎冷漠的疏离。现在许多办公桌和电脑桌边，都摆放着一小盆仙人球。据白领朋友说，是因为它养着不费劲，看着也舒坦，还能释放氧。

仙人掌类植物全世界有两千多种，一半左右产在墨西哥。高原之上，任凭土壤多么贫瘠，气候多么干旱，它却总是生机勃勃，直指苍穹，构成墨西哥独特的风貌。一些长着芒刺的仙人球，寿命可达五百年以上，真是万寿无疆了。最大的仙人掌高十几米，重几十吨，远看像一座童话里的城堡。相传仙人掌是神赐予墨西哥人的，有“沙漠英雄花”的美誉。网上有人这样介绍：仙人掌有一颗外刚内柔之心。在造物之

初，它原本娇嫩似水，稍一触碰便失去了生命。上帝不忍，遂在她的心上加上了一套盔甲，坚硬如铁，上面还带有伤人的钢刺。从此，再也没有人能看到仙人掌的心了，凡是接近她的生物都会鲜血淋漓。很久之后，有一位勇者要铲除这“恶物”，剑出刀落，仙人掌变成了两半，从中流出绿色的液体。原来，那是被封存的仙人掌之心，因无人了解那心中的寂寞，遂化成了滴滴泪珠。所以，仙人掌的花语是“坚强”。

植物也可以诗意，也可以悲情。噢，我的仙人掌！

叁拾柒

乡事偶拾

贺卫方

70年代前期，“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浪头已经过去，不过所谓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依旧势头不减，而且无远弗届。

我的家乡，胶东沿海的一个叫做姜格庄的村子，也不避偏远地经历着一场又一场运动的“洗礼”——批林批孔，批《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此起彼伏，不一而足。运动之中，我们村忽然时来运转，在山东省出了一个大风头。至今忆起，仍然回味无穷。

我们村是个大村，当时人口已经三千有余了。全村人家清一色，都



京剧《红灯记》。

姓贺。不叫“贺格庄”而叫“姜格庄”，据说是因为土著姜姓被移民贺姓给鹊巢鸠占了。村系公社机关所在地，属全公社政治、文化和贸易中心，只是原来的重要性只体现在公社范围内而已。

“文革”时代，村党总支书记是全国民兵英雄，据说还到北京受到过伟大领袖的接见。他特别喜好文艺，在村里组织了颇具规模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购置了全套的中西乐器。村子大，各种人才也相对多些，居然可以全本地演出好几出样板戏。宣传队之外，书记又花样翻新，建图书馆，办广播站，修起灯光体育场，开设政治夜校，甚至推行火葬，建了一座“劳动人民纪念堂”用来放骨灰盒。这样一来，村里的各种文化活动就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而且很快就远近闻名了。1974年，江青在天津树立了小靳庄这个乡村文化建设的先进典型。山东省革委会白主任到我们村考察一番，很满意，赞曰“山东的小靳庄”，随后又宣布作为山东对外开放单位。这一下名声大振，引来八方看客，百般新事。

新华社派驻记者在村中常驻。一批批外宾来村里参观，了解经过“文革战斗洗礼”的农村发生的巨变。记得当年的法中友协会长马季乔夫人还专程来村住了半年，作参与式考察。省地两级文艺团体不断地来演出。电影《闪闪的红星》在山东的首映放在了我们的村，至今我还记得

那天在茫茫大雪之中看电影的场景。

成为这种知名村庄让村民们眼界大开，也油然升起一种自豪感。图书馆里可以借书，激发了一些年轻人的阅读兴趣，尽管大多是浩然、张永枚这样的红色作家的作品。看电影也许是村民们最欢迎的娱乐了。只是那时电影太单调，除了发布时事新闻的《新闻简报》外，无非是“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和《南征北战》〕、《青松岭》、《春苗》、《火红的年代》一类故事片，反复上映的样板戏，还有朝鲜的《卖花姑娘》一类，所谓“越南的飞机大炮，朝鲜的又哭又笑，中国的新闻简报”。记得“票房”最差的是芭蕾舞剧《白毛女》，村民们怎么也无法欣赏踮着脚尖跳来跳去，话也没有几句的什么芭蕾舞，看了半天，那喜儿或大春也没“扒”出什么“雷”来。演出不过半，人就走空了，放映员也只好尴尬地收场回家。

先进村庄的另一壮举是普及了高中教育。不过，那是一种劣质的普及，把原先初中学历的学校提升为“九年一贯制”的层次，教高中的老师都是此前教初中的那些。村里规定：本村每个孩子都可以义务读到高中毕业，代价是每个人也只允许在本村学校即姜格庄联中读高中，不得进入县立高中读书。教师层次不够，加上“反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



冬天的姜格庄。

潮”，我们的高中阶段就在造反、学剪果树枝和零星地上点课中间度过。回想起来，当时我承担的一份任务给了我很大帮助。每天中午放学后，我就到邮局取学校订的几份报纸，回到家，吃过午饭后，利用午间时间把报纸粗读一过。那时的报纸内容贫瘠，谎言充斥，不过两年多时间下来，或许还是多少提高了自己对于文字的感受和运用能力。结果，1978年高考，我成为全年级近百名学生里惟一考上大学的人。

后来，“文革”结束，村里热闹的气氛渐渐散去。外宾不来了，记者也班师回京，样板戏自然也消失了。土地包产到户，村民们获得了种植上的自主权，集体活动减少到了最低限度。物质生活品质也改善了，一年到头都吃小麦，不用再吃我最憎恨的地瓜〔红薯〕了。昔日高官进口车，开入寻常干部家。只是，过去那种集体生活的乐趣也消失了。几年前，我回乡，一位高中同学谈起今昔之比：“现在吃穿方面都是好多了，也自由，不过，从前大家在一起打打闹闹的，多有意思啊！”

他说话时那迷茫的眼神让我久久不能忘记。这的确是个很困难的问题。

他们更耐人寻味

章诒和

啥叫“文人”？有人说：文人就是舞文弄墨者。我同意这个看法。那些有大学文凭或硕士、博士文凭的人，那些官员、教师、工程师、科学家、经济师等等，他们也都会写文章，有的还有作品，但他们不是本质意义上的文人。

我以为文人原本就地处边缘，是可有可无的一群。自由是他们的底色，追求自由是他们的特性。所以，他们可以放浪不羁，可以胡言乱语，可以傲视权贵，可以纵情酒色，可以一掷千金，某些颓唐行为固然为正人君子所不齿，但并非堕落。只要你接触的文人、艺人多了，就会

《借东风》里的马连良〔饰诸葛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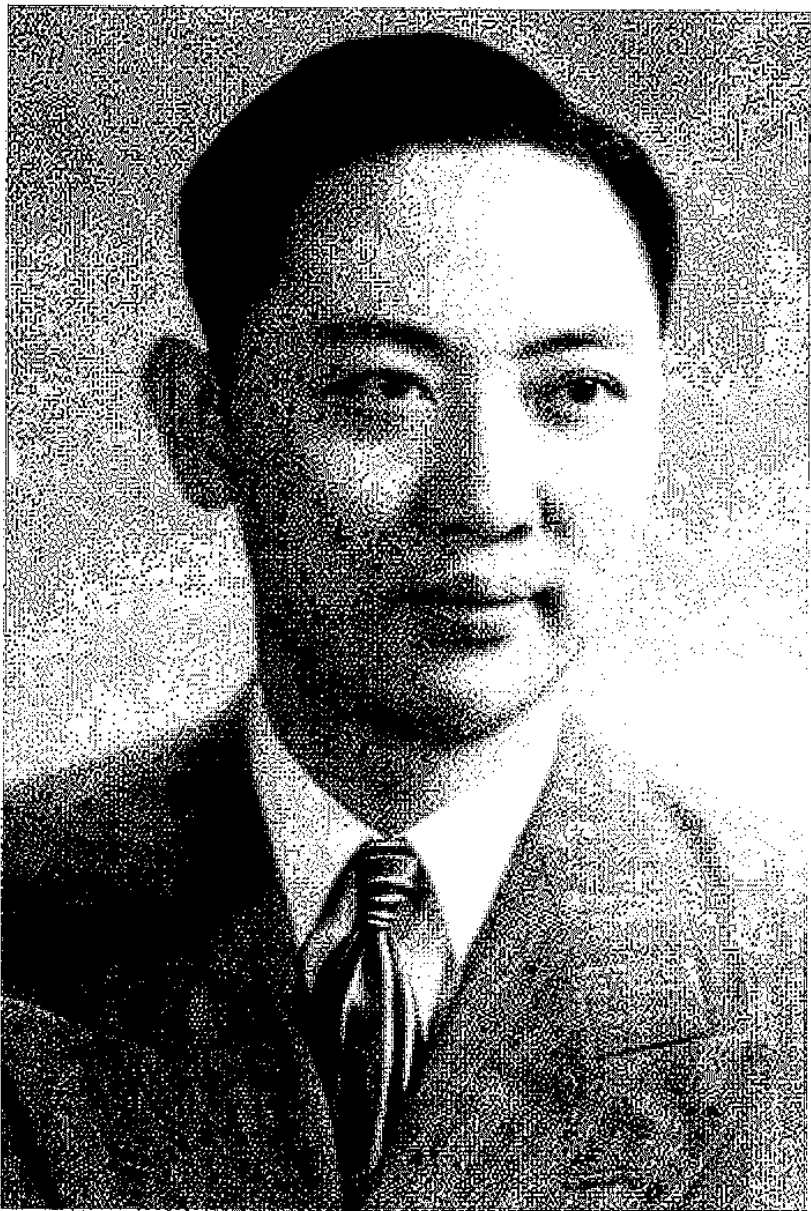


知道：在其放浪形骸的内里，也有着传统道德的支撑。像张伯驹的收藏，叶盛兰的脾气，马连良的摆弄小玩意，言慧珠的钻戒和一百多件的毛皮大衣。他们当中有人还有“抽”、“赌”、“嫖”的恶习。总之，“台上风流，台下也风流。”一生至死，都是“公开展示的存在”。

这种生活状态，风姿样式，人生观，价值观，也都自然而然地反映在他们的文字里，歌咏里，表演里，画作里。梅兰芳一生崇尚的是“美”。你去梅宅，任何时候见到他，都是皮鞋光亮，头发光亮，一副雍容华贵相。所以，他演的杨玉环即使受了冷落，备觉苦闷，那也是贵妃。张伯驹说是金融家，其实不大会理财。天天游东逛西，应酬唱和，戏院堂会，玩得没完没了。一生只懂、只会、只爱三件事：诗词，唱戏，文物。想不到吧，就是这么个散淡不羁之人，在这三个领域都搞出了大名堂，为国家做出了杰出的文化贡献。有人说，张伯驹的成就很大成分来自于钱。那么，给你一百亿试试，你能识别宋画吗？能唱诸葛亮吗？能填《金缕曲》吗？

去也，这些民国旧事！有意思的是：这些“去者”，今天竟成为我们再三品味的话题。我所熟悉的学者孙郁写民国人物“狂士”的文章，一篇连一篇，一本接一本。为什么要写这些旧人？他说：因为他们更耐人寻味！

在上个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老文人、老艺人以及他们所从



张君秋便装照。



关肃霜主演的现代京剧《黛诺》。

事的行当，都不再吃香。文人是落后的，戏班是封建的，字画属于四旧，生活是腐朽的。于是，清算，批判，下放，斗争，戴帽，劳教。在被强制化、规范化、驯化的同时，文人、艺人自己也开始不得不学着“自查”，“自律”，直至“自觉”。那时我们国家的高层行政领导，也有例外，比如彭真。他担任北京市市长，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他全部工作的业绩，我不清楚。但对北京的几个京剧名角，的确非常爱护。1958年“大跃进”，所有演员无一例外下到郊区干农活。彭真知道后，让他们陆续回城。并说：“把手指弄坏了，今后还怎么演戏？”北京市文化局和宣传部向他汇报马连良爱钱。他在1955年1月的北京市第二次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说：“快过年了，大家要看戏，再讲讲看戏。管文艺工作的死命骂马连良，市委有个资料，也骂马连良，演一场戏九百多万元〔旧币，折今币九百多元〕不干，非要一千多万〔旧币，折今币一千多元〕不可，好像马连良的思想问题不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就完不成。从这里也可看出同志们的思想。其实，马连良既不是党员、团员，据说已经六十多岁了，大概也不是少先队员，就是唱戏的。就是‘我唱戏，唱得好，你给我钱’。所以，对马连良的要求不要那么高，这是一。第二马连良戏唱得好，卖座，群众多花几个钱，也愿意看他的戏，我们管这个干什么……宣传部管戏剧就是管思想，只要思想上不反动，没有害就准演。至于说〔对人民〕无利，打扑克有什么利？只要娱乐就有利了。你老人家又不给人家创作，又不许人家演这个、演那个。我们要去管大的思想，管政策。很多事不去管，非去改造马连良的思想不可，这有点兴趣主义，抓到哪里就搞到哪里。马连良思想能否改造，我有点怀疑……

马连良的思想最好是共产主义，但落点后也不很重要；只要他演戏、卖座，大家喜欢看，看了解闷就行了。”老实讲，当年彭真对文艺，对文人、艺人的了解比我们现在的文化部门深刻得多。在彭真的领导下，北京市京剧团演出和创作了一批很不错的戏，如《赵氏孤儿》。张君秋也在这个时候形成了自己的流派——张派。这是1949年后，惟一形成的京剧流派。

艺术若跌入低谷，我以为首先是人文气息、艺术气息的丧失，是文学家、艺术家身上散发的随意、温润、自然、悠然、超然的文化状态的丧失。所谓文化状态，说穿了，无非就是一个人的生命状态。所以，想把文学艺术搞得有点样子，恐怕不是出什么经典，而是尽可能去还原文人、艺人的生命状态。

图 录

甲辑

壹 也苍郁，也清冽

P.015 茫茫天山雪，壮美复孤绝。

贰 我是天空的一片云

P.019 天光云影，牧草如毡。

叁 黑夹白

P.023 刚才还是亮丽安详的天山，一阵暴风雨，就变成了“黑山共和国”。

P.026 迈克尔·杰克逊。

肆 我要孝顺羊了

P.031 一群羊在“涝坝”边上“饭青草饮水”。2009年5月29日摄于玛纳斯河畔。

伍 沙

P.033 新疆鄯善的沙漠。

P.035 沙瓶。

P.039 塔克拉玛干沙漠上的沙纹。

陆 竭盘陀

P.043 在塔什库尔干城外草甸看到的石头城遗址。

P.044 当年斯坦因所拍摄的石头城。

P.046 红其拉甫口岸巴基斯坦一方的景色。

柒 为你疯狂

P.049 阳光下的金色胡杨。

P.050 美丽依附于严酷，生命再现于死亡。

P.054 胡杨无年轮，外表裂痕深如壑。

捌 告别喀什

P.057 喀什高台民居。

P.059 高台民居正在消失中。

P.063 秦尼巴克〔或“中国花园”〕。斯坦因摄于1914年。

P.067 秦尼巴克之内景。

P.068 清真寺里的一扇窗。

玖 仰望慕士塔格峰

P.071 阳光下的“冰山之父”熠熠生辉。

P.072 巍巍昆仑。

乙辑

壹拾 纳沙泰尔

P.079 早晨7点醒来，拉开阳台门帘，眼前的风景令我惊叹……

P.080 山湖宾馆。

P.083 波光粼粼的纳沙泰尔湖。

P.086 正义女神像。

壹拾壹 别人都朽了，他不朽

P.095 海德堡城堡内的歌德塑像。这里留下了他的足迹和对爱情的礼赞，城堡墙上镶嵌着那首题为“我把心儿遗忘在海德堡”的情诗——“在一个温暖的仲夏夜，我的耳朵也充满了爱情，她的嘴唇好像玫瑰含笑。当我们在大门前告别，我清楚记得那最后一吻。我把心儿遗忘在海德堡，我的心啊在内卡河边狂跳。”

壹拾贰 没有塑像的底座

P.099 底座之上空空如也。

P.103 日本国会大厅里的伊藤博文塑像。

壹拾叁 关雪“梅兰芳”

P.105 梅兰芳。1913年摄于上海。

P.109 桥本关雪笔下的梅兰芳。

壹拾肆 我看到了洪堡大学

P.113 周末，洪堡大学主楼前的旧书摊。

P.117 威廉·冯·洪堡塑像。

壹拾伍 建筑的政治学

P.119 二战德国海军部大楼。

壹拾陆 姬路城

P.123 姬路城。

P.125 家徽板。

P.126 手持饰有纹章盾牌的欧洲武士。

P.129 一幅姬路城全景画。

壹拾柒 吴哥的绝世微笑

P.131 描绘国人征服的浮雕。

P.133 历尽劫难，微笑依然。

壹拾捌 经过“柏林爱乐”

P.137 “自由管弦乐共和国”。

壹拾玖 坂东玉三郎

P.141 杨贵妃〔坂东玉三郎饰〕。

P.143 坂东玉三郎剧照。

P.145 坂东玉三郎剧照。

貳 拾 黑船上的汉学家

- P.149 佩里〔1794—1853〕舰长肖像，夸张的笔法显示出日本画家对美国人的想像。其汉字题款为“北亚墨利加合众国水师提督ペルニ之肖像。年龄六十岁许，毛发半白”。

P.151 黑船〔日本版画〕。

丙 辑

貳拾壹 若生在明清，就只嫁张岱

- P.159 南府《劝善金科·十殿》之二十一鬼卒。
- P.161 清乾隆版《陶庵梦忆》书影。
- P.162 明刻本《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书影。
- P.165 史景迁著《前朝梦忆》书影。

貳拾貳 胡颂平的日记

- P.167 胡颂平日记封面。
- P.169 胡颂平日记里夹存着的照片和名片。

貳拾叁 他们像传说一样过去了

- P.173 白先勇近照。〔许培鸿摄〕
- P.174 白先勇自选集《思旧赋》书影。

贰拾肆 《格列佛游记》里的党争

P.179 《格列佛游记》书影。

P.180 《格列佛游记》插图。

贰拾伍 学《论语》，说孔子

P.185 清乾隆版《论语》书影。

P.188 这是贺卫方在波恩一家旧书店里买到的德文版《论语》。扉页上译者是尉礼贤，即后来以“卫理贤”而广为人知的那位著名汉学家。名前属有地名青岛，但却不是他的祖国德国或家乡斯图加特。“癸丑再版”，为1914年初第二版。

贰拾陆 非常独立，非常沉默

P.194 槐花香满树，汉王墓前孤。2009年4月26日摄于河南芒砀山汉梁王墓前。

贰拾柒 很后悔，没为他写一个字

P.197 在顶峰时离职，那年他五十二岁。如绽放之花，悄然离去。

贰拾捌 像冬天飘摇的芦苇

P.203 《宫女谈往录》书影。

贰拾玖 他那支笔是怎么练的

P.209 日本艺伎〔浮世绘〕。

P.211 《东京湾闲话》。李长声作品书影。

P.215 《风来坊闲话》。李长声作品书影。

叁拾 说知名品牌

P.217 第一批丰田轿车上的汉字标识。

P.220 一座日本建筑上的知名品牌大汇集。

叁拾壹 一生负气成今日 四海无人对夕阳

P.225 陈寅恪、唐筼墓。

叁拾贰 陈姑娘，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

P.229 陈姑娘。

P.237 貌凡而内秀，色素而至纯。

叁拾叁 端木露西：蔚蓝中的一点暗淡

P.239 储安平、端木露西结婚照。

叁拾肆 汉语拼音与威式注音

P.245 柳迎春在读谁发来的短信？

P.247 云南腾冲和顺镇的一处路标。

P.249 瓷鞋 —— 高跟的、小脚的、带筒的。

叁拾伍 好吃勤做

P.251 我的劳作《酒瓶塞》。

叁拾陆 只养仙人掌

P.255 我的阳台。

叁拾柒 乡事偶拾

P.259 京剧《红灯记》。

P.262 冬天的姜格庄。

叁拾捌 他们更耐人寻味

P.265 《借东风》里的马连良〔饰诸葛亮〕。

P.267 张君秋便装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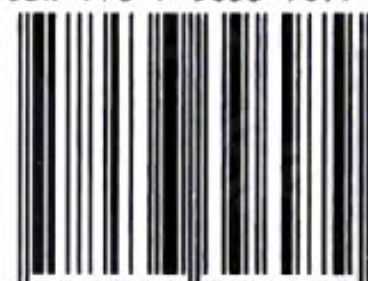
P.267 关肃霜主演的现代京剧《黛诺》。



北京贝贝特

上架建议：畅销 散文

ISBN 978-7-5633-9697-9



9 787563 396979 >

定价：38.00 元